

×××××出版社

# 密令

长篇纪实文学丛书

## 来自中南海

革命年代  
⑦  
师东兵(著)

# 目 录

(章回标题为编者拟)

- |    |            |               |       |
|----|------------|---------------|-------|
| 一  | 林立果提携于新野   | 毛泽东考起余立金····· | (1)   |
| 二  | 国庆游行林彪演讲   | 文革小组江陈较量····· | (14)  |
| 三  | “古为今用”蓝苹部署 | 旧信新编叶群出招····· | (26)  |
| 四  | 杨成武著文留祸根   | 戚本禹写信伏危机····· | (39)  |
| 五  | 读文章恩来承帅命   | 发诗兴泽东背古诗····· | (51)  |
| 六  | 代总长一文成箭靶   | 毛统帅两面抚僚臣····· | (61)  |
| 七  | 仕途险伴君如伴虎   | 莫须有秘书入牢笼····· | (71)  |
| 八  | 副统帅提携黄永胜   | 大字报翻案保陈毅····· | (81)  |
| 九  | 中南海毛泽东定调   | 外交部周恩来交底····· | (91)  |
| 十  | 查失稿傅崇碧卸命   | 入禁地江女皇栽赃····· | (101) |
| 十一 | 吴法宪仗势设陷阱   | 杨成武卧病失乌纱····· | (112) |
| 十二 | 毛泽东再玩平衡术   | 杨余傅惨做牺牲品····· | (122) |
| 十三 | 林彪趁机扩充实力   | 江青无奈心事重重····· | (132) |
| 十四 | 两股势力磨拳擦掌   | 为夺实权明争暗斗····· | (141) |
| 十五 | 江青重温鲁迅旧作   | 领袖暗示夫妻情在····· | (152) |
| 十六 | 伯达起草九大报告   | 江青暗查老底生疑····· | (162) |
| 十七 | 翻旧帐早年曾反毛   | 爱指责朱德作检讨····· | (172) |
| 十八 | 张姚伯达针锋相对   | 分头起草政治报告····· | (182) |

## 林立果提携于新野 毛泽东考起余立金

林立果像一条鲫鱼似的在游泳池里活蹦乱跳，只有在这里，他的少年时代的纯真和矫健才能得到暴露和显现，引得久居毛家湾负责警戒的战士们羡慕地看着他发楞。

穿绿色游泳裤的于新野坐在池边的石桌旁喝着饮料，眼光却从没离开水里的那位小将，不，应该说是他的靠山。今天他陪林立果回家取东西，神经一直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他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由林立果领着粗览了一遍毛家湾的布局，立刻眼花撩乱起来。这座大院的门弯弯曲曲，像蛇形似的既隐蔽、又安全。前侧就有三道门：一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警卫战士驻地的门；林彪、叶群及林立果出入的是二号门。他们就是从这道门进来的。

路过一排平房时，林立果随手指了一下：“爸爸就在这儿办公。”于新野脱口而出：“首长住的地方多么艰苦朴素，不愧是我们的光辉榜样。”他从内廊里看到，林彪的住区大约有四间：一间卧室，两间会客室，还有一间是日光浴室。那间日光浴室呈封闭式形状，阳光在哪个角度都能照射进由特殊玻璃装制的屋内，

并能滤掉各种有害的射线。从这里再穿过一条内廊，就到了林立果的房间了。

他的住处是两小间屋子，外边是学习、会客的地方，内室是卧室。外屋放的三个书架，全部摆满了各种书籍，写字台上放着一张全家照，少年时代的林立果精神抖擞地站在林彪身边，显得特别顽皮、可爱。另一幅照片是刚放大的彩照，那是周宇驰在今年七月一日林立果入党时给他拍的纪念照，红扑扑的脸儿，亮晶晶的眼睛，五官的线条充满着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正面墙上，挂着一幅装裱好的条幅，于新野一看那熟悉的字迹，就认出是林彪的手笔。

“能认下来吗？”

于新野微笑着念道：“太公曰：见善而息，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放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录武经太公兵语赠虎儿。爸爸。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林立果又说：“能念下来不简单，会解通吗？”

于新野故意说：“我的古文学得不好，请教老弟了。”

林立果不客气地说：“这是爸爸从《武经七书》中《六韬·文韬·明传》节里录出来的。他最喜欢这段话，所以抄出来送给我。当年周文王病危，召见姜太公吕望，周武王在旁作的。周文王说：‘唉，苍天要抛弃我啦，周朝的天下，将要托付给你照应太子。现在我想学至高最圣的理论，来明确地传给子孙。’太公问：‘王问的是什么呢？’文王说：‘是不是可以把先圣之道提倡哪些，禁止哪些，说一说呢？’太公说，‘遇到好事而怠慢，时机到了而犹豫，明知事情不对反而参与，这三点是先圣之道所禁止的。柔顺而又沉静，谦恭而又敬重，强毅而能卑弱，忍耐而能刚劲，这四点是先圣之道所提倡的。所以大义胜过私欲就昌盛，私欲胜过

‘大义就灭亡，恭敬胜过怠慢就兴旺，怠慢胜过恭敬就覆亡。’爸爸把周文王对武王的遗嘱转抄给我，也是对我们这一代的勉励。”

“立果，这一次到你这儿，对我是最好的学习，最大的提高，最有力的鞭策，最现实的教育。”于新野态度十分诚恳地握住林立果的手，“从年龄上讲，虽然我比你大几岁，但从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上，你却是我最好的老师，你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希望你将来多帮助我。我向你保证：只要是林副主席和你布置的任务，我于新野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坚决完成！”

“好，好！”林立果同样激动得热血直翻腾，“我早就把你和周宇驰同志当作我最知心的战友了。今后我们要在一个战壕里跌、打、滚、爬，共同战斗！”

两只手紧紧地捏在一起，标志着一种政治联盟的建立。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渴望已久的，在政治斗争中，只有这种卖身的诺言才会换来荣誉、地位，但要以他的全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当然，林立果此时此刻是不会想到四年后的结局的。他只被眼前的需要所陶醉了。林立果则很放心这样的人。于新野出生于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既无后台也没有金钱上的供需，要想在仕途拼搏，只有死心塌地跟着他走。而他早已看准了这位强悍的年轻军官的胸间，隐藏着一颗跃跃欲试的心。

“爸爸今天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不然，我一定要他见见你。”

“到这里看一看，领略一下圣地的感受，我就心满意足了。”

林立果索性让他大开眼界，带他来到室内游泳池，一块到水里玩了个痛快。

当林立果从水里爬上来后，林立果赶紧走上前，顺手抓起一条浴巾，给他擦背部和臂部，并将一件军装披到他身上。

“可惜科长没来，他如果也在，我请你们看几部外国影片，比三点水的样板戏强多了。”

林立果打了个怔，马上缓过神来：“宇驰和党办王主任跟余政委的那个秘书合不来，他们‘官’对我们嫉妒和仇恨，再加上文革中观点不同，一直受他们的欺负。”

“你是说了志强？”

“对，他仗着余立金的势力可神气哪，甚至公开讲：‘在空军我就听余政委的，余政委听毛主席的，所以我谁也不怕，谁也不尿。’你看他狂不狂！”

“吴司令怎么不敢管一管？”

“他那个人，眼睛朝上。上面不给他眼色，他从来不敢多说话。他知道余立金有后台，后台就是杨代总长。最近杨代总长的女儿又调到空军报社了，丁志强那小子拍马屁跟得更紧了。”于新野打开话匣子，恨不得把空军司令部内的派别斗争全端给林立果。

林立果毕竟到空军才半年多，许多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听得少，说得少。但他到党委办公室后，本能地感觉到，除了主任王飞和科长周宇驰、于新野、何汝珍等人整天围着他团团转，把他奉若神明外，其他人包括了志强等，似乎根本没发现他的作用，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这使他很不悦，再加上他们在他耳边不断地吹风，他已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即：余立金绝不是他能随心所欲指挥得动的人。

他的感觉没有错。余立金的确小视了林立果。在他眼里，林彪把他放到空军，是让他经受锻炼和教育来了，不能、也没有必要让这位对空军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印象的孩子过多地参与机密大事。所以，他见了这位精悍的小秘书，顶多是笑一笑而已，从来没有找他谈过一次话，更没有通过他去接触林彪，试图取得他的好感的念头。

余立金多次陪同毛泽东出外巡视，而且和杨成武一起，受到党的主席的多次表扬，足以显示出伟大领袖的信任，难道还需要

舍近求远，通过一个刚参军的孩子往上爬吗？”

正因如此，他对那个见了林立果点头哈腰，不住地吹捧、逢迎的空军司令吴法宪，产生鄙弃的烦感和厌恶。

但是，吴法宪却偏要在他面前，端起中央军委办事级负责人、空军司令兼党委第一书记的架子，向他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今年八一前夕，余立金奉毛泽东之命，专门从上海回到北京，向周恩来通报他即将巡视中南、华北的行程的计划。临飞之前，毛泽东特意嘱咐：“我的行止，只报告总理，其他人一律保密。”

余立金刚回到北京，吴法宪便来到他家拜访，笑嘻嘻地说：“这次你陪同主席视察南方，是最幸福的机会，一定得到不少最新最高指示，等你稍加休息，咱们去司令部会议室，给我传达传达，我们共同学习嘛。”

余立金很认真地说：“我这次回来，只是向总理汇报，没有传达任务。这是主席再三交待过的。”

吴法宪的脸一下变得通红，沉下脸来：“如果是这样，那就算了。”

吴法宪回到司令部，很快拨通了毛家湾的电话，对叶群说：“余立金从上海回来了，表现得非常神秘诡诈，我让他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他竟吞吞吐吐，不肯透漏。”

“哼！他是故弄玄虚，装腔作势。”叶群在电话里说，“他现在得了点便宜想在你们面前抖一抖，你给他摆出司令的架子来，让他给你们传达，他要再摆架子，就说是我和一〇一让他讲的。”

这下，吴法宪更来劲了。他马上召集了几个常委开会，说：“余政委从上海回来，一不向林副主席汇报，二不向空军党委传达主席的最高指示，显然是想架空军委办事组，封锁林副主席和我们，目的不纯嘛。”

那几个常委都知道他是林彪信任的红人，顺着他的话说：“是不像话，作为政委，眼里没有司令员，没有军委办事组，连林副主席都看不起，他的组织纪律性跑到哪里去了？”

吴法宪受到鼓励，马上又给余立金打电话：“余政委，我从你那里回来后，见到几个常委。大家都说，你从毛主席身边回来，一定得给大家传达传达主席指示的精神，这点要求是可以满足我们的，不然你可就要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余立金没想到吴法宪还有这么大的缠劲，就有点不耐烦地说：“我不是给你讲过了吗？我没有传达最高指示的任务。这是主席特别吩咐过的。常委们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请你向他们解释一下吧。要不，我去给大家解释解释。”

“劳驾不起，既然你执意不肯，那就这样吧。”说完“砰”地放下了电话。

余立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难堪，把刚回家时的欢快情绪全破坏了。这次陪同毛泽东巡视，他对最高领袖的领导艺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毛泽东深居简出，一般人很难掌握住他的活动规律和生活习惯。他了解某一问题的情况，从来都是分别找人谈话或听取汇报的，即使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之间，也是这样的。他有他自己的坚强信念和看法，别人很难改变他的思想或主意。有时，他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人民群众中或某一位负责人面前，但你要想找他时往往又很困难。不要说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人，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单独见他和谈话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他的谈话，一般都被告知不得随意外传，因为他的话大多都有明确的针对性，绝不允许随意发挥或解释。余立金记得杨成武曾对他说：“在中央高层工作，你必须养成这样的习惯，这就是：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去打听，不该你说的绝不要由你去说，否则就是违犯纪律，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乱子。”

这次回来，吴法宪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探消息，的确叫他讨厌得很。

余立金有个和睦温暖的家庭，妻子陆力行对他非常体贴。见他回来后又忙乎了一天，便早早地把被子给他拉开了，说：“睡吧，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搭飞机回上海去，在主席身边待着，我看他们谁敢再打扰！”

余立金点点头，上床了。他有躺着看书的习惯，顺手拿起一份文件来读。说来也巧，正好拿起的是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那次会议，他参加了，和吴法宪紧挨着坐在台下。江青那副拿腔拿调、自吹自擂的面孔，他至今记忆犹新。在那篇讲话里，他比较感兴趣的只有一段，他忍不住翻开又看起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他不像有些人把着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余立金想起一件事：那是在上海，早饭后，毛泽东的秘书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一趟。他准时到了会客厅。虽然是陪同毛泽东巡视，但他们并不能随意去见党的主席，而只是主席召见时才能到他的房间里。

毛泽东刚嗽完口，披着睡衣。见到余立金只是点点头，问：“戚本禹这个人你熟悉吗？”

“不熟悉，只是开会时见见面。”

“他派人来上海搜集三十年代的材料你了解？”



“不知道啊！”余立金惊讶地说，“我丝毫不知道中央文革派人来调查什么人。”

毛泽东笑了：“戚本禹怎么能代表中央文革呢，他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吓唬胆小鬼而已。你不要和他搞到一起，小心上这些秀才们的当。”

毛泽东指了指桌子上的大信袋：“你拿回去看一看，很快送来。记住，任何人不得再看，下午三点送来并谈谈你的认识。”

余立金以军人的姿态行了注目礼，拿上那个信袋退了出来。

他莫名其妙地读着那些用红蓝铅笔画着的材料和文章，越看越糊涂：

《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

一封公开信

近来各小报有许多关于我和唐纳的消息，这消息主要是说我负情于唐纳。我本想耐性地对付这事，默默地让它过去。因为，可以这样说，我和唐纳早没有关系，他是没有理由再来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我的。不过各报既然发出许多不利于我的一些不正确的消息，为使大家明了起见，我不愿再默默地忍受了。

爆发了吧，这久积在心头的郁闷，带着这毁人的郁闷，我活了一年多。这悠悠的一年多，除了极少数的朋友以外，一般的人，连许多朋友在内，都是这样说着：“唐纳是那樣的痴情地热恋着蓝苹，可是蓝苹却一再地对他情变着。”这些话语中是隐藏着大量的不满和责难的。

现在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了，虽说这样的麻烦在一般有正经事干的人来看，是顶无聊的事情，值不得多费唇舌，又还那样苦心而有计划地来负担起沉重的大“责任”，我不便使别人扫兴，同时也希望一般人明了那事实，所以只得出来说一说。

我要说的是唐纳是用着怎样的方法在热恋着我，他是用同样同时爱着别人又在热恋(?)着我的方法！

那是在通电的时候，我还没有和他恋爱之前，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什么人（公司的同事以及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那时爱着一个女孩（为了不要牵上别人，暂不提名）。后来，他同我恋爱起来以后，我曾问他这事，可是他说那是烟幕弹，为了怕人家知道他在追求我，一向不曾怀疑过爱我的人会对我说荒的我，这事像一颗流星在心上一闪过去了，没在心上留下一点痕迹。……

“主席，材料看完了，给你！”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和铅笔，柔和的目光盯着余立金，问：“有什么认识？”

“没什么，只不过是男女谈恋爱的事，没多大意思。”余立金漫不经心地回答。

“你知道蓝苹是谁吗？”

“可能是个电影演员。我不清楚这个人。”

余立金丝毫未发现，毛泽东那晶亮的两眼里已泛起了不悦之色，只见他拧灭烟头轻声说：“看来你不谙儿女之情，去吧！”

余立金又这么稀里糊涂出来了。

不管什么人，总期待着别人对他的理解和认识，知音的同情和安慰，远远胜过一千次廉价的赞誉和欢呼。毛泽东知道在神州大地自己有亿万崇拜他的人民，只要他一声令下，不乏为他冲锋陷阵的勇士，即使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但是，那是有复杂的诸多原因所铸成的忠诚。这对一个天才的领袖和导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至几个心心相印的知己，是真正的战友。这样的人，不但能同他分担胜利、共享欢乐，同时也能和他承受感情上的痛苦。请注意是感情上的。

他目前还没有发现。最起码，余立金不是。

林立果和于新野越谈越投机，整整一个上午和下午就在不知

不觉的漫谈中过去了。于新野由衷地感叹，面前的小伙子思想和他的年纪、经历大不相同，他简直能称得起是壮志冲云天的小政治家。他毫不掩饰地向自己倾吐，他将来要接爸爸的班，做第一流的杰出军事家、政治家，以统率三军！

乖乖，这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难道还不是标准的大野心家吗？

一时的激动也可以改写一个人的一生，此刻的激情就在强有力地改变着于新野的生命和感情。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和林立果紧紧相联系在一起，跟着这位未来的小统帅大干一番事业吧！

这时，漂亮的秘书匆匆走来，对着窗户喊道：“立果，首长和主任回来了，首长叫你。”

啊？林副主席回来啦。于新野感到一阵惊喜，要是能在此时见到这位副统帅，该是多么的幸运呀，只要能得到他的首肯，他今后的地位和命运就是本板上钉钉子，稳拿了！林立果倒无所谓，他把一本影集从抽屉里拿出来扔给于新野，说：“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回来。”

于新野点点头，一直目送他走出门，然后翻开影集，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来。看看没人注意，他偷偷地收起一张林立果和林彪在一起的合影，这足以在一些朋友们中显赫一阵子。

“久等了！”林立果兴高采烈地进来，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有什么好消息？”

“今年国庆，我请你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怎么样？”

“太好了！立果！”于新野高兴地跳起来，扑上去抱住林立果狠狠亲了他一口。林立果推开他。笑着说：“看把你乐的！告诉你，今年国庆不比往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国庆。关系到老头子的威望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威望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各国的威望。三点水也很关心今年的国庆。所以，我一定想法把你带上城楼，看看检阅游行队伍的壮

观!”

于新野已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你不是想了解了解当前和下一步的中央部署吗？这是老头子对爸爸国庆讲话稿的批示，你先看着，我让爸爸见见你。”

他望着林立果高雅而有风度的背影，心里暗暗地说：“周宇驰呀周科长，你今天没陪立果回来，可是太亏了！”

然后，他就打开文件夹，欣赏起那熟悉的龙飞蛇走般的字迹来：

讲话很好，气势磅礴，又不夸张，是一年来文化大革命很好的总结。

一、形势大好。

二、大联合。

三、谁为核心。批判以我为核心；核心不能自封，而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四、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山东的办法好，基层不能反夺权，保守派夺权也承认，慢慢改造，所以整个省都稳定，生产很好，超过国家计划。特别要做对立面的工作，团结大多数。

五、对坏人要专政，北京、天津、东北搞得很好。

六、上下级关系要搞好。

七、训练干部。支左干部、武装干部、红卫兵普遍训练，师以上的干部北京训练，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斗私批修为网，进行教育。

八、拥军爱民经常大搞，武装左派，分步骤实行，把民兵整顿起来。

九、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把教育干部放在第一位。组织领导小组，林彪同志要亲自抓，伯达、康生同志七至十一人。明年六月底全部训完。

十、正确对待群众，依靠群众。

于新野从来没见过毛泽东的手迹，今天翻来覆去连看几遍，心中暗想：不愧是伟大领袖，具体工作和方针制定的何等详细，全盘工作完全带动起来，原来，林彪、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大政方针，都得听最高统帅的指挥。连讲话的口径都完全统一在领袖的语言规范中了。好一位天才，真正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他正感慨着，林立果到了门口向招手。他立刻会意，跟着便沿着内廊朝另一排平房走去。还没到门口，就听见会客厅里传出一个女人粗哑的声音：

“杨成武就会钻空子！他那个《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为他捞了多少资本？直到现在，许多军队干部还都把他当作是你的人。其实他早改换门庭了。现在，又写了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名义上批判罗瑞卿，实际上又是为他捞资本。他的眼睛是盯着党的九大的！”

“这我知道！”

“知道得想法阻拦呀！你看他自从跟上主席走了一圈后，狂到什么地步了！连和我都见面不打招呼，眼睛长到脑门上了！”

“忍耐！忍耐！忍耐是科学的大度！”

于新野听到这些，弄得很尴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得停留住步子，把眼睛转向林立果。

林立果故意大声咳嗽一声，这一招很灵，屋里的争吵马上停止了。

很快，叶群从客厅里迎出来，她满面笑容，眯缝着眼睛一边打量于新野，一边笑咪咪地问：“你就是小于吧？好呵，很年轻，很精神的，我们老虎一直夸奖你很能干，对他的帮助很大，我们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呢！”

于新野镇静下来，伸手握了一下叶群的手，躬着身子说：

“见到您太幸福了，我要用实际行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保卫林副主席！”

“别客气，请进吧！”

林立果拉着于新野进了客厅，向坐在椅子上的一位瘦弱的老人说：“爸爸，他就是于新野，我们的副科长。”

于新野双眸忽地一亮，目不转睛地望着林彪，觉得泪水在眼眶里滚动。唉，他太紧张、太激动了。

他没想到，站起来的副统帅，面色竟如此苍白，没有稀疏的血色，而且脑袋早已谢顶，只是两耳后侧和后脑盖以上，还残留着一点头发。全然没有照片和电影里那么神采奕奕，精神焕发。

就这一点，他感到太遗憾了！

## 国庆游行林彪演讲 文革小组江陈较量

一九六七年的国庆节终于来到了。

从凌晨三点多就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和东街的五十多万群众，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歌曲，坐在路上、广场上等候检阅。有九万多身穿绿色军装和公安制服的警察和解放军战士，汗流遍体在维持秩序，保卫着首都的安全。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九月中旬便组成以谢富治为首的十人领导小组负责筹备工作，他们大张旗鼓地处理了轰动北京市的西单商场、琉璃河、北京仪器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逮捕和惩处了一批凶手及头头，以防效尤。同时，将近二十万的来京上访人员动员、遣送回原地，消除了一切足以造成混乱的隐患因素。

谢富治和北京军区副司令、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早早就登上天安门城楼，里里外外重新检查着。观礼台前的位置早已安排好了，哪位领导人站在哪里都有规定，并在他站的地方标着名字。绝不会出差错。快到九点半的时候，大多数该上城楼的中央领导人基本上全到位了。

余立金刚在休息室里坐下，就见江青裹着一身军装，戴着那

副精致的法琅架眼镜，在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的簇拥下走进来，头戴圆军帽、穿着女式军服的叶群殷勤地迎上去，关切地问这问那，意图显示着她们之间的亲密。

江青一来，立刻成为天安门城楼上的主角。

被邀请上城楼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争先恐后地拥上来，和她握手。江青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毛主席语录》本，老相识般招呼着他们的名字，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取得夺权的胜利。”忽然，她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朝着一位身穿军装的姑娘这边走来，热情地拥抱着她：“听说你当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司令了，好家伙，比我的官都大！”

那位姑娘受宠若惊，赶紧说：“不是司令，是勤务员。”

“好，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毛主席让我转告你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城楼休息室门前，顿时出现响起般的掌声。江青像英雄，像旗手，像这里的主人，微笑着频频举手。她多么得意啊！

余立金望着她。不知怎的，她在他的心目中，怎样也高大不起来。他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形象，旗袍、露臂短衫、国民党女兵军装，啊，她不是画报封面上的蓝苹吗？蓝苹的声音又响在耳际：

“……可是在去年的三八节，那时我们是很穷困的，同时我在病着，可是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游艺，我是带着病在大冷天里跑着，我带着病上台，为了一点误会。朋友都不来帮忙了，事情是更加繁重了，我就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情况下干着这繁重的工作。游艺会终于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之下结束了，可是我，我也毁了！我单独的，带着很高热度和一个灌了铅一样的头，坐了一部黄包车回家。那时，我们住在南洋路，回到家里忘了为了找什么，在桌子书堆里发现了她写给别的女人（在通电时所追的那位）的情书及那位姑娘给他的情书。呵，天啊！你们想像得到一

个人会有那样的痛苦吗？朋友们不谅解，病，再加上爱人的不忠实，溶成一枝巨大的铁棒，迎头痛击了我。当我醒过来，我还是蓝苹，蓝苹是这样的，不和唐纳打一点麻烦，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就走了。我没有地方去，跑到我白天排戏开的一个房间里。因为我知道俱乐部的朋友会来，她们会替我想法子的。

“等了一会，门开了，进来的是唐纳。他要我回去。我说，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再在一道的可能。可是他哭了，哭得哀痛极了！他说就是有什么，回去说清楚了再分手，在那时，是我怕在旅馆里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我就同他回去了，可是跟他说好，没有再同居下去的余地，等天亮了我就走啊，我永远不忘记他哭的那种可怜的样子！后来他逼着我说原谅了他，可是我不开口。他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走的神气很不对，我跑下床在外间桌上发现他留的条子，大意是他要死去。在一种紧急的情况之下，我拼了气力跑到外边去追上了他，要他回来。可是他问我爱他不？原谅他不？天啊！在一个要死的人跟前我说什么呢？我说我爱他，我原谅了他？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挣扎在四十度左右的热度里。我胡说，我捶床，我骂人，我要疯了呵！我感谢唐纳那时是很好的看护过我。为了穷，他伴我到他家，在苏州他的一个亲眷家里，我躺了将近两个月。……”

余立金正神游意想着，忽然眼前一亮，只见毛泽东和林彪一先一后，走到休息大厅。这时，提前到达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全部站起来，同他们招呼并一一握手。

毛泽东大步走到朱德跟前，热情地说：“老总，我们又见面了。身体还好吧？”

八十一岁的朱德，面容显得粗犷、郁闷，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地摇晃：“老战友们都走了，我也快了。但活一天，就想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不然，总是放不下心呵！”

毛泽东明知他说的是双关语，但脸上没露出任何表情，稍加

点头后又走到董必武和宋庆龄跟前，和他们坐在沙发上，亲切地交谈起来。

毛泽东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穿着人们早已熟悉的那套灰色中山装，一边抽烟，一边风趣地和宋庆龄、董必武、朱德等人介绍着外面的见闻。这是他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格外引人注目。

周恩来看了看表，还差五分钟就十点整了。他问谢富治：“军乐团都准备好了吗？”

谢富治说：“好了。”

“请毛主席准备出来吧！”

时针刚到十点，近千人组成的乐队高奏起《东方红》乐曲，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中央。毛泽东一出来，就向四周的人们招手，表示祝贺。城楼上下，汇成一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这时，广场上近十万人手持花束、花球和彩带，魔术般地组成一幅极为壮丽的图案：旭日东升，光芒万丈。

广场上欢腾不已的群众队伍，一起举起红色塑料皮包装的《毛主席语录》，好像一片磅礴起伏的红色海洋。现场直播的广播员激动地说：“千千万万革命群众欢呼跳跃，心潮逐浪热泪流，千言万语涌心头。一个共同的心声是，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力非常非常充沛，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泽东侧过身子问右边的周恩来：“阿尔巴尼亚的同志在哪里？”

周恩来回答：“谢胡同志在左边。”

毛泽东朝左边望了望，幽默地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总是说中国已经孤立了，你们看，我们有多少人民？我就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孤立！我们也孤立不了！”

林彪插话：“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

周恩来笑了笑，只是点点头：“开始吧！”

十点八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宣布国庆大典开始，乐队奏国歌，礼炮齐鸣。

以工作人员身分登上城楼的林立果和于新野缩挤在最西角，羡慕地注视着城楼中央的那些领导人。他俩默默地对照顺序，搜寻着他们认识的人。于新野特别注意领导人排列的次序，这象征着这些人在党内的荣誉和地位。他发现，在毛泽东、林彪之后，观礼台上的顺序是这样排列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戚本禹、叶群。

“他妈的，那几个老右不仅没被打倒，而且全部上了天安门城楼，位子还排在了江青和叶主任的前头，这是怎么搞的？谁决定的？”于新野狂妄地问林立果。

“嘘！”林立果瞪了他一眼，小声说：“这个是总理搞的，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你放心，很快就会有变化。”这一次，他没敢再用“老头子”来代替毛泽东。

于新野再看后面的人，这才轮到大军区司令这一级别的人，而且顺序是这样安排的：张云逸、许世友、黄永胜、韦国清、陈锡联、韩先楚、萧劲光、李作鹏、吴法宪、余立金、潘复生、洗恒汉、李天佑、王新亭、邱会作、郑维山、蔡畅、邓颖超、汪东兴、吴德、传崇碧。再以下是文化艺术界和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

于新野不由得暗暗叹口气：天啊，这要打倒多少人，我们意中的领导人才能升上去，名列前茅呢？等到何年何月，我的名字才能正式出现在这上面呢？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在这个光辉的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的工人们、农民们……”

一听那拖腔甩调、韵律独特、富有节奏感的声音，许多人就忍不住发笑。副统帅是气力不足，还是有意独特，讲起话来像是拼命喊叫，很富有历史的诗情画意。

“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破了胆的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大革命会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乱。事实同这些老爷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胜利的捷报，正在不断传来。我们的农业获得了连续第六年的好收成。我们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氢弹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大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五十多岁的江青看起来要年轻得多，她从来不受任何会议的约束，就连今天的庆祝大会也不例外。按她的主意，是要让张春桥、姚文元也来北京参加大典活动的，但姚文元说：“我们在上海欢庆国庆更有意义，毕竟上海和我们还是最有感情的，何况我们还兼任上海市革委会的职务。”于是，他们都飞回上海去了。她像一个丢失东西的管家主妇，眼睛在城楼上到处搜寻，还不断地穿过人群，走来走去，领受着各式各样的人向她表示的殷勤，领受了那些脸颊绯红的红卫兵和学生代表投来的倾慕的目光。但她缺少知己，真正的知己，使她多少感到了些寂寞。那是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寂寞。

她无意之中发现戚本禹在跟着她，混蛋，他跟着我干什么？

莫非想跟踪我？搞我的特务活动？现在，她越来越讨厌这个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政客了，他好像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兴趣，竟然搜集起我三十年代的材料来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不能让他再兼了，得我亲自抓！她把那个熊一般健壮的男人看得比当年的唐纳还要下贱！

“江青同志，我看了你三十年代写的那些东西，深感教育，你从那时起，就是伟大的革命家了！”

她又想起了戚本禹奉承她的话，觉得耳根一阵发热。混蛋，完全是对我的吹捧哄！戚本禹的话，越想越觉得是在嘲笑她。她总也忍受不下这口气！

这回，是她想起了当年她公开信中的话：

“……结婚他是早就提出了，可是直到那时我才同意。不过，我们是说的很清楚，就是并不是拿这种仪式挟制着谁，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结婚可以从家里拿一点钱，这样可以还清失业和病欠的债，所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放在心里。

“话再说回头，那时我虽说原谅了他，可是每想起那一夜，那两封信，我的心像搅碎了一样的痛呵！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因为一方面是伤了我这份可怜的自尊心（我常常这样想着，一个真正热恋着我的人是不会对我情变的），但最重要的是我那个阿Q的脾气，我觉得我是不应该为吃醋这事闹笑话的，所以就深深地埋心头，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心情下，是很容易闹别扭的，因为我们常常争执，再加上朋友们因为误会和我们疏远，以及我在职业上、工作上没有明确的出路，于是发生了回北方的事。

“他在济南自杀后，我回到济南时，主要是想当面和他讲明，并劝他看重自己，以后不要再这样，然后再分手。可是当我看到

他那可怜的样子，可耻哟！我的心软的叫我不能相信，我甚至完全饶恕了他的不忠实，我觉得人人都有错处，只要认错改错就行了。

“因为同情心和可怜心，我造成了一生最可耻的事——同他回上海。不过，那时我的确是想和他再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住到毕勋路不久，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段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诗，因为太衰弱的关系，我全身抖着瘫软在地上。那是一段当我回济南时他写给在日本的姑娘的热烈的诗（那时那姑娘已去日本），我像一个瘫子，呆呆地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急速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片匆匆的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这日记在本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时我不在家时，唐纳拿走了）。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里！我当时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发疯一样地闹脾气，可是见了人，尤其是朋友，我就是傻傻地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连她自己也感到，说这封公开信有“教育意义”，实在近乎讽刺了，她不能容忍。

“江青同志！”戚本禹殷勤地赶过来，搭话说，“杨代总长写了一篇文章，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你看……”

没等他说完，江青便冷冷地说，“我又不管《红旗》杂志，和我说这些干什么？找伯达同志去！”

陈永贵见江青朝这边走来，憨厚地朝他笑了笑，说：“江青同志，我们大寨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向你问好！”

江青以大人物的口吻说：“永贵同志，现在可不能总是大寨

长、大寨短的了，你是山西省革委会的副主任，考虑问题要从这个前提出发哟！”

“是，是，我要看远些。”陈永贵连连点头，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包，从里面取出一枚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像章，十分恭敬地递到她面前：“江青同志，大寨的贫下中农让我代表他们献给你一件最珍贵的礼物。”

江青笑了，笑得非常亲切和令人感动：“永贵同志，你的心意我领了，代我谢谢大寨的贫下中农。但礼物我不能收，我从来是不收礼物的。这点，主席对我有严格的规定。谢谢你。”说完，和陈永贵简单地拉了一下手，便又朝另一边走去。

这一下把陈永贵干干地晾到那儿，包像章的小红包差点落到地上。旁边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发现了，都争着跑过来要。没多大一会儿，原打算送中央文革领导人的礼物，全被他们瓜分了。

林彪的讲话已接近尾声：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一串口号中，他结束了他的讲话。时间正是十点二十分。

游行开始，广场东边的长安街，游行队伍的前头，有一座近二十米高的毛泽东全身巨像。在塑像的引导下，五十万各族各界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满怀豪情，接受检阅。那一个个由数千名解放军战士组成的红旗方块队和武装队列，以及别具一格的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泊》、《红色娘子军》等八辆巨大的彩车，浩浩荡荡地通过了天安门城楼……

欢欣雀跃的红卫兵队伍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千万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观礼台中央，他们多么想亲眼看一看日夜想念、天天呼唤的敬爱领袖啊！但是，除了少数人还能模模糊糊看见些轮廓

外，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根本未能见他一眼。

挡住观众视线的一批又一批的新闻记者，还有受邀前来参加典礼的各国来宾，还有那一队文武官员们固然在自己的位置上，但他们站得密密麻麻，处于行动中的游行人群根本不可能把他们和敬爱的领袖分清。

陈伯达在大众场合下，始终摆出一副谦虚、温和的慈祥面孔，好像他是一个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菩萨。他举止、走路很缓慢，意图给人一种辛勤劳碌，肩负着最沉重的担子的印象。他同样穿着深色的中山装，戴着同样颜色的帽子，外面罩着一件大衣，眯缝着眼睛透过近视镜来观看着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当杨成武走到他跟前时，竟全然不知。

“伯达同志，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那篇文章你看了吗？”

陈伯达见代总参谋长到了自己身边，立刻堆出满脸笑容：“哦，就是那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吧，我看了，帮助你修改了几处，想以你的名义发。我已和有关同志打了招呼。”

“文章可不是我写的。”

“总参的同志写的也有你一份呵，你又是代总长，用你的名字发代表军队嘛。这样影响面会更大些。”

其实，陈伯达是卖空头人情。他知道在当前形势下，特别是毛泽东正筹谋召开党的“九大”之际，以党的高级干部个人名义发表这类文章要经过毛泽东的首肯才行。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这几篇文章，都是江青出题，事先请示毛泽东，又经过他亲自修改、审批才发表的。这几篇文章，把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一下子树成家喻户晓的理论权威。

面突出宣传杨成武，不仅毛泽东未点头，甚至江青就可能会首先反对。姚文元在交给他这篇文章时，曾告诉他：“这篇文章

早在七月初就写出来了，去武汉途中杨成武交给主席，想让主席帮助他看看，但主席根本没看，过了几天才给了他一个条子，写道：“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主席的全部意思就在“酌处”二个字上，说明他很不以为然。不然，还让我们商量着办吗？主席不好明里驳他，推给我们搪塞他。”

陈伯达对这个新贵，从心里看不起。你不就是跟着江青转了几圈才提起来的三流秀才吗？有什么了不起！在我面前充大头，还早了些。但他仍然推着笑容，不动声色点了点头。

杨成武不摸这个底，以为陈伯达出自好心，就说：“既然你已动笔修改过，以你的名义发也行呵！”

“不，不，”陈伯达连连摆手说，“还是以你的名义发，我再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选择合适的时间以显著的地位发表。”

这当然是在骗他。杨成武却毫无察觉。

陈伯达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和打算。

曾几何时，陈伯达说一不二，在中央文革讲话，从来是重要的文件，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革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一马当先，批判别人勇打头阵，丝毫不计成败利钝，得罪了相当一批老干部。许多人提起他，都恨之人骨。但他在青年学生和造反派中，却以此获得很大的权势，甚至凌驾于周恩来之上。例如去年底，当红卫兵、造反派冲击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余秋里等人时，周恩来再三出面保护都收效甚微，但陈伯达写了几个条子，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此，陈伯达相当得意。

但是，自从江青获得张春桥、姚文元两员大将后，他日益感到自己在逐渐被冷落。甚至江青公开批他、刺他，使他在中央文革内威风几乎扫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不处处多长心眼、略施小计呢？

广场上，游行队伍仍在继续移动。

城楼上，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活动，显示出各种暗中嘀咕和商量工作的气氛。

3

## “古为今用”蓝苹部署 旧信新编叶群出招

张春桥接二连三地接到情报：北京有人秘密地来上海搜集江青、姚文元父子和自己在三十年代的材料，而且来无踪去无影，行动十分诡秘，打的旗号不是“首都红代会”，就是中央军委什么单位的招牌，往往都是人走了，材料才报上来。

看来，这个行动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线交叉进行的。光采取“镇压反革命”“清查五·一六”的办法未必能压下来这股风，根本的措施是正本清源，因势利导，变被动为主动。

地处上海近郊的兴国路招待所附近，细雨纷纷扬扬，稀稀落落，如烟似雾，整个掩映于树木花丛之中的几座别墅，像笼罩在巨大的蒸笼里。路旁的树枝，被风浪荡得伏来倒去，眼见就要倒下去了，风稍停，又硬梆梆地矗立起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专门有一处住宅，召集小型会议和商量什么重大决策，常常在此举行。他刚给姚文元打去电话，要他火速到这里来商量一下有关问题。这个“有关问题”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暗语，往往意味着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而且，他特别强调“只你一个人来”，这就更加重了问题的机密性。

趁等他的空儿，张春桥又打开了那封“机密档案”，研究起蓝苹那封“公开信”来：

“……后来因为一进了联华，就有工作，感谢费穆先生给了我一个角色，我把什么都转移到工作上，也就忘了不少的苦恼。接着拍《王老五》，排《大雷雨》，因为多和朋友接触，我再也不想到死，我想到的是解决，解决！于是就发生了我们的分居。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在这样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可是他忍受不了，而又没有决心去改变自己（并不是改变了，我就会爱他，我永不会再爱他的，因为抹不掉心上过多的伤痕），所以又发生了一次要自杀，是经我和三个朋友的说劝才不的。可是那时我对他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地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

“那以后，他说决不再自杀。我从没有恨他——连现在，虽不再爱他，但是还可以做一个好朋友，他是对任何朋友都有深厚的友谊的，我决不会因为这事而抹掉他的好处。就这样我们还是来往着，只是很清楚，谁都不搅谁。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想找我谈话，说这样下去，他太苦恼，要跟我清算。并给我一封撕破了的信看——那信是那个从日本回来了的姑娘写给他的，失恋的信——表示他对我的忠实。但是我已经不爱他了。我问他既是要将我们的关系清算，要不要登报声明脱离关系呢？他说如果我需要就登，他是不需要。我当然更不需要了。于是决定离开上海。……”

就在这时，姚文元来了。

他一看张春桥桌上的东西，就啥也明白了。从文化大革命发

动以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按张春桥的布置，有计划地读书，熟悉党史、文化史和有关的档案材料。他主要是搜集和阅读一切有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和资料，上海和北京的图书馆，他派人都搜寻遍了。姚文元读书还是比较刻苦的，他在自己的套间里，每天浏览各种书籍直到深夜。他在脑子里给中南海和钓鱼台的掌权者和落势者勾勒了一幅又一幅极为精细的画像，能够凭记忆说出他们的许多经历和特点。当然，他搜集的资料也许马上用不上或者毫无用处，但偶尔开会说起来，他也能提出某一位人物的怪癖、性格特点和经历中的某个细节。

这大大地弥补了他在中央高层的经历和经验不足的弱点。

一些不知底细的人，总以为姚文元言听计从于张春桥，好像他的一举一动，每一番政治舞台上的表演，都受张春桥的制约。其实大错特错。

姚文元是个智力相当敏捷的人。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断言：此人貌愚内敏，性格内向而不外露，具有极大的智力内涵。他博览群书，计划周密，能把大量事实情况和资料贮存在脑子里，随时都可以不失时机地抛出来。张春桥考虑什么问题时，他往往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地完整了张春桥的思想。这一点，使张春桥佩服不已。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有了独特的认识和概念。而这一切，都启发和影响着张春桥。

张春桥喜欢这个面色白皙、说话稍有结巴、体格壮实，眼睛鼓凸着并不断眨动的男子。虽是书生秀才，却有一种坚定有力的精神内涵和不择手段地追求目标的强烈欲望。从这个男子轮廓分明的面孔上，他感到了这个人的内在力量。他观察了他十年，也指点培养了他十年，事实证明，他的眼力没有错。

当初，江青让他关心一下京剧革命的时候，他说：“搞文艺我是外行，搞政治还可以。”他把政治，用一句最精确的话概括

为：你下我上，你倒我起，你死我活。为此，只有用你想像不到的方法，在你想像不到的时间里达到目的。而为此，必须耐心地等待。政治斗争是一门艺术，方法和机会虽然五花八门，但真正正确的途径和办法只有一条。

屋里的空气沉闷而发着潮味，但是他俩早已熟悉了。

“看来主席的注意力正在向九大上扭转。”张春桥说。

“人人都在想着他自己的位置。”姚文元立即接上。

“江青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你读过吗？”

“早已研究过多次。”

“感觉如何？”

“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了不起的奇才，一个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坚强的女革命家，一个不屈不挠从高压中撞过来的勇士！”姚文元说得非常恳切而激动。

张春桥呼地站起来：“完全正确！”

接着，他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进，缓缓吐出，平息了一下心头的激动，边踱步边说，像在构思一篇重要论文：“请你想一想，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在上海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单枪匹马地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遭受了那么多落难却坚强地挺着，不顾一切地活下来，终于奔到了延安。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哟。可是，至今还有一些庸人不理解，藉此来丑化她、攻击她，这个案现在不定更待何时？”

“你是说……”

“首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公开这封信，统一认识。然后，以我们全体成员的名义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

“让主席批示，公开肯定江青同志的伟大斗争精神，堵住那帮阴谋家的臭嘴。”

“完全正确！”

“不过，”姚文元有些犹豫地说，“万一江青同志不同意这么

做呢？她是很自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的。”

“我想她会同意的。”张春桥的语气非常肯定，“对付阴谋的最好武器，就是把它公开。我给她写几句话，你很快飞回北京，先找她谈一下，然后建议文革小组开会，我也回去，共同向毛主席上书。”

姚文元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江青听了这个建议，鼓着腮帮子考虑了很久。她知道他们完全是好意，也完全理解他们对自己的关心是和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是一致的。现在，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扭曲了自己的形象，何况此事再封锁也是难以完全保住密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些反革命组织正利用此事大作文章。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地散布添枝加叶的谣言，不如自己把它公开。看他们谁敢把老娘怎的！想当初，上海那个花花世界的大报小报，发表了那么多攻击、诽谤我的东西，都无损我的一根毫毛，现在公布这封信，看谁敢放声歪屁！

想到这里，江青叹口气说：“也可能是当事者迷吧，我现在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意。既然你和春桥认为这样，那你就去找找老夫子，和他商量一下看怎样办更妥当。”

陈伯达做梦也没有想到，江青会来这么一个回马枪！这一招的确厉害，使他措手不及，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其实，江青在上海的那段历史，他也清楚。今年二月初，因为一件小事他和她吵了起来。江青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我鄙视你！”他立刻反唇相讥：“你是什么东西？你说说你是什么东西？”他本想说几句更难听的话，但话到嘴边，忍下去了。这回，她把那个“球”打回来，让自己发球，岂不使他大为作难吗？

话又说回来了，这也是他逢迎、讨好她的机会。对这个女人，他已领教很多了，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她极善于隐蔽自己，

善于向人暂时献媚，然后再操纵你、驾驭你。一旦发现你有离心倾向，能够成为阻碍她的潜在势力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打下去，加以消灭。他当然明白，她之所以把关锋端出来，某种意义上讲，不是讨好自己和康生吗？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报答她，能打得通吗？

他把姚文元打发走后，翻开了那本刊登蓝苹公开信的杂志，仔细浏览起来。不然，自己怎么好作文章呢？

“……这以后，我开始爱了别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爱了别人，与他有什么相干！他没有理由过问，更没理由让我顾及他，可是他回来知道这事以后，第一次用示威的态度跑到我家里责问我，不知说了多少使我气得流泪的字眼呀！可是我把头偏在一边不要他看出我的难过。因为不久以前的白天演《大雷雨》，同时夜里拍《王老五》，使我的身体坏到极点，尤其是心脏衰弱的更厉害，他来的这天又正是我连着拍了两天夜戏的时候，我又病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骂，可是我呢？我却平静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啊！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又说到我和他分居时给他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是他自己不要的，他跟 清算了的！难道我跟他已经清算过了还不能爱别的人？就是不清算，我也有权利爱别的人呀！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后走了。可是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一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敲都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

的声音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所有给我写过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小的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的所谓‘新闻政策’，我绝对不会象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不动地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陈伯达用拳头轻轻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为着是使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文若其人，果然如此。这篇公开信，的确淋漓尽致地透视了江青的性格。在这样的人面前，如果反其道面行之，后果是可想面知的。

陈伯达作出了他认为是聪明的选择。

他铺开纸，拧开钢笔，坐到书房的写子台前，笔飞墨舞地写起来——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三十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了共产党人无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

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共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然后是“此致、敬礼”，并第一个签了自己的大名。他满意地看了一遍，站起来。

他准备和康生通一次话，商量一下文革小组明天的会议内容。

叶群接到江青的电话，按约定的时间到了钓鱼台十一号楼。

与往常一样，她们见面还是如隔三秋般地握手，问寒问暖，说些看起来亲得不得了的好听话。

叶群比江青小四、五岁，有一段比江青的历史还要复杂的经历。她原名叫叶宜敬，一九三五年初春曾在北平师大附中初中部上学，第二年加入共青团，后来不明不白地又入了共产党。为此，有人到处散发信件和材料，说她是假党员，是与王实味长期鬼混的“坏女人”等等，在文革前夕搞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点燃起叶群的权力欲望。特别是作为林彪的联络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她经常在钓鱼台的几座楼里出没往返，进行着一笔又一笔的政治交易。

叶群和江青相比，更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如果说江青还在文艺、理论、读书、写字及其他爱好方面有过人之处的话，那么叶群除了凭着林彪的权势发号施令、施展一些政治手段外再没有多少特长。她是个性格外露、爱吹爱擂，喜欢出风头显示自己、一刻也不甘寂寞的人，为此，罗瑞卿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政治交际花”。

“江青同志，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我是你的军帐小兵，时刻听你吩咐啊！”叶群在江青面前并不敢造次，是甘拜下风的。因为她知道，自己还没有羽毛丰满。

“请你来，看一件东西，并请你亲自带给林副主席，让他批一下。”说着，江青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大纸袋，递给叶群。然后她靠在沙发背垫上，闭上眼睛听任思绪起伏万千。

叶群打开一看，差点惊叫起来。

里面装的正是那份《我的一封公开信》原件。但是，里面还夹着一封信，是陈伯达的手迹，最后的签名却包括了除江青之外的全部中央文革成员。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三个字上已经画了一个大圈，圈上引出一条线，批了几个大字：“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她认识那苍劲有力、运笔奔腾的字迹，那千真万确是毛泽东的手笔。

好家伙，江青不亏是江青，竟然把这么一段历史不仅翻了个底朝天，而且涂上了鲜红的颜色。他情不自禁地又重读起那封信来：

“……唐纳的一再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之间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的作怪。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一般人视为良好的两性关系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之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想让唐纳受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在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蹂躏吗？不！蓝苹是个人，永不退缩，尤其是对这样无耻的手段。就是在他心目中，我既然变成那样一个可耻的女性，大可不必再理睬我，我都没有脸理睬他，从那天起我不再理他。同时除了一两个最接近的朋友以外，我也不想对任何人讲起这回事。因为我怕人家说我是向人乞怜，并且也没有讲的必要。因为我对得起唐纳，对得起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怕，我将倔强地活下去。可是我现在不能不讲了，不然人们将说我理亏，更加要欺侮我。

“二十七日那天，我从乡下回来，发现他留的条子和一管水笔。还有，他偷走了我两本日记。因为他说过他决不再自杀，所以在那些隐约的字行里我没想到他再自杀。可是他又自杀了。在他没有自杀以前，就有一部分朋友，不知道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内情，还是真正为他们的友情，或是……对我表示了不满，这个我是很知道的。

“他的自杀，我并不知道，只是从一个好朋友，也是唐纳的

至好朋友——他是最了解唐纳性格及我们的纠纷的——知道了一点。同时又听到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在打汉奸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

“我仅仅是想说明事实，并对大家表明我对唐纳的态度，此外并无别的企图。因此，这事一说明，我不愿再为着这个无聊的事情来浪费头脑和笔墨因而浪费了报章的可贵篇幅。我对这类无聊的事情，没有兴趣再来哆嗦了。我是需要看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放在我事业上去！”

“对了，今天报上说唐纳并未自杀，是谣传。我诚恳地这样希望着。”

这封公开信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其实，这些东西她早就看过了，而且叫林立果等人作了复制。但她不能表现出来，她得装作是初次看到的一样，因而这次看得很认真。她看完这篇东西，心里冷笑一声：什么玩艺儿，还吹得这么高！但是她一抬头，吓得咧开了嘴。只见江青睁着眼睛，一动都不动地盯着她，像能剖开她的五脏六腑，挖出那颗心。

叶群打了个激灵，本能地抽泣起来，身子一倒，抓住了江青的双手：“好姐姐，我真没想到，你年轻时还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和打击，太不幸了，太不幸了！我们都是苦命人呀，要不是主席领导我们革命，我们女人们哪里会有今天呀？”

“现在还有人利用封建主义的那套枷锁来欺负我，但是我不怕！”

叶群轻轻拍打着江青的手背：“是的，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斗！我最佩服你的斗争勇气和革命精神，要是我呀，非被他们逼死不可！”

江青对她的话无动于衷，她不需要这些。那些好听的话，都

是廉价的吹捧，只要手中有权，要多少有多少。眼下她需要的是堵住那些从阴沟里吹出来的蜚短流长。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让叶群下不了台，便反过来握住她的手，仔细地端详了好一阵，温和地说：“我现在再一次求你了。”

“哪里话，我们都是自己人，怎么谈得上‘求’字？”叶群说着便噙着热泪假向她。

“你亲自把这份材料带回去，让林副主席批句公道话，然后给我复制二十份。我要保存着，今后谁要再向我挑战，我一定要狠狠回击，给他们以粉碎性、毁灭性的打击。”

叶群从心里打了个冷战。她对眼前这个女人又多了一层认识，也增了一份警惕。她已隐隐感觉到，也许今后的某个时间里，她们之间一定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火拼。

在返回毛家湾的汽车里，叶群可真动起了脑筋。怎么办？真的让自己的丈夫也批上几句话，和她的耻辱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岂不是授人以柄，用我们自己的手为她向上爬搭梯吗？何况林彪也是个刚强的男子汉，他未必会拜服在她的衣裙下。何况我们，并不是得力于她升上来的。某种程度上讲，她、甚至包括最高领袖，都是得力于我们才使他们的地位巩固的。这样一想，她的胸脯很自然地挺起来了。

对，不能让江青随心所欲地指挥首长。但是又怎样解决这份材料的问题呢？

很快她便有了自己的主意。叶群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不像江青那样，有时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全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她很清楚自己的价值，人们之所以逢迎、巴结她，是因为她有林彪这个丈夫。舍此，她绝不会有今天的一切。为了能把林彪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她利用了办公室主任的一切权力，制定了一切有利于自己专权的措施和制度。为了在政治上留下退路，她还说服了林彪，培养了一个专门模仿林彪笔迹签字的小秘

书。这回，正好用上他！

回到毛家湾的时候，天已晚了。

她进了她的办公室，得意地对身旁的秘书们说：“你们看看，这可是一份难得的珍品。”等秘书们看那几份材料时，她话中有话地强调：“这涉及到对十一号楼的评价，而且有主席的亲笔字，非常宝贵。现在要给首长讲讲，首长也要有个明朗的态度。”

秘书们一看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又见叶群一脸神秘相，便推托说：“首长就要休息了，临近休息前听讲文件会影响睡觉的。”

这正中叶群的下怀。她马上笑咪咪地说：“既然如此，不给他讲了，明天再补。你们把小李叫来，他会仿首长的字，叫他代首长批句话就成了。”

小李名叫李根清，是毛家湾机要室的机要员。小伙子刚二十出头，当时还是战士的待遇，他长得眉清目秀，挺机灵，很讨人喜欢。由于写得一手好字，便被叶群选中，专叫他模仿林彪的手迹，准备在特殊场合下派用。听到秘书们叫他，慌慌张张跑出来。

秘书们开他个玩笑：“主任要重用你了。”

“你们老拿我开心。”

叶群很庄重地说：“是要重用一下你。”接着把材料递给他，又把她的想法说了一遍。“批什么呢？”

叶群早已成竹在胸，就脱口而说：“批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

“这么高呀？”秘书们都吃了一惊。

叶群手一挥：“你们没看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致结论吗？而且毛主席也已认可，首长表态低于这格怎么行？就这样写，出了问题我顶着！”

于是，一份伪造的林彪批示就这样出笼了。

叶群很满意她的佳作，又让秘书们把这几份材料带上，去军委办公厅复制了二十份。然后兴冲冲地去交给江青。

江青丝毫没有察觉到叶群的这场戏中戏，还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呢。

叶群没敢在钓鱼台久待，匆匆地乘车回到毛家湾，好像有什么急如星火的事在等她。

## 4

## 杨成武著文留祸根 戚本禹写信伏危机

《空军报》编辑部简直是一座神秘的小小情报机关，设有各种各样的小组，负责掌握空军部队的思想、政治、军事动态，并给空军司令部的首长提供参考材料。这里的工作人员对外都有一种自豪感，许多人都知道林彪的女儿在这里当副总编，实际上是真正说一不二的人物。她那间办公室，布置虽然简单却有很多讲究，电话也很特别，使人难以摸透房里的主人每天究竟忙些什么。

杨易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她热情、本分、谦虚、好学，眸子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不安地跳动。是的，这里的条件、生活都很好，但是人和人之间总有股说不出的感觉，好像互相提防什么，说话也是左顾右盼，仿佛屋里安装着窃听器。这种气氛的压抑感，使这位正值青春妙龄的姑娘稍有点憔悴。她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编辑工作上，这才是她的本职啊！

下班时间到了。杨易将额前的秀发往后一拢，红润光泽的两腮浮现出来，就像囚在笼里的鸽子要出去飞一圈似的欢乐起来。她等同事们差不多都走了后才提上那个精致的小提包，走出机关

的大门。

“小杨，等你半天了！”

一辆黑色小轿车开到她跟前，露出丁志强的半截身子，他亮着嗓子说：“快上车，我送你回家！”

杨易欢喜地跑来，那身崭新的女军装把她映衬得亭亭玉立，浑身上下洋溢着少女的青春气息。只有这时，她活泼、开朗的性格才得到充分的显露，一颦一笑地上了轿车，感激地说：“又劳你辛苦了！”

“别谢了，是余政委让我每天照应你，我可是奉命办事。”

“那我谢余政委，也谢你！”

“怎么谢呢？光嘴说可不行啊！”

“再借给你两本诗集。你不是喜欢读拜伦的诗吗？我给你又找来一本。”杨易说着，就把包打开，掏出一本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书递给他，“记住，别人不准随便看，看完以后还得还我。”

丁志强喜欢文学，特别是喜欢读外国的散文诗、宝塔诗、十四行诗一类的作品，偶尔自己也写点诗歌，想通过杨易在《空军报》上发表。只是他当上余立金的秘书后，紧张的工作使他无暇写诗，只成为一点爱好了。那天余立金给他布置任务时，顺带提到：“杨代总长的女儿杨易在报社工作，姑娘家刚去，总长和赵志珍主任很不放心，你负责接送一下，别出什么意外。”

丁志强对余立金忠心耿耿，交待的任务从来是严肃认真、不折不扣地执行着。

很快，杨易和丁志强的每次接触，都有小报告飞也似的传到了空军党委办公室。

“你们党办的丁志强每天都到报社去找杨易，进行秘密幽会，吊膀子、谈恋爱，影响极坏，你们要注意点。”

“丁志强的老婆又和他吵架了，骂他晚上为什么不回去，丁

志强吞吞吐吐，不敢辩解。”

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的年月里，男女之间的交往是最敏感的东西。那些穷极无聊、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喜抓住这类事大做文章，蓄意整人害人。祸种一旦埋下，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赵志珍既是杨成武的妻子，又兼总长办公室的主任。总参谋部的活动和日常工作，许多都要经过她亲手办理。她不像别的女人，一味地靠逢迎、见风驶舵去帮助丈夫巩固阵地，进而捕获更大的收获。她忠于自己的职守，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在部队各单位、各兵种建立起工作网络、信息网络，然后及时地将各种情报、材料收回来，小心谨慎而又准确无误地进行分类摘要，传递到代总参谋长面前，供他思考和决策。

总参谋长，要和大量的情报、机密打交道，因而必须突出“准确、及时、安全”六个字，为此没有坚定的原则性是不行的。

在空军司令部，她看不惯吴法宪那种顺竿往上爬，既无原则又无党性的作法，而赞赏余立金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她知道空军机关比较复杂，既有派性，又有尔虞我诈的阴谋在内，稍一不慎，就可能陷进去。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署名“吴法宪”的文章《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一下将吴法宪的身价抬高了许多。

赵志珍对余立金说：“吴胖子又在搞新花样，这是拼命为自己造舆论嘛。”

余立金说：“就这，文章也不是他写的，是周宇驰、刘沛丰和林立果搞成的，原来是准备以‘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的名义发的，不知怎么搞的又换成了他的名字。”

“我原来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提出过意见，建议改一改，但是他们不干。我把文章拿给总长，总长也说：‘以林副主席为光

辉榜样，那毛主席是什么榜样，这样提不大妥当。’我再一次告诉吴胖子，他瞪着眼睛说：‘就这样提，你不要管，出了事我负责。’”

赵志珍冷笑一声：“他是一箭三雕，名义上忠于毛主席，实际上既树立了他，又吹捧了林彪。这种把戏也算一个创造吧。”

相比之下，总参党委写的那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倒比他的文章干净些。想到这里，她不由问：“那篇文章送上去这么多天了，为什么不见刊登？”

杨成武说：“陈伯达建议文章以我的名义发。叶群也给我来了电话，说林副主席也认为以我的名义发好。他们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在延安，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就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也是用江华的名义发的，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也是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

“既然如此，也不应该老拖着嘛。我打电话给老夫子，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成武想了想，说：“你不用催了，还是由我来问吧！”

电话打到陈伯达办公室时，姚文元正好在他家里坐着研究《红旗》杂志第十六期的内容。姚文元见他哼哼哈哈地在电话里说了半天，最后说：“好吧，我很快处理吧。”然后放下电话，长叹一口气。

“谁的电话？”

“杨代总长。”

“还是那篇文章的事？”

“可不嘛。”陈伯达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面孔说：“看来不发是不行了。戚本禹也催过我，说杨总长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

的声音的，就是要在全中国、全世界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为什么拖到现在不发呀，杨代总长可是很有意见了。”

姚文元说：“这个杨总长也真是的，着什么急呢，等再做做工作嘛。我听江青讲，林副主席和叶群不同意多宣传他，江青也有这个意思。要不，我们再征求一下她的意见，你看如何？”

陈伯达皱了皱眉头：“也好。”

姚文元去拨江青的电话。

江青现在完全沉浸在一种极度的喜悦和兴奋之中，又经过一场较量，还是她赢了。就像走完了一段艰苦的旅程，她突然感觉到了疲乏。她是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这时她想到该隐退一段时间了，不能把自己老推在第一线当枪使，她应该像毛泽东那样，放手让大家干，自己总是把握着方向。于是，她给秘书和办公室人员作了交代：从现在起，杜门谢客，谁也不见。对外就说我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一切事情由陈伯达、康生他们看着办。

姚文元把结果告诉陈伯达时，他很高兴。作为政治家，不管他是什么层次的人物，喜欢按他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和决策来处理问题，当他自己按照他的脚本导演一番剧目时，即使现实充满着痛苦，他也觉得美妙。这一年多来，陈伯达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木偶，大事小事都得看那个女人的眼色行事，听她的指挥，稍有不尽她意之处，便没头没脑地受一顿抢白，他觉得实在窝气。现在，她既然把挑子推到自己这儿了，我何不放开手脚大干几天！

于是，他说：“文元同志，我看这样决定吧，杨代总长的这篇文章就定在《红旗》十六期上发表，到十一月中旬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不过，要放在第二版，不要太突出了。这样也好向江青同志交代。”

姚文元说：“既然你定了，就这样吧。”

陈伯达高高兴兴地给杨成武打电话，讨好地说：“你的文章

定了，大约在十一月中旬发表，我再帮你修改修改，润润色。怎么样？”

萧力到钓鱼台办事，既不要事先请示，也不需出示任何证件，从门岗到办公室的人员都认识她，她朝大家连连点着头，就径直进来了。

江青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有事，急忙放下手中的文件，替她整了整额前的头发，把水端到她跟前，说：“别急，先喝点水。”

萧力清瘦的脸庞微露愤怒之色，从黑色文件包里掏出一个大信袋，扔到桌子上：“妈妈，戚本禹果然是刘邓、彭真伸向中央文革的黑钉子，你看吧！这是红卫兵从彭真家里抄出来的戚本禹给彭真的信，肉麻极了。彭真把它压到桌上的玻璃板下，被造反派发现了。”

这两天，江青正在审理关锋、王力的专案材料，一听发现戚本禹的信件，马上抽出来审读。信是写在红旗杂志的稿纸上的，歪歪扭扭的大字占了整整两页，上面写道：

最敬爱的彭真同志：

非常感激你在百忙之中召见我和关锋同志。你谆谆善诱的谈话，使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我们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特别是我，说话又比较随便，特别需要您这样的老同志指导。

我在未和你谈话之前，还有点拘束。但是到你请我们吃饭时，就已经像在自己的亲人家里一样了。我将遵照你的指示，加强思想改造，争取把工作搞得更好。

敬礼！ 戚本禹呈

江青看完此信，连连摇头，冷笑着对萧力说：“老夫子说他们是变色的小爬虫，果然不错！这下我可抓住了他的确鉴证据，看他怎么说！”

“妈妈，这封信《文革快报》上发不发？”

江青回头看了那封信一眼，对女儿说：“现在不发，我要让他再跳一跳，暴露得再充分一些。”

这封信要出问题，是戚本禹意料中的事。

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初，戚本禹和关锋在通县搞“四清”，正好北京市委书记处第二书记刘仁也在那里蹲点。当社员们起来揭发大小干部的问题，农村出现混乱苗头时，刘仁按照彭真的指示，在通县作了个讲话，说：“四不清干部应互相批判，采取劝善规过的方式，绝不采取立三、王明路线，把人一棍子打死。就是对那些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是小会帮助，不能搞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农村各级领导班子中要有改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原有干部的撤换面不许过大。动不动就换干部，这不成了轮流坐庄，互相拆台了吗？像那样，非亡国不可。换掉一半，就没问题吗？你换人的觉得没问题，被换的觉得有问题。那些新上来的干部虽然什么毛病也没有，但就是不能领导三大革命，就是废物。”

听报告的时候，戚本禹对关锋说：“刘仁的报告有问题。第一，束缚群众手脚，制造条条框框，不符合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观点。第二，毛主席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却采取的是保护措施。不管怎么说，报告起了破坏城乡四清运动的结果。第三，北京市委对我们中央机关下来的工作队，实际上是一不欢迎，二不合作，三刁难，四搞臭，五赶走，这还不算问题吗？”

那时，戚本禹刚从中央办公厅调到《红旗》杂志社，对关锋很尊重，写什么文章，有什么事都要和他商量。

关锋说：“你的意见有道理。看来刘仁的讲话，和毛主席的指示有些是矛盾的，有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下来以后，戚本禹给《内部参考》写了一篇文章，点名批评刘仁的观点。还特意提到：“哲学家关锋同志也反对刘仁的这些

错误意见，认为这样指导运动，只会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邪路。”

没几天，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在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引起了一番震动。

彭真看了这篇东西，就打电话请关锋和戚本禹来谈谈，并亲自派车把他们接到家里，热情地和他们交换意见。

彭真说：“刘仁同志的报告，是根据北京市郊区的情况讲的，并不准备公开发表，我是既不准备吹，也不打算批的。你们俩很有才气，又是搞理论研究的，我看你们不要死扣字眼，扣字眼也会滑向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哟。我建议你们到下而走一走，多跑一跑，接触些实际工作。我给你们要车，你们什么时间下去都可以，我给你们提供一切方便。”

然后，彭真在家里举行了一顿便饭招待他们，和关锋、戚本禹一起碰了杯，喝了点酒。

戚本禹回到四清点上后，正赶上陈伯达到处找他。一见他回来，就心急火燎地说：“你怎么向北京市委乱开炮呢？刘仁的报告是根据彭真的指示写的，你矛头指向刘仁，还不等于是批彭真同志么？这要闯祸的！你马上给彭真同志写份检查，收回你那篇文章中的观点。”

“我想一想。”

“不是想，而是服从组织。你这样写不要紧，人家会以为是我跟《红旗》的领导都支持你呢。其实，我们很理解北京市委的情况。”

没办法，戚本禹只好写了上述那封信，去找关锋征求意见，问：“老关，我这样写算不算出卖原则？”

关锋很能沉得住气，思考着回答：“先别急，让我考虑考虑。”

戚本禹说：“不管怎样，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彭真还是挺民主

的。”从关锋住地回来后，他没再和别人商量就把给彭真的信发走。

彭真遭到毛泽东的批判后，一开始便受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冲击。戚本禹总担心那封信落到造反派手中。他曾和个别群众组织的头头打过招呼，让他们抄黑帮家的时候注意他的东西，但是没有什么动静。

他绝对想像不到，三年之后他给彭真的信会落到江青的手里，成为置他于死命的一颗重磅炮弹。

一连几天，江青总是在她的办公室或中南海她的住地秘密召见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头头，挨个和中央文革文艺组的成员谈话。谈话前后，她都正色告知他们：“回去以后，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和你们谈话的情况，否则就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到时候我就要治你们的罪！”

这一招的确管用，不但戚本禹，连陈伯达、康生也蒙在鼓里了。

那天晚上，戚本禹给江青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有要紧事告知，秘书问她见不见，江青把头一扬：“见，让他进来！”

好长一段时间没见江青，戚本禹显得有点局促不安。他挤出笑容看了看她的脸色，说：“十一月八日晚和十二日，中央文革文艺组召集中直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开一个文艺座谈会，伯达同志和康老让我问你能不能参加？”

“你说呢？”

“当然大家都希望你参加。特别是文艺界的战士们，都很想念你。”

“那可不一定！”江青话中有话地说，“有些家伙恨得我咬牙切齿，总想把我架空，和小将们隔离开来，他们好捣鬼嘛。别看有人表面上对我尽说好话，口口声声‘敬爱的’长短，其实他们对彭真、对刘邓也是这一套。谁有权，他们都会巴结，一旦我倒

了，他们也会叫喊踏上千万只脚的。”

戚本禹陡然变色，脸成了红脸关羽。

江青一下子又沉下脸：“但是，老娘不会受他们的骗，想在我头上动土，我就让他粉身碎骨！”

戚本禹浑身打了个颤，脸白得像张纸：“江青同志，谁胆敢反对您，我们一定要和他拼！我保证用实际行动来誓死保卫您。”

离开江青的那座楼后，戚本禹才露出那副沮丧而痛苦的神色，昏昏沉沉地回到了他的住地。果然，他已经从十一月九日晚八时的座谈会上听出来点名堂，江青的讲话锋芒毕露，好像正和谁在斗气。他很快想到了自己，但又想到这两年来对她的忠心耿耿，甚至到了甘当走卒而棒打不走、弹打不气的地步，为什么这位女人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十二日晚八时，座谈会继续举行。戚本禹硬着头皮跟在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的身后，和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并肩走进会场。顿时，会议室的气氛热烈到了极点，仿佛远方的雷声轰响，又仿佛是海浪在撞击礁石，掌声把一切都淹没了。

好像事先都作了安排，陈伯达总是把江青推到了最突出、最重要的前头，说：“九号的会上江青同志作了很好、很好的讲话，今天再请她给大家系统地、全面地讲一下。然后，大家要把她的讲话录音在文艺界各单位放，大家讨论。上海也可以放，全国放，使文艺界来个大进步。现在，请江青同志继续讲话。”

掌声久久平息不下来。

江青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开始讲话：“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话给同志们讲，我觉得很对不起。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或是有什么意见，我是能够谅解的。因为同志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做文化工作，在文化界只是打遭遇战。进城初期，我是遵照

主席的教导，想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树立两支队伍，一支就是创作队伍，一支就是评论队伍。但是，人家专了我们的政，他们用各种手法不执行主席的路线。而我们呢，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又有一个工作岗位的问题。主席在这方面，那是很注意的！我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哨兵。”

杨成武并没有多大兴趣听这番话，而正和吴法宪小声地争论什么问题。看样子吴法宪并没把他放在眼里，打着手势反驳着他。

江青的话逐渐涉及到了具体问题，使嗡嗡乱响的会场气氛一下子静得成了死海一般。

“你们有的单位实质上是死水一潭。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要重新打乱。像新影，像芭蕾舞剧团，是属于捂着的。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从你们的发言里以及从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里，都可以看到这点。现在搞深搞透了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所以我觉得对文艺界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要稳、准、狠——对敌人；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对朋友也不要老打内战。打内战，就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有时候就是在背后操纵你们打内战，他就乘机溜了。这一点你们要识破。

“在目前，十一月还有半个多月，十二月有一个整月，春节前还有二、三个月，在各个单位里，是不是把队伍先树立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否则，创作思想很混乱，那就不能够搞创作。用创作的名义来压革命，那是错误的……”

戚本禹感到了一阵昏眩，实在坐不住了。

不了解内情的人，很难从这些话里听出她的真意。但是熟悉这一段文艺界状况的人，都清楚这番话的锋芒，是冲着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冲着戚本禹来的。

戚本禹预感到，文艺界一场风暴，其实哪里是文艺界，而是整个上层、整个社会上一场巨大的台风又要到来了，眼看就要来了。

因为那几个需要大乱的单位，正是他插手解决的认为是自己人掌权的好单位。

这时，只有这时，他才感到人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时光，没有枪声、没有噪音、没有人和人的勾心斗角，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有充足的时间来全面分析自己、发展自己，为人类的幸福大家都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

被打倒并不是什么恐惧的东西，他们已经见得太多了。他们人人都可能是“阎罗”，人人也可能要作断头鬼。这种斗争的火种越接近尾声，人们越是无法感觉到自己在未来闭幕时究竟扮什么角色。命运往往戏弄着别人，也最后戏弄着自己。戚本禹深深看了江青一眼，啊，这个命运的主宰者，真的会保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吗？他从心里问自己。

## 读文章恩来承帅命 发诗兴泽东背古诗

毛泽东有个习惯，当天的报纸非浏览一遍不可，重要的文章都要仔细地读。

秘书把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放在桌上时，他正用冷毛巾擦脸。第一版是《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是他近几年来有关教育的语录汇集，他一翻而过。图纸二版就是那行醒目的大标题跳人眼廉：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三个字。

他冷笑一声，坐下来，抽出红蓝铅笔，认真地读完了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有人以为，他年事已高，对他只要多说好话，多唱高调，多喊万岁就能把他蒙哄住，甚至认为林彪并没有多大本事，只是凭着喊“毛主席万岁”爬上来的。所以，这一段相当一批干部或新贵都在他跟前大献忠心，争先恐后地搞什么“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以此来取悦这位当代伟人的好感。其实，他们

完全估计错了！

看完这篇文章，他不由得轻轻叹道：看来，在我们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呀，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连马列的常识都没有吃透。像杨成武这些军事干部，出点问题尚可原谅。而像陈伯达这样的理论家把关，竟出这天大的笑话，真是令人不能容忍！他站起来，心事忡忡地对着窗外，背了一首刘禹锡的永史诗：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

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

“主席，总理请你接电话。”

秘书见毛泽东站在窗前，陷入了沉思之中，不敢多惊动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走到桌旁，轻声说了句。

毛泽东站在那里，像座石雕，纹丝不动。秘书正要退出时，他才说了声：“让总理到这里来一趟。”

从去年八月，毛泽东离开他住了十七年的丰泽园旧居，搬到中南海“游泳池”居住。这里的建筑像一个巨大的堡垒般的别墅，四壁都是书籍，旁边紧靠一个现代化设施的游泳池，是周恩来提议，用毛泽东自己的稿费修建的。从这里连通地下铁路，备有特殊的隔音、照明和通风设备，如有紧急情况还可以马上乘电梯进入地下室。

“游泳池”住地的最引人注目处，是他的书房。这里的各种线装书和古今中外历史书，都是从他大量的藏书中精选出来的。搬到这里后，除了休息，他几乎整天都在这里工作和学习，有时也在这里会见党政军的负责人或外宾。这几个月来，他已深深懂得周恩来的重要。没有总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不知会混乱到什么田地！

周恩来比毛泽东小五岁，同样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

党的领袖相比，他有着更加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更重视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讲究实效。从小便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这点，和毛泽东不谋而合。

毛泽东对他的历史，可以称得起“了如指掌”，进行过各方面的认真考察。他总是把一个政治家的青年时代同他后来的实践加以比较和分析，这样最能考察出他的品质、动机和成熟或堕落的轨迹。他认为，在所有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最称职的。“把你们文革小组所有的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周恩来。”——他对江青这样说。

周恩来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一户大官僚家庭。幼年父母早丧，便由伯父、伯母把他抚养成人，十二岁时随伯父到了沈阳，进沈阳师范第一小学读书。在此期间，受江浙地区革命组织光复会民族气节教育和康有为启蒙思想的影响，上附小的第二年就剪去长辫，在本子上写下“为中华腾飞世界学习”几个字，用于激励自己。一九一三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不久便在同学中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出版了《敬业》杂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春日偶成》的两首五言绝句，很快广为流传：

极目青郊外，烟霜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跟。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他的才华天资，博得了他的老师张皋如先生格外赏识，对他喜爱备至，勤加教诲。一天，张先生把自己的一首诗送给周恩来看，上面写道：

九月二十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在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意。中国生命已断送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

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客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

周恩来知他素有爱国民主思想，平时又非常支持学生的活动，忍不住当即挥毫，和诗一首：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这首诗，一下子把卖国政府的昏庸、无能和革命青年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革命的前夜，周恩来随同四千多留学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他先后学习一年多法律，便忙于组织秘密团体，领导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很快遭到日本当局的镇压。于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他和多数留学生被迫回国。重返天津后，马上投入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此时，他结识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邓颖超，她是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

为了抗议天津警察局镇压学生、查封学生组织的卖国行径，周恩来发动各界群众，于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初包围了直隶省公馆，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省长曹锐和警察局长杨以德密谋策划，以“谈判”为名，逮捕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四名学生代表，将他们投入监狱。在牢房里，他给难友们讲解马克思的学说，鼓励代表不妥协、不让步。当邓颖超等女学生提前释放后，又冒险来到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探望他们，告诉他她们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周恩来写了一首诗赠给邓颖超，上面写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一天都不会得到的。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致勃勃的向上，  
 全恁你的奋斗壮胆。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的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恁你这心头一念。

……

邓颖超读到这火一般的诗后，更加深深地爱上这位英俊的学生领袖。

在群众示威的压力下，天津当局被迫释放了周恩来等学生代表，但他们却被南开大学所开除。经和“觉悟社”的学生们研究，他决定也到法国勤工俭学。到北京他会合了正在倡议赴欧的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王若飞、李维汉、徐特立、李立三、陈毅、邓小平、聂荣臻、饶漱石、还有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布年等学生，买了四等船票，从上海出发到了法国。

在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向中国学生和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

欧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在国外停留了四年，他深深感到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一九二四年八月回国后，经向中央要求并经批准，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部长。然后，他亲自领导和参与了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对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士兵的勇猛顽强，长年征战，使他认识到指挥官担子的艰难和责任重大。

一九二六年冬，他调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江浙区军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职务。他马不停蹄地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和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为创建中共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上，他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后的近四十多年里，他一直担任着党中央的重要职务，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共的一次次路线斗争和领导人的变迁，使他把维护党的团结和大局放在了压倒一切的首位。

他坚信，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反动派之所以几次扼杀中国革命，归根结底应归于党内没有完全实现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周恩来认为，不应该，也不能再离开毛泽东的领导而试图走别的路线了。所以，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后，他就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来维护这个核心，无比忠诚地支持毛泽东，协助他解决国内外的大小问题。他把这一切，看作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不应夹杂任何个人的私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他奉毛泽东之命，乘飞机将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接回北京，心甘情愿地拥护毛泽东将林作为自己接班人的提议。尽管在文化革命的每一个关头，他对出现的种种倾向不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甚至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产生了极大

的愤怒，但是他不想以自己的名义出面同他们较量，他知道那样会适得其反，甚至造成党内更大的分崩离析。他非常尊重毛泽东，以缓慢而又吃力的努力纠正着文化革命中的偏差和错误，小心翼翼地影响着党的最高领袖，帮助他渡过一个又一个的险关。

“杨成武的这篇文章你看了吗？”毛泽东将报纸拿起来，在空中扬了扬。

周恩来笑了：“看了，都是群众中普遍流行的语言，他给归纳了。”

“归纳了也是错误的！什么大树特树，党和领袖的权威能够人为地树立起来吗？”毛泽东使劲地把那张报纸甩到桌上，“书越读越蠢，我们的许多同志连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分不清了！搞起绝对又绝对，纯粹又纯粹的东西了。”

周恩来明白了党的主席叫他来的用意了，他的确感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一片狂热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是一般的领袖很难做到的。他坐下来，轻轻地说：“主席，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两方面来看，广大群众包括我们的干部，以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杨成武同志组织笔杆子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要保护这种热情；其次，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些提法，的确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应该也必须纠正。但是，我主张慢慢地做工作，不要引起震动，否则又要制造许多麻烦。”

你的意见很好，也在小规模的范围內打个招呼，不要被人利用。”毛泽东说。

两人会意地笑起来。周恩来见他的情绪很好，马上取出一份需要保护的科学家、文化界著名人物和党外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单，请他审阅。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完这份名单，提起笔来说：“应该再加上谭震林这个人，所有二月逆流的这些老同志都要保。有人要烧

他们可以，我是不能让他们把这些宝贵财富烧焦了的。这些人有多大问题呢？无非是看法不同罢了。看法不同是可以研究，可以统一的，处理错了可就麻烦了。恩来同志，中央专案组搞得怎么样了？”

“有些人主张杀一批，关一批。”

“是不是江青他们？”

周恩来笑着摇摇头：“是一种左的思潮吧！”

毛泽东严肃地说：“所有被打倒的人，一个都不能杀！统统养起来，什么时候需要，还要用呢。人头可不像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人头掉了还能长吗？你们不是说我英明吗？什么英明，无非是对反我的人采取一个不杀的政策。这样，一旦发现错了，及时改正。”

“这就是伟大之处。”周恩来说，“许多老百姓说我们的老干部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临斗得快要死了，还在高喊‘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的眼圈立刻红了，他站起来，果断地说：“从现在起，要分期分批地解放干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使大家都锻炼一下，而不是把人整死。”

“那好，这批要保护的名单我就在下一次会上宣布了。”

“作为文件发下去，最起码使各省市、军区、部队的负责人都知道。”毛泽东走到书房跟前，忽然想起什么，抽出一本书来问：“记得你青年时期也喜欢写诗，是不是？”

“那时想入非非，信笔就写。现在忙了，顾不上再作诗。”

“那也应该看些，读些文学作品。你看过《古诗源》里苏伯玉妻写的《盘中诗》吗？”

“读过，现在忙起来，通忘了。”

“不该忘，不该忘！”毛泽东抽下来那部书，按标签打开，说：“他的妻子写了诗，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急怒，此

深于情。这有点像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那很不好，只会结怨。”

周恩来也站起来，凑到毛泽东跟前看那部书，只见对这首诗全部加了圈点。诗末编者的注释除圈点外，还划着曲线；在“用意忠厚，千秋绝调”处句末连划三个圆圈，批着“熟读”二个字。

毛泽东将书递到周恩来手里，说：“我让江青把这首诗背会，大概是她不感兴趣吧，三年了也背不下来。你拿着书，我给你背两段，如何？”

周恩来难得见他有如此雅兴，笑着说：“好啊！背错一个字，你要受罚。”

“好！”毛泽东大声回答，然后面对窗户抑扬顿挫地背了起来：

“山树多，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心中悲。北上堂，西入阶。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谁谁。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巾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苏，字伯玉。人才多，知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周四角。”

“好！没错一个字！主席，你的记性真好。”周恩来由衷地赞叹。

“对这位不知名的民间女子的诗，应该记住。”毛泽东说，“从这首诗里，我们应该感悟到什么？总不能瑞‘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了吧？”

周恩来再一次感觉到了这位伟人的胸怀。

毛泽东仿佛刚从诗情书间中解脱出来，望着老战友日渐消瘦的面孔说：“在干部问题上，不搞小团伙的，在我们这儿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我！”

## 6

## 代总长一文成箭靶 毛统帅两面抚僚臣

江青得到毛泽东关于杨成武那篇文章的看法后，吃了一惊。她急忙找来《红旗》杂志第十六期，认真通读。

“哼，果然是篇拍马屁的东西！”

在办公室，她最大的工作就是翻阅那些数不清的《来信摘要》、《情况汇报》、《文革快报》、《内部参考》一类的材料，然后就是掌握毛泽东住处的消息动态。她给自己结成了一张张巨大的信息网，轻轻掌握一根，然后等待她的思索成熟，再把决定反馈回去。就像点燃导火索那样，等待着就是一连串的爆炸声。

她像一个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的骑士，完全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离开了集体。尽管积怨很深了，她却自鸣得意。

钓鱼台圈子里越来越小的那伙秀才，对这位女人敬而畏之，丧失了最后一点与之抗争的勇气，只剩一味地逢迎了。但是，他们不得不与之保持距离，处于戒备状态。有人接近她，表面上似乎只想要与她友好地商量什么话，但讲话又总是以一句话先结束了：“江青同志，有什么要办的事吗？”

“你们是怎么把关的？为什么能让杨成武那种文章见报？我

早就给你们讲过，领袖的权威只能在长期的斗争和实践中逐步自然形成，人为地大树特树像什么话？”

一见陈伯达和姚文元，江青就沉下脸，没好气地大声质问。陈伯达已经摸透了她的脾气，她发怒时最好不理睬她，只管沉住气听她讲，等她说了累后再慢慢解释。当他听明白是杨成武的文章出了问题后，心里“格登”一下，犯了忧愁。他皱了皱眉头，装出无可奈何的口气说：“江青同志，人家是代总参谋长，一个劲儿催着我们发，实在有些顶不住了。”

“堂堂文革小组长顶不住个总长？我就不信。当初刘少奇邓小平你不是也敢顶嘛！”

“唉，事情不一样嘛。”陈伯达尽量说着软话，“我想问一下，他这篇文章的错误算什么性质的问题？”

“那还用说，理论错误。”

姚文元马上接着表态：“是理论错误，当初我一看标题就觉得不舒服，但人家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了。”

江青马上说：“这个错误与你没有关系，主要责任由老夫子来负。”

陈伯达感到厌倦了，这个女人总是这样：对谁有了看法马上就会表现出来，根本不考虑对方能否承受得了。按组织原则，自己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轮到你像训斥儿子似的这般教训？幸亏只有一个姚文元在场，要是还有旁人，说不定又会顶她几句。现在，他已感到，在她身边工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然而，他足够清醒地知道，现在决不是冒险和她分道扬镳的时候。正如叶群反覆提醒他所说的那样，那是一种可怕的缺乏自制力的表现，说不定会祸从天降。

这篇文章在中南海和钓鱼台引起的反响，杨成武丝毫不知道。

他一看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心里就来了气。这不明明是贬军队扬文革的秀才们吗？戚本禹、姚文元文章发表从来都是放在头版显著位置，为什么自己的文章就放在了后头呢？难道自己连这两个只会摇动笔杆子的秀才都不如？

所以，当戚本禹来到他家邀功讨好的时候，杨成武并不领情，一脸冰霜。

赵志珍说：“如果觉得成武不配发表，就不发表，何必有意要抬高自己压低别人呢？这种厚此薄彼的作法究竟想要干什么？”

戚本禹一下子窘住了，弄得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十分尴尬。

杨成武替他解围：“这不关戚本禹的事，他当不了《红旗》杂志的家。”

“不过，我没有尽到责任，我应该据理力争，可是我作得不够，向你们检讨。”

“好了，事情既然这样也就算了。”杨成武换了话题，“我们说别的吧！看来主席认为文化革命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想结束了。明年就是收尾阶段，只要党的九大一开，党和国家的工作就走向正规了。”

戚本禹脱口而出。“也该结束了。”

杨成武锐利的眼睛在他脸上一扫，他立即改口：“我是说我们摧垮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就算胜利了。”

其实杨成武早就对这场没完没了的运动产生厌烦了。一年多来，一批又一批的干部被莫名其妙地打倒，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国家的建设受到严重影响，这样下去究竟有什么意思呢？但这种想法，他同样也不能说出口。他得防止别人的暗算。

但是，中央文革的耳目无孔不入，遍布各个单位。戚本禹到杨成武家里，并向他道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钓鱼台，传到了江

青的耳朵哩。

“好啊！他们想勾结！”江青急如星火地推开康生办公室的门，大声嚷叫：“康老，你得给我查查戚本禹的历史，这个人物危险得很，已经跑到杨成武那里去了。完全是背着我们搞活动。现在，他要千方百计地寻找靠山，寻找他的势力。”

康生已经知道江青对戚本禹产生了怀疑和恶感，便不动声色地说：“对这个人，我一直在观察，从来对他就没放过心。他的野心很大，对我们一直在进行侦察活动，时刻都在掌握我们的情况。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就会倒戈啊？”

江青打了个寒颤。

戚本禹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里面的内幕和核心机密，他肯定知道许多。一旦他和其他人串通一气搞名堂，那可不得了。当前的政治斗争无法用罗马数字进行精确的计算，扑朔迷离，难以捉摸。各种政变、谋杀、恐怖活动、以及两派中你死我活的武斗和国外的间谍、特务幽灵般地一现再现。许多鲜为人知的隐秘行动，到了他们眼里，很快就会变成比炮弹还要厉害的攻击。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那些很有潜质的政治家也可能撞到命运的陷阱内，注定了他的生命短促，很快就会从美丽而又喧闹的地球上消失掉。

于是，她想起一个人来。

这个人不是钓鱼台之外的，而是她的秘书阎长贵。

她不止一次地熟悉过这个人的档案：

阎长贵，汉族，一九三七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贫农家庭。

一九五六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九六一年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在哲学组当编辑。一九六六年五月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经戚本禹推荐，来到十一号楼当了江青的秘书。

江青也已从各个渠道得知：

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和关锋、戚本禹的关系相当密切。文革开始前后，他们和林杰多次联名发表文章，研究一些重大事情，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这样的人，在关锋、王力相继被打倒，戚本禹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之际，能继续使用吗？

不行，得想法把他搞掉。江青心里暗暗盘算。

其实，自从阎长贵调来给她当秘书，她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她和毛泽东的工作规律有点相似，从来不用秘书给她代写任何材料。她的秘书只是收收发发，代拆一些一般的群众来信。她的对外活动，除了带护士和警卫员外，其他人一律不通知。这点，阎长贵自己也看出来了。

中央文革在十六号楼开会整关锋和王力时，阎长贵毫无所知，以至他俩早被隔离在二号楼了，他都蒙在鼓里。他每天都从两麻袋的信件里搜寻有价值的内容给江青摘录或挑选出来，经常累得昏昏沉沉，很少和外边接触。那天，江青一反常态地来到他的办公桌前，微笑着问：“在这儿工作习惯了吗？”

“可以。”阎长贵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江青摆摆手，让他坐下。

“听说你是关锋的学生？”

“我在红旗杂志哲学组工作时，我们年轻人一般都称他为老师。”

“你和关锋接触几年，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还差不多，比较耿直。”

江青没再往下问，笑了笑就走了。这是她难得一次地和他谈话。当他得知关锋、王力出事的消息后，惊得头皮阵阵发麻。这时他才意识到江青那次和他谈话，实际上是对他的考验。联想到几天前，江青让他烧一批材料时，他正忙着处理信件，就说：“你放下吧，我待会儿就烧。”江青不悦地说：“不行，马上去

烧！”他去烧那批材料时，江青就跟在他身后，一直到烧完为止，到了此刻，他才悟到：为什么当戚本禹推荐他到这里当秘书时，关锋曾告诫他：“最好别去，你要想办法婉言谢绝。”但是，他没有。所有，终于尝到了被怀疑的滋味。

他哪里知道，大祸还在后头哩。

每隔几天，中央文革都要召开一次没完没了的会，照例通知杨成武和吴法宪等人列席会议。这天晚上，杨成武来得比较早，在门口碰到了戚本禹，便主动地问：“我的那篇文章出来后，有什么反映吗？”

戚本禹说：“反映还不错，现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了群众性的口号，被广大人民所接受。主席的威望有了更大的提高，效果是好的。”

话音刚落，就见康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最爱摆老资格，满脸都是理论权威的神气。听见他们议论那篇文章的话题，便招招手，让他们走进会议室里，慢条斯理地说：“我正想找你们谈谈呢，成武同志，你那篇文章有错误，是很大的错误。”

“有什么错误？”杨成武平时对中央文革这几个人就积蓄了满肚子气，没想到又被他浇了一瓢凉水，便顶了他一句。

“绝对权威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从来就没有绝对权威，只有相对权威。这是哲学上的起码常识。”康生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起了哲学，那副神态，不亚于大学教授给小学生讲课。

戚本禹早已对康生这副倚老卖老的架子产生烦感，没等他说完就冒了句：“够了，你这番大道理我想不通。”

“什么？”康生大吃一惊，没料到平时在他面前挺温顺的戚本禹敢公开顶他，便正色道：“你想不通？这是毛主席早已讲过的。最近主席六条指示中就有这么一条！”

戚本禹也有些激动，许多话脱口而出：“不管是谁的话，我想不通就是想不通，我保留我的意见。全国人民都从心里呼唤要

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报纸上也是天天这么讲怎么单单批到杨总长头上了？真是怪事！”

康生气得满脸通红，但他毕竟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见他们情绪很不冷静，他反而迅速克制住了自己的焦躁，索性引他们上钩了。他说：“报纸上那么说，是群众热爱毛主席的朴素语言，而毛主席关于绝对和相对的论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最科学的语言……”

这时，杨成武也火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政治上没错，哲学上也能讲通。”

康生瞪圆眼睛，那副近视镜差点从鼻梁上滑下来：“什么？讲得通？你学过哲学没有？”

“我没有，但是广大群众可是学过。”

“我只问你！”康生伸出一个指头顶住杨成武：“你读过《矛盾论》、《实践论》没有？”

“当然读过。”

“读通没有？”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谁敢说他已经把领袖的经典著作完全学懂学通了！杨成武把头一扭，气呼呼地坐到他的座位上，说：“不和你谈了，不和你谈了！反正中央文革有权，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和戚本禹转身一看，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江青已经来到会议室里，而且看样子，她早已听到了他们争吵的内容。只见她板着一副严峻的面容，冷冷地说：“成武同志，有康老和其他同志作证，我在背后从来没说过你的坏话。但是你的文章是错误的！不用看内容，一看标题就是错的！”

杨成武说：“我要把情况报告毛主席，听听毛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哈哈大笑起来：“看起来，杨成武

还有点脾气。好嘛，没认识到错就是不能随波逐流嘛。我赞成这种光明正大的勇气。你把他找来，我和他谈一谈，我看我还是能做通他的思想工作的。”

于是，他马上派秘书通知杨成武，到人民大会堂他临时居住的地方来谈工作。

杨成武是个久经炮火洗礼的战将，长得身材魁梧，膀大腰圆，虽然年已五十多岁，但是走起路来腾腾作响，仍有当年那股敢拼敢杀的劲头。他来到毛泽东住地时，见康生已经坐在那里，也没搭话，只是目光与毛泽东的眼睛相碰时，见党的主席朝他微微一笑，说了句：“还是当年战争年代那股劲，我们现在见的少了，看来还得发扬呢。”

毛泽东问起了总参的工作和部队支左中的一些问题。逐渐，他把话题引到了那篇文章上。

“听说你们又争论了？”毛泽东问。

杨成武看了康生一眼说：“他们说文章有错误，是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尽扣大帽子。”

毛泽东笑了：“文章有错误和人有错误应该是两个概念。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理论上是敌人，政治上却是同志，这种状况很多。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不过，文章我看不是你写的。对不对？”

杨成武说：“是总参政治部的同志们根据军委四人小组布置的写作任务写的。”

“哪四人小组呀？”

“就是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他们四个人，是军委办事组。”

“哦？办事组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他们领了起草一篇论领袖权威文章的任务。文章起草后，总参党委先后讨论三次，修改定稿后才送给我看。按照你的吩

咐，我把文章送给伯达审阅，他们一致主张以我的名义发，没想到出了问题。”

毛泽东不住地点头，最后对康生说：“你看是陈伯达的事吧？对，此事不是你杨成武的过，应该让陈伯达负责。其实，这篇文章出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我主张你们多读点书，看他几本马列的书，不然很危险哟。”

杨成武马上接过话来说：“主席，虽说文章不是我写的，但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做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的确感到内疚，应该做自我批评。”

“这就对了！”毛泽东风趣地对康生说，“你们不是说成武听不得不同意见，我看他的自我批评很好么！”

毛泽东把理论上的是非当作了重大原则问题，从来是一抓到底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这件事。他指着陈伯达说：“理论家搞笑话，让人笑掉牙。你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我只看标题没看内容，让你们改。看来你陈伯达把不了理论关。你不是号称中国的马克思？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而是有选择，要区别，要分析。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无数的相对真理总和才能形成绝对真理。《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从标题上来说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怀仁堂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同一问题上的指示：

“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说了不是成武同志的事。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三十本

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什合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五天后，即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以下批示：

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当然没有预料到，有些人是处心积虑地利用他的一些话用以打人的。就像重炮的瞄准镜中，杨成武的脸孔已进入了那个十字坐标的交叉点上了。有人在心里轻轻地呼道，再不果断，那就会坐失良机，太晚啦！

## 仕途险伴君如伴虎 莫须有秘书人牢笼

黄永胜这次到北京来，非常机密，钓鱼台方面几乎没人知道。

还是国庆节观礼的时候，叶群曾凑到他跟前，悄声说：“一〇一正在主席那边活动，调你到军委担当重任。二月逆流的那帮老帅们不行了，主席很伤脑筋。他和一〇一商量过几个小时，想在你、韦国清、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几个人里进行选择，我和首长都看准了你。”

黄永胜不像吴法宪那样，一顶高帽子戴上就喜形于色。他知道，喜事未成之前暴露过早，只会给嫉妒者或居心叵测的人提供时机。他是林彪的同乡，又是一九五五年被授的上将，资格在这几个人里是最老的。五十七岁的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从文革一开始，就把自己向上爬的赌注押在了林彪身上。自从叶群和林彪赤裸裸地作了许诺之后，他整整等待了几十天。漫长、烦闷、紧张、无聊，唉，走政治仕途这条路，需要的是时机和等待，更多的是等待了许久，结果是空高兴一场。

他要的决不是这个结果。

人太聪明了很难得到朋友。但是，黄永胜却有朋友，一个称得上是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经常给他通风报讯，传递一些最高层的核心机密，这使他左右逢源，在错综复杂的中南地区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局面。这个人就是吴法宪。

吴法宪的嘴巴很松，只要几句大话哄住他，肚子里的东西全能给你倒出来。

“昨天我见到了林副主席，他让我们多加照应。北京的情况我毕竟不熟悉，有些情况你得交底了。”

吴法宪将黄永胜领进自己的卧室内，故作神秘地说：“军委现在是戏中有戏，非常复杂。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这四个老帅自从二月逆流以后基本上就靠边站了。我名义上是军委看守组组长，但总部大权杨代总抓得很紧。前一段，他大有正式当总长的可能，他又是军委副秘书长，叶剑英的秘书长一旁落，大权不就在他手里了吗？”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主席和林副主席对他的态度。”

“他已经闯下大祸了。”吴法宪幸灾乐祸地说：“他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一出笼就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几次会上都讲这件事，他彻底灰了。总参下了通知让全军学习这篇文章，我在空军就给他压下了。叶主任听了汇报，高兴的说：‘空军的路线斗争觉悟高，吴胖子有水平’。我估计杨的总长肯定捞不上！”

“没听首长让谁干吗？”

吴法宪相当敏感，马上打了个激灵：“是不是首长要让你干？”

黄永胜知道吴法宪的脾气，不给他交出点底牌，他很可能马上会把话封死，就说：“林副主席的意思很明确，谁知主席那边能否通过？”

“只要林副主席态度坚决，毛主席还不是听他的。”吴法宪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毛主席把稳定全国大局的力量寄托在军队身上，而军队主要靠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不靠我们靠谁？你别看杨成武、傅崇碧现在红，那是暂时的。他们和聂荣臻串在一起，要搞晋察冀山头的团伙。余立金也往那个山头上靠，他原来是新四军的，是陈毅的人。这些家伙经常在一起开黑会，目的是要同我们争权。”

黄永胜显得很老成，说：“这话要注意，别对外讲，否则你将如履薄冰，随时都有灭顶之灾。”

吴法宪又一次端出老底：“这都是叶主任对我讲的。老虎——就是林副主席的儿子林立果，也常给我露出首长意图。我是铁了心了，一辈子永远跟着林副主席走，忠于他们海枯石烂不变心。政治上要想混下去，不结成死党不行哪。”

黄永胜点点头：“这个我清楚，我和你一样，今后就要吃林副主席这碗饭了。”

这番谈话，他俩都有收获，彼此都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如果说，过去在战争年代，他们的友谊是血的结合，来自数不尽的战斗和拼杀的结果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是为了今后的生存和发展而相互依赖，政治上的需要，使他们有了结合的基础。

黄永胜来京的目的，叶群心理更清楚。

别看林彪在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包括他最信任的几个秘书面前，表现得对一切大事都很麻木，似乎不太关心中央的时局发展。其实，这正是他有意制造的假象。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定下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后，他就始终在暗暗地为他将来接班作准备。他的言语、包括表情、动作在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面前是一套；在叶剑英、徐向前这些人跟前是另一套；在他的下属将领如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面前又是一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的那些现象，与他的本来面貌差距很大。

有位心理学家说：“政治家的本相只有在他最得意和失败最惨重的时候才会露出原形。”而林彪，孤僻、高傲，习惯于在自己心中算计一切。当叶群告诉他黄永胜来京的消息后，他板着脸思索了一会，才轻轻说：“给他在钓鱼台树威信！最起码别让三点水反他！”

叶群当然明白他的话意。

果然不出林彪的担心，叶群刚刚提到黄永胜，江青就把鼻子哼了一声：中南地区是盛产两面三刀人物的地区，大叛徒陶铸，政治扒手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都是。黄永胜也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叶群不慌不忙地反问：“那韦国清又怎样呢？”

江青眼前立刻又出现一个面色刚毅、体格壮实，讲话粗声瓮气的男子汉形象。他公开说过：“中央文革的成员，只会写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他们领导不了中国建设！”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感到这个人的内部力量。他的父亲是最早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口音里有着明显的广西味儿。

“总理几次推荐韦国清到军委来，目的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叶群彬彬有礼地寒暄着，他可是地地道道的邓小平、陈毅他们的老部下，思想感情能向着我们吗？”

江青反覆审查过他的历史，至今十分为难。韦国清年仅十五岁时就参加了韦拔群组织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第二年便加入共青团，参加了同年十二月爆发的百色起义，被编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的红军第七军，转战桂黔湘粤赣地区。他参加过长征，抗日时期英勇杀敌，多次荣立战功。一九四〇年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新四军第一三师九旅政委，第四师九旅旅长兼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一九四三年春，他率九旅主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总部并生俘了韩德勤。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抗

战胜利后，他任新四军第二纵队副司令，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上海战役后，他先后担任苏州市、福州市军管会主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市长、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韦国清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担任赴越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职务，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抗法战争。他参与组织边界战役，粉碎了法军从高平至谅山一线的全部防御体系。然后，又组织了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寮等一系列战役。一九五四年，他在越南抗法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五五年起，他历任广西省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务。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不断收到对韦国清的控告信。

那一封封控告材料的内容，像炸弹一样，震荡着江青的五脏六腑。

“今日的广西，韦贼爪牙专横跋扈，革命造反派横遭杀戮，哪有革命群众革命的权利，哪有革命造反派生存的余地？在韦国清死党的铁蹄下，白色恐怖一时代替了四大民主，韦家王法代替了党纪国法，资产阶级专政在某些地方一度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

“韦国清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唱一合，在一次地委书记会议上竟说：‘听毛主席的话，这种人幼稚无知。反对什么当权派，毛主席也是当权派，是最大的当权派，也能反吗？’他搞全国独一无二的二次反瞒产运动，害死几十万无辜农民，至今逃避罪责。他招降纳叛，在广西大搞什么‘独立师’、‘民族师团’、‘军人农场’，意图培植个人武装，妄图篡党夺权。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诬蔑文化革命是‘武化革命’，是‘打人运动’，是‘寒流’。他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开创了派军队

镇压学生运动的先例，制造白色恐怖。……”

但是，江青也从大量的材料中发现了使她好感的内容：

“韦国清还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是‘投机’，胡说什么戚本禹同志是‘假左派’……”

她曾把这些材料选出来让毛泽东看过，毛泽东笑道：“韦国清是广西的一面旗，他倒了要倒许多人。这个人要保！一定要保！”

保可以，但是不能再往高抬！如果真把他抬到军委来，岂不是又多了个谭震林、叶剑英一类的角色？江青狠狠心，咬牙切齿地对叶群说：“黄永胜都不行，那韦国清更不能要了！”

叶群说：“其实黄永胜对主席和你是最忠心不过了。我曾和他提到陶铸当着中央文革的面和你顶撞时，他跳了起来：‘我要当时在场，他们谁敢攻击江青同志，我马上动手枪毙了他。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江青，走资派早翻天了！’江青同志，你说这样的好同志，难道我们不该支持他一下吗？”

江青有个最大的弱点：爱动感情。

她对当面奉承她的人很烦感，警觉性很高。但是听到有人背地里说她好，在关键时刻支持她的人，却是非常感激。叶群几次观察，很快抓住了她这个特点。没料到今天试着编了点假话，果然使她上钩了。

江青说：“其实，我对黄永胜也没啥意见，只是他在广州也抓了不少造反派，大家很有意见罢了。只要他能认识错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当然可以重用了。”

叶群高兴地拍着巴掌说：“我把你的指示传达给黄司令，他一定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江青从沙发里站起来，在桌子上取下一份文章的清样，对叶群说：“一九六七年眼看就过去了，这是一个惊心动魄之年。明年我们要全面地向走资派宣战，我让文元他们起草了一篇《迎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元旦社论，主席已经圈阅、修改了。划红笔的，是主席改过的。按照主席的设想，明年就要召开党的‘九大’。我们要争取一下，把这个会开好。”

叶群觉得眼前一亮，明白了江青讲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她的目光落到清祥的那几行划了红笔的地方，更加觉得新鲜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整党运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学习几十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要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清除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出党。犯过严重错误的少数党员，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坚强。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为领袖的、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

叶群咧开嘴笑了。这是最明显的暗示，说明毛泽东的的确确地要召开九大了，这种时机对自己是有利的，但还像江青说的，需要“再争取一下”。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内容呀。

江青来到她的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摆满了需要批阅的信件和最近一两天要办的各种事项。信件是秘书经过筛选和摘录的，每天不算太多，但也够看一阵子。

不过，江青处理信件的速度很快，她从不过多的积压文件，这是多年来给毛泽东当秘书养成的习惯。

窗帘已经拉开，清淡的白云透过玻璃窗显得非常清晰悠闲，像早晨的空气一样。窗外，阳光已经爬得很高，星星点点地穿过

树枝透到屋子里来。

江青将信件拿过来，坐到沙发里阅读起来。

这也是她的习惯。不是写字，她一般不坐到写字台前，那样总觉得不大舒服。她扶正近视镜，一封又一封地阅读起来。当看到最后一封时，她的眼睛瞪大而且凝视了。这是一封求救信。写信的人是正在被革命群众批斗或专政的牛鬼蛇神一类，而他信中口口声声叫的“江青”根本不是自己。显然是阴错阳差，和自己根本不相干。把这样的信推到我这里来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诽谤我和牛鬼蛇神们是同流合污吗？

“阎长贵，你过来！”

阎长贵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莫名其妙地来到她跟前，问：“有什么事？”

“什么事？”江青的语调有点哽咽了，把那封信扔到桌面上，“这是什么意思？”

阎长贵重新把信看了一遍，头皮感到一阵发麻，失声说：“可能我是弄错了，这一段来信很多，每天头脑昏沉沉的，我只看了个开头以为是给你的信，没仔细审阅。我可以向您检查。”

“不，你别说得太轻松了。”江青的声音显得很痛心，“我把你留在这儿工作，是承受了很多大压力和风险的。有人说你是什么国民党、三青团员一类，我都没有相信。为什么他们攻击我是这是那的，你就相信呢？”

阎长贵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任凭江青一阵又一阵地唠叨、诉苦。他已失去了为自己辩解的权力，而且辩解也无用，江青根本不会相信他的话，他怎么也弄不清为什么一封弄错了的信，会使江青受那么大的刺激，甚至要在他面前伤心落泪。

“你先去吧！”

等阎长贵离开办公室后，她马上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要求审查阎长贵的问题。

“他肯定是戚本禹、关锋他们派来的特务！我一直怀疑，为什么这个反党小集团对我的活动那么了解，那么清楚，八成就是阎长贵搞的鬼。先把他关起来，慢慢审查！”江青在康生面前是畅所欲言，什么话都可以随便讲的。

康生读着那封求救信，脸上越发露出了恐怖的神色。

“骇人听闻，”他读完时晃着那几片纸吼道，“用这种方式诽谤你、向你泼脏水简直无法容忍。还有那个戚本禹，公开地狂妄地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当着我的面说他‘想不通’，住在钓鱼台了，该给他们换个地方了。”

“这要请示主席。”

“我写报告。”

江青微微一笑，脸上没有半点怜悯之情。一年多来，她已见惯了把人投入牢房时那种情形。每当她的对手到了那一步的瞬间，她的心里都会产生一种快感。她已认识到，政治家不对反对派采取铁的手腕，那就会无法继续他的统治。即使让他们人头落地也在所不惜，只要公众无法看出他们本人与此有什么牵连就行了。

新年过后的第八天，即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人带着三、四名警卫来到阎长贵的房间，对他说：“你在这里已经不合适了，我们重新给你换个地方吧。”

“好，我收拾收拾东西。”

“不用了，有人会给你收拾的。”

警卫战士带着阎长贵上了吉普车，司机很快发动马达，飞驰电掣般地离开钓鱼台。当他突然间醒悟过来自己将要到什么地方去时，眼前一团漆黑。等再次清醒过来时，他算了算，从到江青办公室当秘书，到他进入监狱里，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上帝给人安排的命运，竟是如此精确。

当雪亮的手铐戴在戚本禹手上时，他还不甘心地问来抓他的负责人：“你们这样做，经过中央文革批准了吗？”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正是江青同志下令让逮捕你的！”

戚本禹颓然地长叹一声，没料到没明没黑地奔波了两年多，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的精神防线全部崩溃了，像霜打了的嫩叶似的，荐不拉叽的低下头，眼镜滑下来掉在水泥地板上，摔得粉碎。

他在两名战士的搀架下，走到那辆可以称为囚车的跟前，使了好大的劲，怎么也迈不上去……

## 副统帅提携黄永胜 大字报翻案保陈毅

戚本禹也被抓起来了！”叶群小声地对林彪说。

这回，林彪安之若素，没有丝毫的震动，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他继续在客厅里慢慢地踱步，走到北面的墙前，停下脚步凝视着挂在墙上的那幅条字，上写着：“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

这两句话，出自陈伯达的手迹。字写得端庄有力，确有一种雄健稳重的笔势。林彪把他的字表糊出来，而且挂在客厅，足见对此人书法的欣赏。不过，他屋里和大厅的字画，经常变换，用以反映主人的情绪和思维的转移。好长一段时间，他才转过身来，对叶群轻轻地说：“中央文革又少了一个人喽。”

叶群坐在藤椅上，默默地想着心事。听他说了这么一句，马上接上茬：“我们军委办事组，可是要再加人呢！”

林彪对这句话很感兴趣：“加谁？”

“黄永胜！”

林彪点点头：“此人是帅才！将来就要靠他统率军委。”

“什么时候？”

“我想快了。”林彪今天的情绪比较好，话也显得多了。“孔子历来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主解中庸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个学说是合理的。你和江青不同，我希望你不要老跟在她后边咋乎，那样会得罪人。为她而得罪人不值得，要作到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那不行！我是说现在不行！”叶群不服气地争辩说，“等将来九大召开了，各项工作都走上正轨了，我和她可以逐渐冷下来，现在她的权力大得很，许多对她有点意见的人都栽到她手里了，我们不见得能制约住她。”

“仲尼不为已甚者。”林彪像背书般地边踱步边说：“凡事勿做绝了，做绝了即一点论，必有恶果。果大则显示出来，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恶果是肯定会有的。政治斗争也和打仗一样，每一个决策都要考虑到后果，不计后果地干就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不是年青的小将，干什么事，讲什么话都得往远看。”

这番话对叶群有着极大的启示。

叶群早把自己和他看作是一个人。没有他也就没有自己，自己的一切都是有了他才获得的。但是，最近一两年来，她又有了新的考虑，某种意义上她是从江青身上产生了这种念头的。这就是：趁着他还身体健康，还能为自己带来价值时赶快发展自己，巩固自己，像江青那样，牢固地占领一席领地。因为他比自己要大得多，一旦他哪一天先于自己死去，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心里学家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清清楚楚地认识别人、掌握别人的一切，但很难认识自己，甚至会完全掌握不了自己。轮到自己时，则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

有一次，叶群曾听到个医生对她讲这种话。他叫什么名字

来？傅连璋？就是他。但是她狠狠训了他一顿，训得他几乎抬不起头来。她骂他是不可知论者，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是宿命论的变种！而她是十分信仰天才的，天才就是脑袋长得好，和别的人不一样，特别灵。这是一种天赋。不然就无法解释现在的一切。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单选中林彪当接班人，而刘少奇则成了阶下囚。

她和自己的丈夫是在别人都找不到自己的路的时候，他们找到了。

这世界能找到自己路的人本来就不多。

正因如此，她对亲自推荐一些人提拔上来或者将一些人打下去这类活动，特别感兴趣，只有尝到结党营私的甜头时，才感觉到这不是罪恶，而是一种幸福。

“育蓉！”叶群突然开了口：“能不能让黄永胜当总参谋长？”

没想到她竟和自己想到一起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林彪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她。他认为，现在不是说的问题，而是要让一个人挪挪位了。这个人，当然是杨成武。

他认为，是时候了。

像林彪这样急切打电话找他谈工作，次数并不多。

毛泽东坐在书房的沙发上，而朝着南边的窗户，旁边的茶几上还放着他刚刚读完的那本《楹联墨迹大观》。他对衣、食和其他物质享受的要求简朴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但读书成嗜，也到了不见则生疑的程度。林彪每次来都要由衷地感叹一番：“主席坚持学习，真使我们后辈儿孙永远仿效、仿效、再仿效。孔夫子韦编三绝，也未必有这种功夫。”

毛泽东爽朗地笑出声：“你瞧瞧，周梦台用隶书写的‘读书真是福，饮酒亦须才’这几个字，真谛之精，只可意会而口不能说也。还有赵书禾用行楷写的‘与人相见以诚，造物所忌者巧’

也值得玩味。”

林彪翻阅了几下那本书，连声赞不绝口。

“此来所议何事？”毛泽东谈话幽默，大多是轻松、快乐之时。

所以，林彪单刀直入：“我接到部队一些同志打来的电话反映杨成武同志在受到主席批评后，牢骚满腹，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江青一个人的天下，说他的那篇《大树特树》是舔屁股舔到刀刃上，费力不讨好，落了一身骚。甚至对萧力同志也有怪话。”

毛泽东“噢”了一声，兴趣全无。

林彪接着说：“总参谋部是我军的要害机关，在部队建设地位很重要。许多同志都担心杨成武同志会紧步二月逆流那几个老同志的后尘将来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邪风，中央文革揪出王力、关锋以后，右的倾向有所抬头。现在又把戚本禹端出来，叶、徐、聂、陈都可能会幸灾乐祸，企图翻案。而杨成武总是和他们拉拉扯扯，再三劝也砍不断。我担心在一个时候会出事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两口。

林彪朝后微微退了退，继续说：“他在总参全部用的是他的老部下，排外性相当强烈几乎是清一色的晋察冀了。”

“这个不行！”毛泽东很果断，“要给他掺沙子！我们军队里绝对不能树山头，谁要搞山头主义，我就主张铲平。铲不动，就炸平。总之，不能搞小团伙。这次中央文革端出关锋、王力、戚本禹来，他们都是山东人，是江青的老乡哟。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见乡土感情深。但是我对她说：‘首先要讲原则，讲斗争，对他们的错误，不能搞和平共处。’没想到还有人不接受教训。”

“杨成武几次想取掉他前面的那个‘代’字，说明他有野心，他想打人了。”

“你的意见是什么？”

“两种方案：一是给他正式派个总参谋长，二是将他调离总参，另派人去。”

“你有对象了吗？”

“黄永胜这个人你看怎样？”

“哦，那个湖北咸宁人也，算你的老乡。”

“他在广州军区当司令反映不错，和陶铸、赵紫阳他们斗争也很坚决。这人始终是坚持突出政治的，是个帅才。”

毛泽东等林彪谈完意见后，点点头：“好，我再考虑考虑，下次再议。不过，此事不可公开议，一公开就会引起混乱。当前要稳定大局，大局是主要的，应放第一。”

“对，大局就是政治。”

林彪此番建言，在毛泽东胸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应该说，接班人还是选中了党的领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的，这就是：文革大局、儿女情思枕头风。毛泽东不愿意给别人，更不愿给后人留下任何有损事业的话柄。而林彪今天，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毛泽东苦苦思索起来。

事情往往是复杂的，甚至有着某种戏剧性的巧合。就在林彪开始吹风，要对杨成武“动点手术”的时候，杨成武办公室连续接到两封这样的信：

敬爱的杨代总长：

我们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向您揭发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及其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人，在空军机关拉帮结伙，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司令员和政委的关系，分裂空军常委的种种严重问题。更有甚者，周宇驰、于新野流氓成性，道德败坏，多次利用职权，威逼利诱机关女工作人员×××、×××等六人非法同居，并进行凌辱、强奸，致使她们多次怀孕。

周宇驰还多次散布：“毛主席老了，今后就得靠林副主席了，我们是紧跟林副主席的，所以谁都不怕，谁都不尿，谁都敢顶。”

于新野对一些干部说：“在空军，真正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我们，反对我们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我们，坚决给予镇压。”

在他的把持下，空军机关广大干部敢怒不敢言，甚至丧失了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反映问题的权利……

这几封信的最后签名是“空军机关部分共产党员”。

杨成武的秘书看了这些材料，气得昏天黑地：“他妈的，这哪里还是人民军队的干部，简直是土匪、强盗、流氓！连国民党都不如！”

“小张，别生气，这事还挺复杂呢。”赵志珍皱着眉头对张秘书说。

“为什么？”

“这几个人都是林立果挺信任的人。我听说立果到了空军常委办公室后，和这些人关系相当密切，我们得慎重些。”

张秘书听了主任的话，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但那愤怒的表情从两只眼里暴露无遗。杨成武从外面一进来，马上明白他受到了一场突然到来的事件袭击，而且有点束手无策了。

“什么事还需要如此生气？”

赵志珍从桌上拿起那几封信：“你自己看看罢。”

杨成武看完信，也觉得为难了。写揭发材料的人显然出自保护自己、怕受打击的心理，不敢签真实姓名，而把信写给代总参谋长，肯定是出于对自己的信任，可自己又能为他们作些什么呢？

“把信给吴司令转去，看他怎么办！”赵志珍狠狠地说。

“不妥！”杨成武摇了摇头，“叶群和这几个人来往频繁，吴法宪、余立金怎么敢得罪他们？把材料转到他那里，只会给他加

重负担而且不解决任何问题，说不定那几个人马上知道来头，还会对检举人施加报复。”

“那总不能让这些入继续胡作非为吧？”赵志珍说。

杨成武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了几圈后，有了主意。他随便扯了一张纸笺，批了两行字：

林副主席：

转去空军二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

江青把看电影列入她工作的一部分，天天晚上都要调一两部外国影片，供她欣赏。

放映室里温暖宁静，七八个陪她观看的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映幕，完全入迷了，似乎他们置身于沉寂安详的野外，楼区茂密的松树丛和湛蓝的湖水，都给这块领地增添了世外桃源的气氛。

这时，一名女服务员匆匆走进来，在江青身边躬下身子：“首长，有您的电话，是从保密机上打来的。”

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讨厌！但她还是站起来了，她怕误了大事。

“喂，你是谁？”江青操起话筒不高兴地问道。

“江青同志，我是谭厚兰，我们有重要情况向您报告，十分重要的情况。”

“反正你们找我都是有重要情况，但给你们讲的话又不爱听。喂，能不能明天谈？”

对方犹豫了一下，急切地说：“江青同志，我已经到了门口了。我怕万一出什么意外，对革命会造成大的损失。”

“好吧，你进来吧。”

谭厚兰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公社和革委会的一把手，很讲究衣着的朴素。二十四岁的年纪，穿着一身蓝色棉制服，剪发头，戴着断了一条腿用胶布贴起来的近视镜，说话做事冒冒失

失，完全不像个姑娘，倒像个大小伙子。

一见江青，谭厚兰的眼圈就红了，想掉泪但忍住了，她擦了一下鼻子说：“首先向江青同志道歉，我们上了关锋、林杰这些坏人的当了。但对立面组织抓住我们曾和关锋、林杰有联系，想把我们打成‘五·一六’，他们……”

“你半夜三更找我，就是为谈这事？”江青明显地露出不快。

谭厚兰说：“我们发现卫戍区有问题，重大问题。”

江青疲惫的眼睛立刻来了精神：“什么问题？有证据吗？”

“走资派、叛徒、黑帮全被傅崇碧保护起来了，我们要求揪斗，他们怎么也不给。还有革命小将整的许多走资派的材料，他们都当作黑材料来搜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向中央文革汇报的材料，他们都要派人来取。我们向中央反映问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谭厚兰越说越快，像打机关枪似的滔滔不绝：“我觉得现在自上而下有一般右倾翻案风。打倒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不等于二月逆流可以翻案，现在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谭震林他们可神气哪，原先保他们的组织反过来压制革命派、打击造反派，如果任其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了。”

江青的眼睛越听越大，最后这几句话深深震动了她，引起了她的高度重视。最后她把谭厚兰带来的材料仔细地看完，庄重地点了点头：“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提出的问题也很尖锐，我一定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希望你和首都的红卫兵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谭厚兰心里非常高兴。她来时是和地院东方红、北外红旗等几个组织开了两天会才研究决定的。他们自信那包材料一定会引起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的注意。从而改变一下造反派自从打倒“王、关、戚”以来的被动局面。北京这几个院校的造反派组织有着庞大的通讯联络网，专门瞄准中央各总委和各省市的领导机关，他们搜集的各种情报和动态，直接送到中央文革手里。有的

则通过他们的组织，扩散到社会上，掀起一股又一股风浪。

江青这一晚根本没顾上睡觉，连夜突击看这段时间的材料和《各地动态》，有几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神经陡然紧绷：

一九六八年二月初，叶剑英找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去年根本不存在一个二月逆流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正常。给老干部定罪，完全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搞的，我要求平反。”毛泽东沉吟片刻，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

江青想：二月逆流平了反，岂不是中央文革错了吗？给那几个老右定罪，发明权并不是王力他们，而是老娘我！这时，她觉得浑身陡发躁热，怪不得杨成武、传崇碧整天往他那儿跑，原来串连着想造反哪，，只要老娘还有一口气，没门儿！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外交部以宫达非、何英、章文晋、符浩、韩叙等九十一名司局级干部为代表，贴出一份标题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大字报共分五个部分，即：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阶级敌人的政治阴谋；极“左”思潮的泛滥；严重的政治恶果；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回来主持部务。

大字报有几段话如惊雷、闪电，足以震撼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心魄：

“从去年四月开始，外交部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外交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阶级敌人的阴谋，必须揭穿，‘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必须批判。

“一九六七年新年前后，‘王关戚’一伙炮制了一个打倒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计划，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他们的黑手也伸进了外事系统。他们的别动队‘五

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伙首先公开提出‘打倒陈毅’。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抛出了斩断陈毅左右手姬鹏飞、乔冠华两同志的阴谋诡计，网罗党羽，煽风点火，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同‘王关戚’一伙内外呼应，相互配合，明里暗里进行打倒陈毅的猖狂活动……”

江青怒不可遏地跳起来，不顾一切地去给周恩来打电话。当对方接了电话，说总理刚刚休息时，她狂怒地喊：“就是睡着了也给我叫起来！我是江青，我有重要事情，耽误了你能负得起责任吗？”

又停了片刻，话筒里传出了周恩来的那沙哑的声音：“江青同志，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外交部九十一人的大字报你看了吗？”

“没有看的。是怎么回事？”

“是为陈毅全面翻案！大字报的作者们狡猾得很，名义上是批王力，实际上字里行间是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我们批判陈毅的人是阶级敌人，这还了得吗？你要马上表态，批判九十一人的大字报。”

“好，我马上派人去调查这件事。”周恩来停顿了一下，问：“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江青怔了一下，马上说：“我负责向他汇报，这件事你要负责处理。”

丢下电话，她才感到周恩来最后这句话问得非常份量，那弦外之音分明是：党的主席还不知道，你有什么权利向国家总理发号施令？你的这番话到底代表谁？

## 中南海毛泽东定调 外交部周恩来交底

陈伯达、康生、江青分乘三辆红旗轿车，浩浩荡荡开到毛家湾，使那里的气氛立刻热烈紧张起来。

很快，林彪穿戴整齐，和叶群同时来到客厅，神情威严地讨论当前出现的紧急情况。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准擅自进入，像召开一个绝密的小会，使工作人员们纷纷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副主席，”陈伯达首先开口说，“最近发生几件事很不正常，一九六八年二月中下旬，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研究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准中，加了一个补充条件：看拥护不拥护聂荣臻同志和以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凡是反对他的，连积极分子都当不成了。”

叶群吼叫起来：“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如此狂妄地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攻倒算，我们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江青似乎很能沉住气地插话说：“还有厉害的呢！”

陈伯达继续说：“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谭震林、李富春

近几个月来接连在一起串连，有时一聚会就是三、四个小时，他们要干什么？种种迹象表明是搞翻案，是要反扑。听说，杨成武、傅崇碧也常去他们那里。”

康生站起来，脸沉得像块铁砣：“他们有个军事俱乐部，带有小集团性质，是二月逆流反党事件的继续。”

“正因为去年反击二月逆流中，谢富治同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所以现在北京有股风要反对谢富治，我怀疑有后台，后台就是叶、徐、聂！”陈伯达说。

江青等他们讲得差不多了，才慢悠悠地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来，推了推眼镜，笑嘻嘻地说：“我再给你们读几段奇文，是外交部九十一个司局级干部写的大字报，公开为陈毅鸣冤叫屈，说什么：‘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要打倒陈毅同志是违反广大革命群众的意愿的，提出打倒陈毅，广大革命群众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内，竟能刮起这样一股妖风？为什么许多同志，包括我们中的某些同志在内，顶不住这股逆流的压力，看不清阶级敌人的阴谋，也跟着喊起打倒陈毅的口号？这是十分值得警惕、深思和引以为戒的。’你们听听，把我们当作敌人了。”

林彪正色道：“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以为批判了王、关、戚，王关戚反对的人倒没事了。不行！他们各是各的账，各是各的问题。”

“还有更为露骨的话哩。”江青接着往下念：“打倒陈毅的口号从来就是错误的，在毛主席提出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的指示以后，还要为这个反动口号辩解，不是原谅自己，就是有意制造混乱。”

林彪浓眉一扬：“大字报的矛头完全指向主席了。我记得正是主席说过，群众要喊打倒陈毅，喊喊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叶群说：“怪不得下面的歪风邪气这么多，原来上面就有人

这么搞哇！看来，再不煞煞这股风就要出大问题喽！”

这时，几双眼睛都对准林彪了。

大概由于各种因素，林彪此时十分激动，举止行为充满标准的军事指挥家的动感和气派，尤其是那身合体的军装和鲜红的领章帽徽，使他的脸色也泛出阵阵红晕，连一直为他的身体担心的叶群也暗中为他的风度喝采。他习惯性地站起来，双手叉腰，显得十分自然而又有帅劲，然后一个转身，对着他们说：“所有这些情况，都是预料中的事。如果说，去年的二月逆流是他们向无产阶级的一个反扑的话，今年必然还要有一场较量。他们不死心。我们也有教训，就是斗争不彻底。现在造反派打内战，把主要敌人忘记了，如果刘邓一上台，不管哪一方统统要杀头。有些人没有经验，完全靠主席的威望，认为批他们是打死老虎，其实一个也没有死，刘邓并没有臭，彭德怀还准备上台。至于二月逆流的干将，可以说还没有触动他们，为什么杨成武、傅崇碧还一个劲地往他们那边跑？他还盼他们出来掌权嘛！”

江青双颊绯红，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林彪的话完全说到她心里去了。曾有人提醒她，说林彪也想投机，在同二月逆流斗争中一直在观望。今天看来，也并非如此。他对那几个人还是很恨的，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是的，铲除异己，是历来政治家都积极的。只不过在施行中各有各的巧妙罢了。

议论了大半天，到底怎么办？还没有结论。

一年多来，中央文革开会就是这种毛病，夸夸其谈，没有中心，每人放几炮，放完就拉倒。没有决议，没有结论，甚至连记录都没有。林彪早已看出了他们的弱点，但从来不提不问，他可不让秀才们在他面前也来这一套表演。他办事，要的是最后结果。

“我们碰了个头，算是交流了一下思想，但光空议论不行，不能搞空对空导弹，大家说该怎么办？要斗争怎么个斗争法？”

他亮出了实质性的底牌。

陈伯达说：“我建议我们一起去找毛主席，把情况向他汇报一下。林副主席和我们一块去。”

其实，中央文革这三员大将来的目的，正在于此。

“见了主席，我们也必须有自己的态度呀。”林彪坐到沙发里，见他们三人正在盘算，就很爽快地说：“我的意见，杨成武不能再代总参谋长了，应该换，这是一；第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教育，公开批判那几个人；第三，选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军队干部到军委来，比如黄永胜同志，这个人就可以用。”

陈伯达不住地点头，正想公开表态，张开嘴又闭上了。他望了望身旁的江青，笑了笑：“你看呢？”

“就按照林副主席的意见办吧。”江青在这种关键时刻，从来是有方向而无措施，想进攻，还得依赖别人。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实力，没有真正能镇得住全局的干部和力量。她的队伍，大多是唱戏的，写文章的，跳舞的，而且清一色的年轻人，这种场合上不了阵。

真正感到担子沉重的，还是毛泽东。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没有团结和调动千百万人民和干部的政策，怎么能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战斗目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包括团结那些犯了错误，甚至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一起工作，这是党的领袖必须作好的事情。不然，只会变成孤家寡人。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一点，也一直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告诫身边的人，但是，究竟是他们不听还是另外一些人要垂死挣扎，他觉得扭转一些混乱的局面要费相当大的勇气 and 精力。他听完五个人的汇报后，感到一阵烦乱。

但毛泽东表情却是非常冷静，非常自如。

“你们把这些情况报告总理了吗？”

这句话，给室内的人都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他们都隐隐感觉到，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支撑全局的栋梁。没有他，仿佛前景就会黯然无光。

当他们都来不及说话时，江青微笑道：“我向总理讲过，九十一人的大字报给他讲了。”

“他怎么回答？”

“他派人了解情况去了，现在还没有表态。”

“打个电话，叫他来！”

康生站起来，向毛泽东点点头：“我来打，我来打。”

趁等周恩来之际，毛泽东谈笑风生地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童年、青年和家常：

“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和林彪不同，更比不上伯达和康生。我幼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我喜欢看《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传》，后来又接触到反满维新的新思想，阅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刊》、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可见我不是天才。十八岁我离开故乡，到长沙求学。我曾抄给父亲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伯达知道是谁的诗吗？”

“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革新派西乡隆盛的一首诗，主席改了几个字。”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看来考诗词考不住秀才，到底是位才子嘛。”接着对康生等人说，“我除了攻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外，也喜爱读《韩昌黎文集》、《昭明文选》、《离骚》、《九歌》和唐诗、宋词等。人没有生而知之的，都是学而知之。我历来主张党的干部都好文宜读，而不要厚武轻文。我青年时写了许多诗，

都丢失了。大概现在还能找到几首，基中《挽易昌陶》是一九一五年写的，你们看我用‘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来比喻学生的相聚，用‘城隈草萋萋，日落衡云西’来讲永别的悲凉，还有‘牙琴从此绝，谁与共平生’来说交友之贵。说明我这个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共产党不是青面獠牙不食人间香火的妖怪，不讲人心、党心阶级之心怎么行？”

林彪和毛泽东共事几十年，还是头次坐下来听他讲自己的往事，觉得特别新鲜。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旁边。侧着身子认真地听着，仿佛特别倾心。

“我有不少右派朋友喽。比如罗章龙，那是老朋友了。我写的《关纵字一郎车行》就是给他的。‘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这是一九一八年的追求。你们看是不是天才？不是的。”毛泽东又抽起了烟，特别是和别人谈话，离开香烟便会索然无味。他一边品尝着烟烧燃后那股清香，一边兴致盎然地继续说：“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两位亲人是谁，江青你知道吗？”

江青眨巴着眼睛回答：“是岸英和泽民。”

“非也，父母也。”

林彪、陈伯达忍不住笑出声，江青的脸一下红到耳根。

毛泽东望着江青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这个不能忘，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我于一九一九年写了一篇《祭母文》，歌颂了她的善良、勤劳和品德。你们可以听一段：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出狂言，不存欺心。整饰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譬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浩静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膻，身心表里。五德萃萃，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养育深恩，春

晖朝露。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还有几句，就不读了。”

江青很纳闷，为什么毛泽东听了这么多汇报，反而还有闲情逸致讲这些离现实几十年的往事？莫非他有所指？但又听不出有什么足以和当前的斗争能够联系起来的内容。她焦急地等候着周恩来，忍不住一次又一次伸出胳膊看手表……

叶群尽管装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模样，好像听得很认真。其实，她联想到的是自己如何也来点创作灵感，写几首诗词以示厚文。一个女人，要成为政治家，除了丈夫这堵档箭牌外，还应该有自己的才华和名气……

这时，周恩来进来了。

这一时期来，陈毅确实比较痛快。

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垮台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而是他们那套极“左”的路线混不下去，是骤冷的标志。他和老同志谈起这些来，翘起大拇指说：“我们的毛主席的确英明、伟大，他懂得如何扭转错误的局面。”

听说外交部九十一名干部贴出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北京，影响到全国，他叫秘书找了一份来，反覆读了几遍：

“经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外交部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部，对陈毅同志有了更好的了解、更大的信任和更深的阶级感情。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同志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目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对外斗争急需进一步开展。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同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的领导下，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文

化大革命运动，坚决响应毛主席‘要斗私、批修’和‘来一个革命化’的伟大号召，改造思想，做好工作，为把外交部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多好的同志们哟，完全是出于公心！陈毅独自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读着这些火热的语言，感到了一种温暖。他真想马上赶到部里，和大家共同在一起，把全部精力都沉醉在紧张而又战斗的工作里……

那辆他最熟悉的大红旗轿车进来了，他心头一阵惊喜。怎么来我这里连个电话也不打，他准是要报什么好消息。当幸福和欢慰实实在在从心眼里溢出来的时候，人会乐得什么也不顾的。他几乎是一跃而起走出层门的。

从轿车里走下来的果然是周恩来。

他猛然发现总理的面容非常冷峻，丝毫没有快乐的表示。这种神情只有在真诚的战友跟前才会流露出来。

一种不祥感袭上心头，他立即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在他身心里产生了怎样强烈的反响。唉，又是什么风暴，快早点结束吧，早点结束吧，中国人民再也承受不起了。他心里念叨着。

“你和外交部九十一位同志的大字报有没有什么关系？”

陈毅一块石头落了地，坦然地说：“我一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坐在家里读书想问题，我既挡不住别人要打倒我，也挡不住主持正义的人为我说话！”

周恩来紧绷的面孔放和缓些，轻轻地叹了口气，坐在了客厅的沙发里。张茜高兴地给他们端来了咖啡，可一看总理的神情，犹如一瓢凉水当头浇来，想问什么，被陈毅的目光制止住了。他们相对而坐，每一秒钟都觉得很长，很长。

“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就说嘛，我陈毅又不是纸糊的，再大的压力我也能承受得住。”

“外交部九十一名同志帮你们倒忙了！”

“倒忙？正忙也好，倒忙也罢，和我无关！”

“人家向主席告状了，说你搞翻案！”

“哼，主席英明伟大，他心里最清楚。”

“所以，我希望你，不，作为老战友，是要求你。”周恩来的神情和语调都严肃起来，“最近不要到外交部去，也不要接见外交部的任何人。免得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给你制造新的困难。”

陈毅完全理解总理这番告诫的用意。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总理在一切能够说话的场合，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为自己辩解，甚至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那些发狂地揪斗他的造反派。这种赤诚的友谊和恩情，他陈毅永远也不会忘记。陈毅想，假如能以一死替总理分忧，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跳入地狱。可现在，是总理在为我陈毅操心。

“总理，请你告诉我，又是谁想步王、关、戚的后尘来整我？”

“这你别问了，我不会告诉你的。”周恩来拉过陈毅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背说，“但你记住，党和毛主席是信任你的。毛主席指示要批判九十一位同志的大字报，同时也批评了国放科委常委是在搞多中心，这样做是为了大局。我们应该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理解主席的处境，理解主席的思想实质。”

接着，周恩来详细地向他传达了毛泽东这几天的一系列指示。

毛泽东说：“外交部九十一人的大字报是无事生非，用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客观上在搞右倾翻案。”

针对国防科委的问题，毛泽东笑着对林彪等人说：“又一个中心，不好嘛。如果全国都这么搞，岂不各自成套，弄成多中心论了吗？我赞成全国统一，只有一个中心，这就是党中央。没有这个中心，全国不会实现团结。如果搞多中心论，也不会实现团

结，只能混战一场。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各种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打下去。”

传达完毕，周恩来诚恳地说：“希望你给老同志们做做工作，在党和国家困难的时候，要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维护全党的团结，忍耐负重，经受考验。党和人民终究会正确认识大家的。”

这是崇高而又有远见卓识的信念，陈毅从这句话里感受到了一种必胜的力量。

## 查失稿傅崇碧卸命 人禁地江女皇栽藏

傅崇碧这几天忙得团团转。

任务是党中央主席批下来的，非同小可。

那天深夜，他接到杨成武的紧急电话，让他马上到家里来一趟，并特意嘱咐带几个精悍、可靠、会办案的干部一块来。傅崇碧怔了一下，立刻预感到出了大事。他让冯秘书通知刘光普等两外保卫干部来，乘车一道前往代总参谋长的住处。

房间里光线幽暗，迷朦的灯光给人们的心头笼罩了一层又一层的神秘感。

杨成武那锐利、明亮的眼睛审视了一遍随同卫戍司令来的冯秘书、刘光普和另一名年轻干部，他们个个轮廓分明、体格强壮，完全有应变能力。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向他们交待了即将执行的任务：

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原收藏在鲁迅博物馆的几箱子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马上批转给周恩来，让他负责查找。周恩来和陈伯达研究后，决定委托杨成武办理此事。

杨成武为难地说：“连点线索都没有，这不和大海里捞针一

样吗？”

周恩来浓眉一皱：“这事非抓紧不可，鲁迅的手稿是国家重要文物，一旦丢失，后果不堪设想。你们去提审戚本禹，他可能了解一些情况。你可以叫卫戍区和你一块办这件事。”

任务明确后，杨成武、傅崇碧带领这三个人，连夜赶到秦城监狱。

才两个多月，戚本禹这个身体高大的山东大汉就像换了一个人，浑身疲惫不堪，眼睛也红肿着，目光呆滞，往日的威风荡失遗尽！

当听到杨成武的问话声后，他才睁大眼睛，露出惊喜的光彩，急切地想听到什么喜讯。是的，他觉得自己太冤枉，几乎没干什么超越中央文革既定范围内的坏事，完完全全是一场误会。他相信，终有一天江青会回心转意，放他出去的。这一点，从他那企盼和等待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来。

杨成武温和地望着他，但语气却很严厉。他的问话单刀直人，没有与此案无关的其他语言。戚本禹一听是关于鲁迅手稿的事，就泄气了。

“手稿我取过，是根据江青的指示。现在哪儿，我不知道。”

傅崇碧沉下脸，厉声说：“你取了手稿，怎么会不知道？你要老实交待，你应该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戚本禹冷笑一声，有点不耐烦了：“你们去问中央文革原工作人员韩书信去吧，他知道。我取后是交给他的。”

“戚本禹这个混蛋，想嫁祸于人，把韩书信找来！”江青听完傅崇碧的汇报，没等周恩来表态，就把桌子拍得山响，“戚本禹不是个好东西，如果韩书信不知道，狠整他。就凭这一条，枪毙了他都不冤枉。”

韩书信乘专机回到北京，到了卫戍区招待所吓得脸色苍白。

当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反而坦然了：“我以为出了什么岔子了，原来是鲁迅手稿的事。不错，是戚本禹让我取的，交给何先伦了，而且有收条。”

七查八找，原来手稿就在钓鱼台的保密室里，是由保密员卜信荣办理的。

傅崇碧等四人松了一口气，杨成武见事已大白，便扬扬手：“你们去向江青汇报吧，就说东西就在她身旁，别这么穷折腾了。”说完先行走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大笑起来。傅崇碧说：“别笑了，快给江青打电话联系吧。”

刚调到钓鱼台的萧力接了电话，她是江青亲生女儿，自然能当半个家。傅崇碧问她：“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你们有事吗？”

“江青和总理委托我们查找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个人知道。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当他们分乘两辆吉普赶到钓鱼台后，通过传达室的负责人给陈伯达的秘书打了电话，得到批准：“可以进来。”

于是，两辆吉普车直驶十六号楼中央文革所在地。

叶群看完杨成武批来的那两封控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的信，首先打电话召回来林立果，让他看怎么处理，她拍着那两封信，摆出一副庄重和威严的架子说：“如果有这些事，那我们也没办法保他们，如果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林立果只觉血窜脑门，周身一阵躁热，怒不可遏地说：“这肯定是诬陷！一小撮坏蛋唯恐空军不乱，这是有预谋地射向我们的一枝毒箭。我敢断定，绝对没有此事。”

“你了解他们？”叶群眯缝着眼睛：“我倒要听听你的高见。”

林立果气冲冲地说：“于新野、周宇驰乱搞女人，你们谁看

见了？有什么证据？既然造成那么多后果，为什么受害人不告状而是由一伙不敢见人的鬼物出面？空军党委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写信人既然有证据有事实，那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签名嘛，为什么要写匿名信？”

一连串的提问把叶群说得直抿嘴笑，她连连摆手：“好了，好了，妈妈被你说服了，到底长大成人了，有点水平，好，你说怎么办吧？”

“把信转给吴司令，让他追查诬陷者。这正是组织队伍的时候。”

其实叶群早已拿定主意了，她之所以在儿子面前摆这个姿态，也是为了施展和扩大她的影响。在她眼里，即使周宇驰、于新野、王飞等真有揭发信中所说的那些问题，也要下决心保他们。她要的是这些人对他们的忠诚和有用，这是第一位的，其余都是小节，她才不再乎呢。朝儿子报以大方自然的微笑后，走到客厅里，开始拨吴法宪的电话。

林立果不放心地跟进来，注意听他们之间的对话。

“叶主任吗，我是吴法宪，有什么指示吗？哦，我们全家人都请你问候林副主度，祝愿他身体永远健康。”

“我不占用你的时间了，从总参杨代那里转来一封信，是告你们党委办公室的人的。林总已经看了，很生气。这事你有所闻吗？”

“不知道哇，一点也不知道！”

“你呀，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你太迟钝了，一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敏感性都没有。有人总想在你头上舞刀子，你都在睡大觉。好，我让老虎把信给你捎去，你看着处理。”

林立果很满意母亲的态度，这是他很少见到她这么果断、利索地办事的情形。他想，如果她每次都能这样处理问题，爸爸要少操多少心呢。

吴法宪看完材料，注视着林立果，那眼神分明是在征询他的意见。林立果故意装作不想卷人的样子，放下信件问他还有什么指示没有，等空军司令摇头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王飞、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轮流看完揭发材料，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他妈的，纯粹是捏造，绝不能放过去，一定要追查。”

“对对笔迹，一对就对出来了。”

“是的，这个‘鬼’脱不了空军常委办公室的人。”

“一场内紧外松的“捉鬼”行动悄悄地展开了，放出去了，等网收回来的时候，他们把焦点集中到了丁志强的身上。

“你们看，字迹像不像他的？”

“不错，就是他。”

“这小子，每天都和空军报的那个杨易勾勾搭搭，肯定没好事。这小子倒在我们背后放起黑枪了。”

“你们知道杨易是谁吗？”

“管他是谁！”

“是杨成武的女儿！”

众人惊叫了一声，屋子里顿时沉默下来。

于新野、周宇驰找到林立果，这位派头十足的年轻军官一副指挥官的架势，他镇定自若地说：“怕什么？小小的代总长有什么了不起，就怕不爆发，只要盖了揭开丁，什么事情都好办。”

等那几个一时懵懂的军官们省悟过来，都不由自主地向他翘起大拇指，表示钦佩。当下他们就研究了行动方案，决定让周宇驰出面先放头一炮。

“吴司令，出事啦！”周宇驰到了吴法宪办公室，大惊小怪地说：“余立金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秘书的老婆跑到党委告状来啦！”

“是吗？”吴法宪吃了一惊。

“他们互通情诗，让丁志强的老婆发现了，人家把情诗都拿出来。”

“在哪里？”

周宇驰把费尽心机搞来的几页纸片递过去，吴法宪戴上眼镜，结结巴巴地念了起来：

我过去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  
它是一条急流，  
飘荡着一叶轻舟，  
我的灵魂是船夫，  
他在巨浪中搏斗。

他还没看完，周宇驰给他指点着，又念第二段：

我过去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  
它像林中的豺狼，  
发出惊心的嗥声，  
它像林中的蝙蝠，  
发出吱喳的鸣声。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看都看不懂。”吴法宪说。

周宇驰解释：“这是咒他的妻子，前妻。你看，要害是最后一段。”

吴法宪又眯缝着眼睛往下念：

我现在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  
它是玫瑰树上的鸟巢，  
我在里面愉快地啼叫，  
暴风雨把它卷去了，

我飞了，另筑新巢。

“你看，为什么他老婆要告，他要另筑新巢，就是要另娶新人呢。”周宇驰说。

这回，吴法宪看懂了，他色眯眯地说：“想不到丁志强还有这两下，会作诗啊！”

“你看怎么办？”周宇驰紧追不舍。

吴法宪这下才感到作难：一个是空军政委的秘书，一个是代总参谋长的女儿，弄不好会出大乱子。可他也深知周宇驰的后台是林立果，也是惹不起的硬头，便搪塞着说：“我们再调查调查，取得证据再说话。”

周宇驰走后，吴法宪派人调查，结果几乎弄出大笑话：那封所谓的情诗原来是丁志强抄的匈牙利十九世纪著名诗人裴多菲的名作，而他的妻子也推了一干二净，坚决不承认丁志强和杨易有什么越轨行为。

吴法宪退却了。

周宇驰、王飞、于新野等人继续缠住他不放，给他出主意：“你应该下令立即将丁志强隔离审查！”

“人家问我有什么罪，我该怎么回答？”

“只要将他隔离，不愁审不出问题，没有这，也有那。”

“这不好，余立金还是空军政委，抓他的秘书不通过他行吗？你们不要强迫我，我是司令员，我还没有被夺权，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

周宇驰、于新野见吴法宪采取丁强硬态度，倒楞住了。于新野搭讪着说：“好，好，我们决不使吴司令为难，你先考虑考虑，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当屋里就剩下吴法宪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将不会善罢干休的，自己既要当他们的挡风墙，又要给他们当炮灰，这个空军司令也当得太窝囊

了！他自己也告诫自己：要在他们面前抖起架子，把腰杆挺起来，像个堂堂的空军司令的样子。想当初，自己指挥一个军几万人作战时，一句话说出去，谁敢说半个“不”字。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就冲上去了。那时，一个军长，够他妈的威风了！而现在，咳，不知怎的，见了这几员小将，腰杆子反而软不溜球的了。

吴法宪神经质地望了望窗外，该回家的时候了，他站起身缓缓走了出门。

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凌晨，周恩来正主持国务院的一个重要会议，被秘书轻轻叫了出来，让他去接重要电话。

“总理呵，不得了啊，傅崇碧带了两汽车人，全副武装，来到中央文革要抓人。他们气势汹汹，厉害得很，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我们还有党纪国法没有？”江青激动起来，那声音很像喊叫，“对这个傅崇碧，我可是忍让好多次了，他越来越厉害，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我更不在他的话下。他要吃人哩！”

“江青同志，不要着急。”周恩来轻声地安慰道。他办公室里的电话，是经过保安措施的，在办公室里，从话筒一侧的一只扬声器可以听见钓鱼台里江青和康生轻声低语交换意见的声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接着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从线路上传来了江青粗哑的声音：“我要求严肃处理这件事，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要求他必须做检查，交待这样干的目的。”

“好，我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情况，然后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好吗？”

好长一会儿时间鸦雀无声。最后，传来“啪嗒”一声放电话的响动。

巧极了，周恩来刚放下电话，办公室秘书就来报告：“傅司令要求汇报查找鲁迅手稿的经过。”

周恩来说：“让他进来。”

傅崇碧脸上挂着完成任务的喜悦，见了总理就报喜。周恩来坐在桌子对面，带着某种同情的神态观望着他。这一年多来，紧张的保卫工作把他拖得疲惫不堪，但他作为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而坚持不懈努力工作的将军，却从来不叫苦，默默地忠实于上级的命令。他与这位办事干练的卫戍司令建立起一种信任和亲切的感情，但他不能表现出来。

“你是怎么进去的？”

“经过请示了伯达的秘书呀！”傅崇碧这下感觉到总理已经知道那段不愉快的经过，便滴水不漏地汇报起来。

“我们的两辆吉普车在十六号楼前停下来，碰见了姚文元同志，我和他打过招呼，便和大家进了会议室，还没来得及说话，江青气呼呼地推门进来，冲着我吼道：‘傅崇碧，你这个卫戍司令，你是不是要抓人？谁让你们来的？’我们赶快解释‘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她两手捂住耳朵，喊叫：‘我不听，不听，我现在没功夫和你罗嗦，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我说：‘江青同志，鲁迅手稿有下落了。’她还是大发脾气：‘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这时，他的冯秘书由于劳累，又受到突然惊吓，一下子晕倒了，皮包也掉在地上，把江青同志也吓了一跳。”

周恩来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很快消逝：“她是不是以为你们要打她？”

傅崇碧说：“谁知道呢。后来我们把冯秘书扶的扶，抬的抬弄到一边休息时，我对江青说：‘手稿的事弄清了。’她的态度也缓和了，问：‘在哪里？’‘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她一听又要发作，我忙告诉她：“错不了，有收条，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她马上下令：‘把他叫来！’保密员进来后，先向我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问：‘首长找我有事？’我问他：‘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他说：‘在，就在楼上保密室，保管得好好的，共有四个箱子。’”

周恩来以惊奇的神情坐在那儿倾听汇报，听到这里，“唉”了一声：“在那种场合，不该你提问，那位保密员也不该回答你，让江青同志发话么。要知道你这样会使你付出巨大的代价呀。”

傅崇碧叹了口气，继续汇报：“保密员的话刚说完，江青就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抓起来！你们还楞着干什么，还不给我抓起来！’于是，立刻有人上去扭住了那人的胳膊，把他拖了出去，那人临了还一个劲地喊：‘我冤枉！我冤枉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周恩来站起身来，眉头皱成一个团儿，开始踱步：“你继续说！”

“保密员拖走后，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当着他们的面检查！’人们怕她再发火，急忙上楼抬下来四个樟木箱子，打开一看，不错，里面的确全是鲁迅的手稿。江青检查完毕，下令封好。这时，她的态度也变得和蔼了，非要留我们几个人吃饭。我当时想推托，只见她又把脸一沉：‘叫你在哪里吃饭，你就在哪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还是怎的？’我看她很固执，也为了和缓一下气氛，我们就留下来了。刚吃完饭，江青又布置任务给我们：‘你们还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个坏蛋盗走了，你们去审问他，手稿藏在什么地方了。’可是我们到秦城监狱，把戚本禹提出来审讯时，他根本否认拿过手稿的事。尽管我们一再给他施加压力，他还是不承认。他说：‘我借过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来没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得经他批准。’经我们和汪东兴联系，证实戚本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说谎。”

周恩来小心翼翼而又全神贯注地听取了傅崇碧的汇报。最后，总理仰起头，喘了口气，深沉地说：“这事要是先向成武和我汇报就好了，你也太性急了。应该从这件事里吸取教训。如果有人要批评你们，不要顶牛，认真听取，虚心接受，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

## 吴法宪仗势设陷阱 杨成武卧病失乌纱

吴法宪一听说是毛家湾来的电话，就知道情况不妙。

“吴司令啊，我可要骂你了。”话筒里传来叶群的喝斥声，他好像已经看到了那个怒目环视的女人的面孔。

“叶主任，你批评什么我都接受，并保证坚决改，坚决改。”

“你太不识好歹了！你这个司令当得危险极了，明明是余立金勾结一些人要夺你的权，你说立果、宇驰、新野他们夺你的权，夺你的什么权？我们把儿女放在空军正是为了保你，保你这个空军司令，你反说我们夺你的权！那好，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从你们空军撤回来，看谁倒霉！”

吴法宪大汗淋漓，急忙陪不是：“叶主任，我错了！我决没有那个意思。”

“宇驰和新野让你把那个人抓起来，是为你好。你是个司令，连个女人都治服不了吗？白纸黑字、人证物证俱在，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能行吗？你手中有权怕什么，一块抓，我们给你撑腰。还有，空军司令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攻击首长‘有毛主席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余立金为什么

不抓？宇驰抓了就受攻击，你们还有没有党性？那天我把杨成武臭骂了一顿，他屁都不敢放，放我敢敲他的脊梁骨！”叶群一开口说话，都要唠唠叨叨讲半天。

吴法宪被骂了个狗血喷头，还得陪笑脸，对着话筒讲了半天好话。但到了办公室里，见了他的部下，立刻把肚皮腆得老高，吊着脸对保卫干部说：“丁志强败坏军纪，散布流言蜚语，真不像话，给我立即抓起来，隔离审查！”

一个小时后，丁志强刚从余立金办公室里出来，还没下楼梯，三、四个保卫干部就迎上来：“丁志强，你犯错误了！”

“我犯什么错误了？”

“别装蒜，你心里清楚。”

说着，他们冲上去，不由分说，立即给丁志强戴上手铐，押至禁闭室，让他交待和杨易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

丁志强怒不可遏地跳起来，连声抗议，被他们几个耳光扇去，嘴角流出了鲜血……

余立金闻讯后立即去找吴法宪，吴法宪报之以凝视的目光，连句让座的话都没有。

“余立金闻讯后立即去找吴法宪，吴法宪报之以凝视的目光，连句让座的话都没有。”

“丁志强犯了什么罪？”

“你去问保卫部门去吧，他们还在审理此案，我想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余立金已经觉出里面的名堂，他的怒火随着每一分钟的消逝都越燃越烈，然而，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痕迹。他知道，此刻和他再磨牙也没用，得向上级报告，向中央最高领导报告。他转身就走。在路上，他突然想起，还是首先应该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因为这事牵扯他的女儿……

杨成武接到电话通知，匆匆忙忙赶到了钓鱼台。

十六号楼是座灰色的建筑物，一年多前这里成为中央文革集中办公的场所。这幢现代化加上中国传统古建筑的楼房虽然不高，却因这里的人权重威大而闻名全国，完全像是一座截了顶的空中地下交通控制塔，各个机关、组织和造反派的头头都在侧耳倾听。如果说，代总参谋长一开始还对这里还抱满幻想，以全部热情和精力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的话，那么现在他已厌烦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正在消极地、步步设防地撤出以这座楼为核心的小圈子。

钓鱼台的人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把话点透。

二楼办公会议室中装有一长排面朝北的窗户。正是早春季节，窗外还没有如绣如绘的景色。杨成武来的时候，窗帘拉得紧紧的，挡住了傍晚像火烧般的晚霞。只见周恩来双手环抱着臂，冷静地听着乱哄哄的发言，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还有几名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都坐在周围，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杨成武还没落座，人们的目光便转到他身上。

“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江青总是喜欢首先开炮。

“我不知道呀！”杨成武说，“他为什么要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的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康生振振有词地说：“他藉口汇报鲁迅手稿的问题，而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准备马上研究这个问题，他不等正式通知，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了进来，极大地干扰了中央文革的正常秩序，你这个总参谋长要负责的。”

这时，刚从厕所出来的叶群进来，一见杨成武就大声质问：“连中央文革的驻地都敢武装冲击，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杨成武应该心里清楚。”

江青手指点着桌子说：“这样的军队干部真给解放军丢人！”

军队这么干，真是无法无天。今天敢冲中央文革，过几天还不知要冲到哪里！要批评卫戍区，要批评傅崇碧，你杨成武负责！”

“我负什么责？”杨成武实在忍受不下这一段来的窝囊气，积蓄在心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三没有下令让他们去冲，要批也是由他们去批，干嘛老揪住我不放？”

“你的态度有问题！”陈伯达一反往日的斯文，拍着桌子说，“有人证明傅崇碧是请示了你的，你们有意冲击中央文革是有目的的，这个赖不掉。”

姚文元也瞪起眼珠子：“你这话是包庇傅崇碧，军队的问题你怎么不负责？”

“你是代总长，鲁迅手稿的查找是交给你的，就是要你负责。”江青几乎是吼叫了。

“我负责？”杨成武好不容易才插上话，“我既不能越级去给卫戍区下命令去冲你们，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我负不了这个责，也不能负责。我退席！”

“坐下！”周恩来站起身，紧紧拉住他，把他用力按在沙发上，“成武同志，军人怎么不懂得纪律？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告诫你陪谢富治同志去一趟，把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找来，严肃地批评他们的这种行为，通知他们今后不准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一次就这样了！”说完，使劲地捏了下杨成武的手。

这是一种暗示。

杨成武感觉到了。总理在这一场又一场复杂的政治较量中，既要巧妙地保护一些无辜的干部和同志，又要考虑到让那几个人下得了台，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作必要的让步。总理这种灵活、巧妙的迂回战术在许多回合的斗争中获得成功，这点他是深为折服的。所以，他马上点头：“好，陪他去可以。”

周恩来转过身对谢富治说：“你和成武同志去卫戍区一趟，

召开一个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对他们的行为批评批评。”

谢富治点点头。”好，我去！”

杨成武、谢富治离开会议室后，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一起冲着周恩来嚷起来：

“我的天啊，你们看杨成武狂妄到什么地步了，简直不像话到了极点！”

叶群火上加油地说，“他公开顶撞江青同志，这可不是小问题，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取悦那几个老右倾！”

陈伯达已经摸到了江青的真实意图，也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应该向林副主席和军委郑重建议，他这个人继续担任代总长是危险的，极其危险。”

“看来，他们有个山头，不像是孤立的、个别的问题。”康生沉着地说。

“将情况报告林副主席，让他向毛主席建议！”姚文元也气鼓鼓地说。

会议室里就像沸腾的开水，滚滚地继续散发着狂势的气息。

林彪详细地了解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情况，每个人表什么态他都问到了。他摸着下巴不住地点头：“时机成熟了，这个肿包快裂开了。现在，我们要沉住气。”在这位身体瘦弱、老成持重的元帅心中，有某种使他感到奇怪的念头正在萌发出来。他对一个人一旦憎恨起来，就非要整死他不可。

叶群催促道：“大家让你快点报告毛主席，及时采取措施。”

林彪笑了笑：“不忙，这类事情不能着急，不能抢先，让江青和总理他们先汇报，我要在关键时刻开炮。”

说林彪工于心机，善搞阴谋，那是名不虚传。尽管他当党的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已快十年，但他心里很清楚，他只不过是抓些具体工作而已，真正的实权还是由毛泽东牢牢掌握的。何况前几年，在他的前头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这几

位副主席，他顶多是个配角。所以他对叶群作了明确交待：“今后，我们主要是闭目养神，一切照上面的指示办，自己不要建言，不要提负责性的言论，不要得罪上头和周围。我们出去，对外接待要面带三分笑，给人一个好印象。”

叶群对他的话很重视，亲自作了记录，并总结为他们对外的三不主义。

现在，林彪地位变了，他要千方百计地剪除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便不得不公开出面。但他还是留了一手，这是为了更好地对付毛泽东。

这时，秘书进来向叶群报告：“空军余政委来电话找你。”

“不接。告诉他，我到外面开会去了，不在家。”

秘书当然照办。

又过了几个小时后，杨成武办公室又打来紧急电话，叶群同样不接。

电话里传来赵志珍恳切的声音：“张秘书吗？如果叶主任太忙，不能接我的电话，就请你把我反映的情况报告她，也报告给林副主席。空军现在乱套了。余立金政委的秘书为了照顾我在空军报社的女儿，有时和她接触多一些，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党办就有人造谣，说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这纯粹是胡扯，我听说后也没有往心里去。但他们实在不像话，硬逼着那秘书交待所谓的 relationship 问题。那秘书理直气壮地顶了他们，他们竟把他抓了起来。这件事都是空军吴司令下令干的。吴司令这样干太不应该了，它不但在败坏我女儿的名誉，而且这样下去，就把空军搞乱了。如果不及时制止空军一些人胡来，后果很难设想。我是担心哪！请报告叶主任，让她注意一下空军的动向。”

秘书又把电话内容原样照告叶群。

叶群装出一副惊奇的样子说：“吴司令向来优柔寡断，这次怎么这么大的气魄？你给赵主任回个电话，就说我知道了。她反

映的情况我一定向首长汇报。”

秘书给赵志珍再打电话时，赵志珍的情绪更加激动了：

“请你报告叶主任，谢谢她的关心。刚才我又听到一些新的情况，吴司令越来越不像话。有很多话光用电话说，是说不清楚的。我想到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如果能见见叶主任也就行了。希望叶主任抽一些时间，见一下余政委和我。”

叶群本想把这事瞒着林彪，这么一来瞒不住了，她知道此事迟早要捅破，不如干脆和他挑明，一起商量个对策。

叶群支走秘书后，迳直进了林彪的卧室，故作大惊失色的样子说：“不好了，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吴司令的权了。杨成武的老婆和余立金提出，要来这儿告吴胖子。”

林彪绷着脸，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又踱起了方步：“他们告吴司令什么呢？”

叶群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把余立金的秘书和杨成武女儿的事讲述了一遍，还特意把空军司令部有人反对林彪那句话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她尽量把话说得比较简单，怕林彪听了不耐烦。没想到他听得非常认真，还一个劲地追问几句。最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好，这下有文章作了。你答应他们来，让他们给你报告。这就是他们夺权的证据。我正愁没内容向主席汇报呢，送上门来的材料焉能拒之？”

叶群踏实了，扭着身子出来执行这个计划。这时她才真正服气，别看林彪平时不多看材料，也不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其实肚子里的学问多着哩，这绝不是多看几本书所能具备的，那是他多年来参与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无数大政治家、军事家身上吸取来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晶呀！

杨成武从那天参加完钓鱼台的会后，就病倒了。

医生说患的是美尼尔氏症，需要卧床休息。他只好分别向中央、中央军委请了病假，谢绝一切外事活动。空军大院掀起那场急骤风暴时，他就意识到里面有文章，很可能要牵扯到他。但是自己行得正，走得直，正大光明，又怕什么呢？

愤怒、气恼纠缠着他，他不得不在病床上和余立金及自己的妻子商量这件事的性质，决定让他们去见叶群，替自己处理这码事。他说：“看来，这是我转给林彪那封告空军党办个别人的信件的回报，你们要注意。”

凭直觉，他已感到自己和林彪的关系，越来越微妙到难以捉摸的地步了。

林彪当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时，他是师长，是林彪的下级。长征结束后，他们再没在一起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曾和他谈话，说：“你可写点在红一军团时的回忆录，教教大家嘛。我军的传统不能丢哟。”说着把周赤萍写的一本《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的书送给他看。杨成武回来后看了那本书，心里很不是滋味，通篇吹捧林彪是“天才的军事家”、是“天才的指挥员”一类的词句，仅“光辉”“天才”就用了十几处。他隐隐觉得林彪也是暗示自己撰文给他捞资本。翻来覆去考虑几天，他把林彪当年和自己的谈话凑成一篇文章，题目是“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他没有写具体事，只总结他的言论，最后特意写了这么一段话：

“这次谈话将要结束的时候，林军团长着重指出，当师长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主席的思想，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指挥作战、处理工作。林军团长特别嘱咐我把毛主席刚刚在红大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带在身边，经常地读，反覆地读，遇到问题碰到困难就从那里找指示找答案找办法。林军团长说，只要领会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坚决执行了林军团长的这一指示，把当时还是秘密文件的《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这本油印本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开馆前微求展品时，我才把这本最心爱的、给予我无穷的信心和力量、指引我走过艰难而崎岖的战争道路的毛主席的伟大的、光辉的著作，赠献给解放军军事博物馆。”

这显然不是林彪最需要的。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性格更加孤傲，架子也更加大了。包括杨成武向他请示和汇报工作，常常都不能及时见到他，都要先经过叶群，坐很长时间冷板凳后才能和他谈一次话。而且还得简明、扼要，见面谈话的约束太多。

所以，如果不是工作特别需要，他轻易不愿去见他。

但是，最近一段来，林彪几次给他捎话，要他不要再给几个老师送文件。并在月初，将他召到毛家湾，亲自沉着脸下令：“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剑英了。”

杨成武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林彪火了：“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说完扭头进了卧室，把他晾在客厅。

但是，杨成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只扣发一些次要的文件，重要的东西仍旧分送叶剑英等人。

在他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之际，他没有主动向林彪汇报过一次党的主席活动和谈话的内容，可那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交待啊，会不会林彪对此产生嫉恨呢？

对了，早在一九六六年前，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几次写匿名信，揭发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国民党等等，林彪为此事大动肝火，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指着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说：“她的事情，我不清楚。”林彪

怒火中烧，竟大声骂道：“你们天天在一个炕上日吊，会不清楚？”

人们没想到林彪的话会如此粗野，一刹时都惊呆了。

林彪不顾一切地对着陆定一吼道：“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事后，林彪曾和杨成武谈话，让他写一份证明叶群历史清白，很早就参加革命的材料。

杨成武为难地说：“我从前根本不认识叶群同志，一九六〇年才第一次见面。她在天津、北京的情况，我怎么能知道呢？林总，别人说叶群什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先看看材料再说。”

林彪脸色骤变，扬扬手说：“没事了，就这样吧。”

谈话不欢而散。

躺在病床上的杨成武，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苦闷吞噬着他的心，脑海里像过电影似地翻腾着一件件往事，既反省着自己，也重新认识着别人。从空军大院爆发的这一事件后，他突然感到了败絮污秽的危害，党呵党，我们党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根绝这些腐朽现象呢？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自信的，无所畏惧的。因为他知道，党内绝大多数老同志，对自己是了解的。

还有，毛泽东到了关键时刻是会为自己说话的。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多了。

## 毛泽东再玩平衡术 杨余傅惨做牺牲品

毛泽东的注意力始终放在总的方向上，凡是认定了的东西绝不容任何人随意改变。听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的汇报后，他并没有当即表态。林彪的三次谈话都提到一个基本话题：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串通起来，要为二月逆流翻案，要把中央文革和新提拔起来的这些军队领导人、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下，他震动了。

江青让他闲暇时读一篇上海《文汇报》的编者按，他一直没顾上读。这时，他却想起来了，亲自从桌案的文件堆里取出来，想仔细看一看。

这封读者来信，揭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在一月革命过去了十一个月的时候，居然有人按期递送《闽西报》，赠阅中共上海市委陈不显；还有人在写给市革委会的一个文件中，给旧市委中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评功摆好。

这二件咄咄怪事，不能不激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怒。

请问这些人，你们承认不承认“一月革命”，承认不承认在上海发生过一场夺权斗争？

毛泽东看不下去了。

他知道，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一直有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在抵制，在顶牛。他们不赞成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不赞成无休无止地混乱下去，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建立的这种党不党、政不政、军不军的新秩序，他们仍希望恢复过去的老样子。

看起来，张春桥在上海也看到问题的实质了。这说明，右倾翻案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自下而上的一股潮流。

毛泽东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读：

它告诉我们，陈、曹之流虽然已被打倒，但是他们死不甘心，像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正在舔着创伤，进行垂死挣扎，一待时机成熟，就将猛扑过来，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而他们手下的一批干将、死党（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特务、叛徒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有的已被我们揪出来，有的仍然潜藏在一些部门和单位里，甚至冒充“革命同志”，睡在我们的身旁，充当陈、曹之流的代言人，充当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奸细。而我们有些同志，却是过分天真，轻信他们的花言巧语，甚至盲从行事，岂不是太危险了吗？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话无异于一串警钟，使人们的头脑更加清醒了。这时，他耳边又响起林彪的话：

“主席，我们已经查清，余立金在新四军突围途中被俘虏了，也是叛徒。杨成武勾结他一道来夺吴法宪的权，现在斗争已经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如果按照杨成武的办法，那我们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与他同等地位的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得排挤掉。”

这还了得吗？难道能为了保一个人而牺牲掉大多数将领吗？

当然不行！

他眼前又出现了江青的面容；

“主席，傅崇碧仗着背后有人，已经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了，带着两汽车军人，全副武装开进钓鱼台抓人。我们的安全已受到威胁，中央文革碰头会集体指示杨成武去卫戍区批评他们，这个坏蛋竟公然抗拒！”

好啊，从林彪到中央文革每一个都异口同声地得出结论，自己再不批准就会伤了左派们的心，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复杂事件。

毛泽东不能再等待了。

他按了一下桌子旁的电铃，将秘书叫来，吩咐道：“通知林彪同志和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并通知总理，马上到我这里开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天还没亮，灰蒙蒙的，像罩了一层厚厚的烟雾。

余立金被秘书叫醒，说吴法宪那边来了电话，让他马上过去，有重要事情商量。

“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

“不会的。主席有指示传达就是了，还用商量！”

余立金急忙起床，穿好衣服，披上大衣，走下楼梯。这时，新任秘书问他：“要不要叫上警卫员？”

余立金摆摆手：“不要了，这么近。”

他走进吴法宪的院门，还没到屋门口，冷不防从暗处冒出四个军人，其中一个问：“是余政委吗？”

“是我！”

话刚落音，那几个人猛地窜上来，扭住他的胳膊，卡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连推带搡把他拥进吴法宪的客厅里。

吴法宪像个笑咪咪的弥勒佛，打量战利品似地把他凝视了一遍又一遍：“余立金，没想到吧？这就是你的下场！”

“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凭什么铐我？”

吴法宪顿时变了脸：“铐你？铐你是好的！你是个叛徒、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政委，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控告你！”

吴法宪冷笑道：“别作梦了！我正式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几个小时后，余立金的秘书才得到的消息，当他匆匆忙忙打电话向杨成武询问情况时，接电话的赵志珍惊呆了：

“是吗？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没有料到，再过几个小时，厄运又降临到自己身上。

“咚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了杨成武。他穿着睡衣，开了门，是李作鹏、邱会作威风凛凛地站在门口，他们身后站着十几个手执短枪的战士，个个煞气腾腾，如临大敌。

“你们这是干什么？”

邱会作冷冷地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开什么会？还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要是在往常，代总长的这声厉喝，足能使这帮人吓得心惊肉跳，可是现在，他们脸上一色的轻蔑。在他们看来，堂堂的代总参谋长已经变成到手的猎物，可以随他们摆弄了。

杨成武冷傲地转身去打电话，电话早被切断。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陷阱了，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傅崇碧接到电话通知，是谢富治亲自打来的，要他通知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由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接见大家。

到了大会堂后，停了好长时间，他被引进小会议室内，里面

坐着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随即林彪进来，毫无表情地瞪了他一眼，向他宣布决定：

“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主要负责北京卫戍区，接替你的工作。”

说完，林彪站起来，对中央文革的人挥了一下手：“走，我们去接见团以上干部！”

傅崇碧啥都明白了。

当夜他就被强行带上飞机，送到东北限制了他的自由。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傍晚七时，人民大会堂里又召开了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几千军队干部黑压压地坐在席位上等了两个多小时，主席台上还是空无一人。

快到九点半时，十几名工作人员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们匆匆彻去几把椅子，其中一个按着一张纸摆放着椅子，连续数了两三遍。

台下的军队干部议论纷纷，进行着各种猜测。看得出来，大厅里的气氛是紧张的，紧张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突然，台下的灯光亮了。

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从旁门里走出来，被请到主席台下第一排就座。

许多人大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穿着黄绿色呢军装的林彪和深蓝色中山装的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们身后紧跟着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和汪东兴等人。当他们就座时，台下一片掌声。

“瞧，黄永胜怎么也上主席台了？”

“还有吴法宪呢，你看他那个乐劲，笑得连眼睛都看不见，像个西葫芦头。”

“别瞎说，小心当反革命！”

灯光聚在了林彪身上。使他那两道浓眉和清隗的黄蜡脸庞，分外突出。只见他抬起头来，左手摆弄了一下麦克风，拉长声调开始讲话：

“同志们，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起其他的一般问题要大的，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有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其他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空军常委第二书记的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时决定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每宣布一项，台上台下都要响起一片拥护的口号声和掌声。台下前几排的人看得一清二楚，黄永胜稍微低着头，直想笑，但又不好意思笑，只好拿出手帕捂住嘴，掩饰着那副过于得意的尊容。

林彪完全离开了讲稿，随心所欲地讲起来：“杨成武做了事不承认，例如傅崇碧带了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三次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他不承认。他为了一点问题跟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他事后赖账，他说他没讲。还有，空军里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出来告，秘书自己就要离婚，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把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好心好意，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女儿的名誉。可是，他非

但不感谢，反而乘机反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常委里面几个揭出问题的，接受这个控告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这个做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负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本来中央规定不能在党内搞侦察，这是对阶级敌人的办法，可是他在空军里面搞侦察。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甚至于侦察中央文革、总理的行动。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煽动，一下子又把台下听众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口号声又一次续了七、八分钟的时间。

林彪等到掌声和打倒的呼喊平息之后才举起手，并降下了他说话的调子。

“去年夏天，主席要杨成武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那时是王、关的问题，当时我身体有点不好，在并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不要看他表面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

江青故意满不在乎地插话：“那还早呢，在去年春天就搞了。”

林彪“噢”了一声，继续说：“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这时，他把头扬起来，也加重了语气：“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

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独特的作用，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线。”

顿时，“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的口号声席卷了整个大会堂，狂热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如果那时有谁试图说什么相反的话，准会被打倒声淹没。所以，心中有气的那些人无力地跟着哼哼，他们甚至没有为此而费心。

江青的眼睛一直注意观察着主席台下的动静，忽然她似乎发现了什么，侧着身子问周恩来：“聂荣臻怎么没来？”

“他请病假了。”周恩来说。

陈伯达听到了，遗憾地说：“应该让他来听听，受教育，这个小山头就是他的。”

周恩来讲完后，江青站起来了。

她显得很可爱，很亲切，一点都看不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完全像个初出茅庐的小学生，一句“同志们好”，便赢得了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工作做的也不多，学习比起同志们来也许差一些，但是我努力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学习主席的伟大思想。所以，我要是说错了，同志们炮轰我，大字报、小字报我都不怕，我尽自己的力量来和同志们共勉。”

此时，台下有位熟悉她的人失声笑了，笑得很惨，夹着一丝哭腔。天哪，越是专横、霸道的魔鬼，越是要装出谦谦君子的模样。这岂不是更可怕了吗？她的动作，引来了很多人惊奇的目光。她赶紧用双手捂住脸，一溜小跑退出会场……

江青两手托在桌上，似乎很激动地说：“昨天，我才知道是杨成武三次指示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的。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在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

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想打倒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跟我一样，可能有缺点，也许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是一个很正派的同志，这允许吗？”

自然是暴风雨般的回声：“不允许！”

陈伯达摇摇晃晃站起来发表讲话了。

大众场合，他喜爱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一开口便有总结历史的口气。他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五大回合的斗争，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他扳着指头，一一讲解：“从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起，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到现在，恰恰两年，我们取得了揭发彭、罗、陆、杨的伟大胜利；第二回合就是打倒了刘、邓、陶；第三次的胜利，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去年的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我们又批判刘、邓、陶留下的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叫王、关、戚揭露出来了；这次打垮了杨成武和余立金，是第五次胜利。”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讲到了《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的事，娓娓动听地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我也是有错误的，在这个会上作自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给我们时，交给了姚文元同志，搁在床头一个多月的时间没理他。那时，我们两个商量，不大愿意发表那个东西。但是他不断催，不断地打电话，他是代总长，这使我们相当地愁眉苦脸。这怎么处理呀！他看我们不动，就去找戚本禹，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把关的，不发表它。结果还是没把好关，让他发表了。我们一商量，不把他这篇文章突出，放在第二版。这时他串通戚本禹说他的文章代表世界人民的声音。”

江青哈哈大笑起来。

陈伯达装出一副哭丧脸继续说：“戚本禹就向我们，向我和姚文元同志施加压力，质问为什么不给点消息呀！他代表世界人

民的声音，为什么不给呀！我们说他怎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比毛主席还高吗？就没再给他机会。”

姚文元插话说：“同志们，那天搁到第一版的都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杨成武居然公然施加压力，要把他的文章搁在一版，这不是要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吗？”

江青也插话：“我昨天还听说，戚本禹为这个事还跑到他家里去，代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他全家送给他勋章，十分可笑，是小丑！”

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是不是揪出杨成武，我们可以睡大觉了呢？不能睡大觉，还是会有变色龙，或是有变色小爬虫会跳出来同我们较量的，应当有这个精神准备，准备他们跳出来，但是他们照样会可耻地失败。”

最后，康生和姚文元又轮流作了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对今天的会议表示热烈拥护。林彪接到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已到休息室，准备接见全体与会同志！”

这时，准确的时间已是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二十分。

林彪宣布喜讯，会场一片欢腾。

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出现在主席台上。人民大会堂的灯光顿时全部开放，像千万只星星聚拢在太阳周围般的顶棚上，明亮的灯柱光彩夺目，摄影镜头闪闪点点。整个大会堂掌声雷动，欢呼声响彻云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精神抖擞，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不住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停下来呼喊：“同志们好！”

陈毅同大家一样，也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

位是，陈毅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在他走出会场，准备上小轿车时，抑起脑袋朝天大笑起来，像看完一幕精彩的闹剧一样这使司机和身后的人们感到奇怪。

因为他的笑声是苦涩的。

## 林彪趁机扩充实力 江青无奈心事重重

政治局常委会议已经散了，烟雾腾腾的小会议室里，只留下了这个重重心事的江青。

和以往任何一次会议一样：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然后凑情况进行讨论，继而人人表态拥护，再然后各自离去该咋办还咋办已经成了惯例。：“争取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议”刚刚作为一个有力的号召来提倡，就传来陈伯达散布张春桥、姚文元如何如何的流言。也许，这位党的“头号理论家”会以为只要他把同张、姚的矛盾公布于众，就会迫使毛泽东改变主意，江青也会被迫沉默，从而把这两个人在中央压下去，那些军界暴发户和他们那批老秀才便嘻嘻哈哈凑到一起，使未来的中国成为他们的天下。

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江青早已看出，林彪已经越来越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当然自己也不在他的话下。他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那几位军队中的新贵紧紧地抓在手里，而且正在向笔杆子渗透。陈伯达早就和自己离心离德，甚至给毛家湾不断透露消息，成为钓鱼台内的心患。后来陈伯达更堂而皇之地搬出钓鱼

台，有意和自己拉开距离，公开的理由是说“和姚文元弄不来”，实际上是向自己示威。

中央文革成立不到三年，人员已经换得差不多了。从最初的十七、八个落到五个人，除了陈伯达和康生外，只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现在他们若明若暗地攻击张、姚二人，想把他俩拨拉下去，就是要使江青成为光杆司令。这个计划在不声不响地实行着，谁都能感觉到但谁又都不说，确实带着很大的奥秘性。江青看透了这一点，只是连连冷笑。

在她看来，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召开的中共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全会开得是好的。会议通过了党的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特别是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分清了大是大非，为下一个目标打算铺平了道路。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可能或者说已经出现。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政治新贵们大都有个可爱的共性：说话粗鲁而犀利，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尽管在摆情况时也爱开个玩笑，说句诙谐有趣的话，但是，在谈意见时，决不掩掩藏藏，含含糊糊，经常是铁碰铁、钢碰钢，还名其曰这是“造反派的脾气”。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见了江青时，连有名的“炮筒子”吴法宪、黄永胜都在她面前心怯发慌，羞愧发怵得无地自容，为怕引起误会他们一个个强挤笑容，不得不点头哈腰曲意逢迎。

“别看他们当面对我吹、捧、哄，一口一个是是是，背地里却恨不得盼我早点死掉。”对此，江青倒是有点自知之明，常在姚文元面前这么讲。但是，她很为自己的养尊处优而得意，把别人对自己的敬畏看作是自己的特权。哼，这种特权可不是那么容

易得的，是毛泽东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表现，非我莫属。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妻子，这种特权夺不走、放不坏，走到哪里也得承认。但这个女人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要建立她自己的功勋，她要组织她自己的队伍，她要形成自己的一整套体系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心。尽管江青在口头上是死也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但自己的行为是自己心理意识的最好写照，政治家尤其是如此。

令她忧虑的是，通过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的势力已经日益增强扩大，而且正在稳固，如果再在九大上他们进入政治局常委之中，那种隐患就更大了。

会议开始前，江青单独和林彪谈了半个小时的话。她徵询他对九大上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林彪说：“我看还是选十一个人吧，让黄永胜、吴法宪都进来吧，他们对主席对你都绝对忠诚，他们在军队内几十年能压住阵，比一些刚提拔起来的秀才强。你考虑呢？”这话太明显了，他的人马的确都是九转十八弯闯过世面的，而且人缘范围广，老部属特别多，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踪迹，一旦进入政治局或常委会有肯定能形成对他有利的局面。那时候，别说她，连毛泽东也会被架空。经过这场运动，他们那一帮子可是说得出干得到，说不定比刘少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她得及时提醒毛泽东，加强党的领导，特别要防止一些政治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偏偏毛泽东根本没有理会她的话，也没有对她的提醒有任何表示，反而在会上反复强调团结，甚至指着她的鼻子说：“你这个江青啊，要高度注意呢。许多人对你有意见，只是不愿意当面给你讲就是了。要注意团结，能不能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有无胸怀的标志。你要努力。”

就康生提议江青进政治局常委时，毛泽东又笑着说：“她够格吗？我看玄。如果九大上选她进入常委会，我们就热闹了。”

说罢摇摇头。

江青听了，真想放声大哭。

会上，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和部分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动态，例举了许多领导干部犯错误的教训，一致决定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召开党的九大，毛泽东点头应允了。但江青心头的阴云却愈来愈浓重，她仿佛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别人当作“废品”踢出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前门拒虎，后门引狼”不正是这种局面的写照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过失比之写文章或开会讲话时说错几句话，念错几个字，甚至不给自己剧团排样板戏，又该大了多少倍呢？

现在，虽然谁也没有提及这件事，谁也没来和她商量九大的人事安排，但她隐隐感觉到了某种危机。明明已经感觉到了隐患，但还不能正面向人提及到这一点，甚至还必须得违心地为此唱赞歌，还有比此更能叫人感到痛苦的事吗？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除了她江青，没人再敢触动林彪一根毫毛。因为毛泽东似乎根本不想去招惹他，似乎一切都对他放心，都对他纵容，都对他开一路绿灯。

那还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深夜，林彪从十六点四十分开始到二十点四十分结束，作了整整四个小时的报告。据他自己放风，这个报告就算九大政治报告的蓝本，但江青认为林的报告漏洞很多，根本代表不了政治报告的水平。林彪的报告共分六个部分，即：一、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二、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它的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地位；三、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四、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五、中国革命和世界革

命的问题；六、今后怎么办的问題。

林彪以一副精通中外文化历史的口吻说：“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在我们党的实践上，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到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胜利，就可以避免失败，而违反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要吃亏，就要失败。据我看，世界文化大革命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公元前五世纪、四世纪，奴隶制度处于繁盛时代出现了德漠克利德、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系列人物，影响了二千多年的历史。但同我们这次比较起来，微不足道。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出现了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产生了资本主义繁荣，也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时的基本思想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提倡自由，反对宗教僧侣，传到……”

江青当时和张春桥、姚文元坐在一排，她当场就小声地发起议论：“是谁给林副主席准备的稿子？糟糕透了，简直是把教科书而且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搬来了。总结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很混乱，根本是在胡说八道！”

张春桥的眼珠子朝两旁转了转，发现黄永胜、吴法宪正朝这边瞟，惨白的脸沉着，没敢吱声。而姚文元也只是点点头，没有公开表态。江青根本不在乎什么黄永胜、吴法宪，抖着自己的身分朝他们俩啾啾嘴：“回去告诉林副主席，他的好多话都不妥当，欠科学，不好，很不好呵！”

林彪正讲到兴头上，根本没注意到江青的表现，反而继续说：“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这次是人类思想的真正大革命。恩格斯死于一八九九年，列宁生于一八七〇年，列宁生后二十八年恩格斯还没死，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所以第三次文化大革命也是有缺点的。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它们都不可能

同我们这一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相比拟……”

林彪作完报告后，特意徵求江青的意见：“你对文艺是内行，你看我讲得怎么样？”

江青也很不客气：“实不相瞒，讲得不怎么样。对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学说理解得很不系统，也没抓住实质。这次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和古希腊罗马、资产阶级意大利文化相比拟？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明白吗？”

林彪脸色通红：“我不明白，我不如你懂！”

江青听出了讽刺意味：“谁也不能啥事都明白，不懂可以请教嘛。”

这时叶群赶来，见林彪和江青当众发生争执，急忙打圆场：“一〇一啊，江青同志不仅在文艺上非常内行，而且在政治上也很精通，你不是常和我们说要努力向江青同志学习吗？怎么这时反而糊涂了？”她又转过脸来，堆满笑容地说，“江青同志别介意，林总对你打心眼里是佩服的，不过他的自尊心很强，在这种场合下不大容易接受。”

“是他来请教于我的嘛。”江青倒显得非常镇静，“我们讨论的是理论问题，在理论问题上可以争吵嘛，争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互相探索，互相提高嘛。”

这下，林彪反而显得小家子气了，他转而呵呵乐了，连声笑着说：“江青同志的确有股火辣辣的革命气，对谁也是畅所欲言，直来直去，就连在主席面前也不例外，好，我接受江青同志的意见，好好听听你的见解。”

当然，林彪只是说说而已，他并没有坐下来听江青给他讲课，稍在休息室小坐片刻，便让内勤替他穿上绿呢军大衣，出门上车走了。

软绵绵的钉子使江青更加清醒了，一旦这位副统帅羽毛丰满，同样也是要独往独来的。他并不是温顺听话的老牛或绵羊，

而是一只闭着眼睛卧在草丛里的虎。凡事都有个辩证法，人也要一物降一物，事事不服输，行吗？当初为了对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那些人，我们必须联合，结成统一战线，现在胜利了究竟听谁的，没个较量能行吗？按理说毛泽东是大家公认的导师，但执行起他的指示来却大有真假之分。老虎也会眯眼睡觉，狮子也有打盹的时候呢！毛泽东毕竟年事在逐年增高，身后之事不及早理顺，将来必定会发生大乱！

江青好不容易翻了身，这回岂能甘居人下！面对林彪那股蔑视的目光，她不会沉默隐忍，她必须回答对方那似退实进的咄咄逼人的挑战。毕竟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她决定不能暴躁、武断、鲁莽，甚至也不能用过火的言语去简单地伤害他的自尊心。她要从理论的高度纠正他的错误，如果他不接受或者反过来嫉恨自己，对不起，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她原计划给林彪写封信，像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初的那封信一样，继而一想觉得不妥，考虑再三，有了好主意。经过一番准备后，她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找来，对他们谈话说：“毛主席对理论上的是非从来抓得很紧。林副主席打仗可以，但理论上不行，他的一些提法使我很不安，讲不通哟。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啦，‘这次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啦，甚至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只当作是文化上繁荣不繁荣的革新，这就大错而特错了！我看呀，你们也应该多读书、多看报，适当的时候也要向他提提意见啊！”

黄永胜既不敢得罪江青，更不敢也不能去碰林彪。只得捺着性子说：“江青同志，你主动亮明了你的态度，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的确很好。我认识到理论对我们党、我们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意义，一定好好学习，把理论上的是非弄个水清鱼白……”

话是这么说，可黄永胜、吴法宪回来就秘密去见林彪，把江

青的谈话滴水不漏地翻腾给林彪和叶群。

叶群虎着脸，狭长的眼睛睁圆了：“即使我们的这些军事将帅读书能力有限，但对党是忠诚的、党性还是强的，总比那些当过叛徒或是叛徒的孝子贤孙强得多！”

林彪早就想发泄一下自己胸中的嫉恨了，他把桌子一拍，浓眉一拧道：“一个臭戏子有什么了不起！没声没色二、三十年，若不是靠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风，她能上来？主席批她不知天高地厚，别看大家现在不显山不露水地应承她，将来整治她的，说不定就是这些不露相的真人！”

虽然江青听不到这些话，但她能感觉到，能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脸色和动静中知道他们暗中的底细。我的林副主席，你要是还有心和我过不去，那，我们就走着瞧！这以后，她几次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直抒她的看法，毛泽东用心听着，一声不发。但他那拧紧的眉毛，微微发红的脸色，都说明了他内心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在思索，在分析着今后党和国家的政治局势。她熟悉这位男子汉的性格，话不可说得太多，点到为止。吱吱喳喳地在他面前哭天抹泪，只会使他懊恼和反感。

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像一把利刃刺进了自己的心，又像一团火在胸中燃烧起来。江青听着听着，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窒息，她的脸色，顿时异异地苍白了。

会上，林彪说：“九大的政治报告，我建议由毛主席来作，我水平不高，理论修养不足，难以胜任。江青同志对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很有意见，我至今还有些莫名其妙。”

最迟钝的人也听得出这是一种多么委婉的进攻，一种赤裸裸的挑战！

在两条柳叶眉下，江青那双杏眼闪烁了：“林副主席，这话从何谈起？难道……”

“今天不议这么多是是非非，你们不要再在一些小事情上纠

缠不休了。”毛泽东打断她的话，“党的九大主要是讲团结，政治报告我不能作，还是林彪同志作。我提议，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江青不要横加干涉！”

她断断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说出这样的话！

她还想争辩什么，毛泽东又开口了：“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全部建立，干部没完全解放出来，党的各级组织刚恢复，工作千头万绪，许多问题都没解决，急需要全党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工作，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即使在座的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距离，也在所难免，即使发生了偏差也没什么，还有大家嘛，还有党中央么！”

这下，林彪、陈伯达都咧开嘴笑了，江青一见他们那副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在那样的气氛下，她忍住了。

## 两股势力磨拳擦掌 为夺实权明争暗斗

世上有多少副面孔，就会有多少条生活的道路。陈伯达早就看出林彪将是那个女人的克星，今天看来果然不错。就像某些人命里注定要有一个归宿一样，他找到了最终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这就是跟定这位红得发紫的副统帅，风里浪里不动摇。

“这回我可是看出来，毛主席的确英明伟大，他最终是要接班人，是要自己的副统帅的，老婆和这相比，是次要的。”

“你看准了？”林彪在陈伯达跟前从来表现得很恭敬，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主席的心思可是不好猜哟，有时候似乎我们紧跟对了，可到后来才证实他根本想得和我们不一样。他就像一个严厉的考官，从来都是根据我们的答卷给你判分的。”

“现在起码阵线是分明了。”陈伯达说，“主席让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为你起草政治报告，充分表明了他对你的信任。江青对此意见可大呢，我从她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

林彪说：“政治报告交给你们三人，实际上是交给你的，由你挂帅我最放心。张春桥、姚文元算什么东西！你看他俩讲话文绉绉酸溜溜的，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哼哼，半天也说不出自己

个青红皂白来。只要把九大开完了，形势一定会更加好转，以后有你用武的时候呢。你大胆干吧！”

陈伯达要的就是这句话。近三年来，他自己觉得在中央文革小组内已经受够了窝囊气，听江青的就要得罪相当一批将帅和老干部，不听她的马上就会掀起疾风暴雨。他受到内外夹攻，处于步步设防的地步，回来还得受老婆的数叨。刘淑晏整天在他耳边罗嗦：“你别以为爬上政治局常委当上个文革小组长就不得了，整天往人家有夫之妇的窝里钻，告诉你，你弄不好会倒大霉，说不定第六回合的斗争就轮到你头上了！”

眼冒金星，陈伯达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像面前张开一个黑洞窿，要把他吞下去似的，他的火气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把我打倒对你有什么好？我是黑帮，你就成了黑帮的老婆，连儿子、孙子也得跟上受牵连，你咒我等于咒你老祖宗！”

“亏得你还是个理论家哩，你连个是非好歹都分不清还当什么理论家？你先管管自己吧，还管别人呢，我看哪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比你强！”

陈伯达恼羞交加，拍案而起：“刘淑晏，你太猖狂了，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生活，我要和你离婚！”

“离就离！貌合神离总凑合也不是长远之策。你已经离过两次婚，对此早就无所谓了。我看此风传出去，究竟对谁不利！”

陈伯达一下怔在那里，头脑冷静下来了。的确，这样吵下去除了有损自己的形象外，不会再带来任何益处。他二话不说，转身就去找周恩来，向他诉说自己的苦衷。周恩来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亲自找刘淑晏做工作，劝她到济南部队疗养所去休息。事已到此，刘淑晏也只得同意此决定。一个深秋的傍晚，她坐飞机离开了北京。送她到机场时，陈伯达只说了一句话：“好好疗养，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刘淑晏的眼圈红了：“你呀，总有后悔的一天，你听着，记

在心里吧！”

陈伯达简直想不起最后是怎样把这个女咒鬼送走的，只记得她走后，自己从头到脚棉花一样软，简直连迈步的力气也没有了。再接着，他把这一切都发泄到另一个女人身上，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她给造成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她就是江青。

林彪对此胸中有数，他不愿捅开这层纸，只是叹了口气问：“最近她没再找你的麻烦吧？”

“唉，她那个人喜怒无常，说笑便笑，说吵便吵，谁能吃透她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你是理论家，你说孔夫子的‘中庸’学说到底怎样？”

“不偏不倚，至死不变，这在哲学上所谓的‘中庸’是孔夫子的精髓所在。我早就主张，在为自己一定的历史立场而奋斗的德行上，在一定条件下，就表现为‘强矫’的精神，而这精神本来正是我们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亦可为成仁矣。’‘刚毅木讷近仁’。这些都正是表现了我们的民族这种强矫的伟大德性。”

林彪似乎感到了极大的兴趣，很虔诚地说：“九大以后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们能不能用‘克己复礼’这四个字，表示今后走向正规的内容呢？”

“噢？”陈伯达顿时停住了，像是思考又像打量一个新奇的人物似的盯着林彪，恍然大悟地说：“可以，完全可以！想不到林副主席对中国先哲的思想理解得这么深刻，运用得也非常贴切，天才，林副主席是天才！”

林彪笑笑：“就这人家还说我不懂理论呢，教训我要向他们学习。”

“哼，完全是小人！”陈伯达认真地叹了口气，“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我早就对她不客气了。现在我是惹不起躲得

起，离开了钓鱼台我倒觉得轻松多了，在人家的眼皮底下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弄得你浑身不自在。这一回起草政治报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搞，不用张、姚二人参与，等我的初稿出来后，你组织讨论一次通过就行了。让张姚参与，实际上是让他们继续捞资本，其实他们的政治资本已经捞得够多的了。”

“完全正确！”林彪噌地站起来，在地毯上绕了一个圈子对他说：“让他们修改党章已经把他们抬得够高了，主席批转了他们的报告，又让他们组织全党讨论，真是出尽了风头。如果他俩再参与政治报告，等于九大的一切工作都是他们干的。哦，现在许多人都被他们搞得头昏眼花，以为他们要主沉浮呢。”

“好，有林副主席撑腰，我就下决心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报告。”

“我可以主持开一个会，把你们三人都叫来，明确让你干。”林彪说，“实际上让他俩靠边站，这是对你的一种支持。你马上行动，准备放一颗政治卫星！”

陈伯达从林彪住处回来后兴致很高，连忙分头给张春桥、姚文元挂电话。

“喂，文元同志吗？你好呀，我是陈伯达。”他操着那种标准的福建话说，“是呵，毛主席把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让你和春桥同志参加，对了，我们先不忙着起草，那容易，关键是先明确报告的主题及大的方向。又乱打比方了，这就好比盖楼房先要规定个样式，看哪个图纸设计的好。我和林副主席讨论了几个小时，对，林总的能力和见解是很强的，起码比我们一些人的见识要强多了。他要自己动手完全能胜任，我们给当助手只是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嘛。”他罗嗦归罗嗦，话语里的含义那是非常清楚的，足以使姚文元感到震惊而怯步。“我们要听主席、林总的。林副主席让我转告你和春桥，星期三下午到他家里去研究起草政治报告的事。那当然，春桥那里我给他布置。”

陈伯达说过，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既要会当主人又要会当奴才。和毛泽东、刘少奇在一起时，他甘愿当奴才，刘少奇也使唤他，命令他，让他干这干那。当他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深刻的分歧而且不可能再调和时，他彻底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在刘少奇面前抖起架子，盛气逐渐足起来。但他倒不曾用粗野的言语辱骂过刘少奇，特别是只有他一个人和原国家主席在一起时，那口气是商量式的，完全平等的。当惯奴才的人一见主人，哪怕主人已经失势也具有一定的慑服力，就像虎死威风在一样。

但在张春桥面前，他是必须要抖起架子的，口气也显得拖音十足，目的是要让他在自己面前放老实点的意味。特别是摸到林彪对张大为反感的实底后，这种气味更加浓烈。

“给我叫张春桥！”陈伯达拨通号码后直呼大名，刚听到对方有了声音他就拉长音调了，“我要的材料怎么不见上海送来呀？上海是不是有点目无中央的意思哇？我收到不少上海群众反映你们材料，总要正确对待群众嘛。我刚和林副主席研究了一些事，重点讨论了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林总让我多考虑这个问题，你和文元只给我提供点素材就行了。你和文元星期三下午到林副主席这里来，有重要事情讨论，不要再告诉其他人，不要让其他人干扰这件事。”

“老夫子你搞什么鬼名堂？”

一听这熟悉的声音，陈伯达吓了一跳，连嗓音都变了。

他怎么也想像不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会遇到她！

好像这一生注定了他是要做她的奴才似的，和她在钓鱼台的时候，说是中央文革成员们平起平坐，但他实际上是奴才；她操纵他，命令他，叫他往东他不敢向西；她又粗暴又厉害，平时间常用带侮辱性的话语噎得他无话可回；是人总有三分气，有时他也发火，但他不敢反抗，到头来他还得向她作检查。

“哦，是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在那里，误会了，我是通知

春桥同志到林彪同志那里去一趟，研究九大政治报告的事……”

“你怎么这么没有自知之明？你能写了政治报告吗？这几年你写的那些东西我都看了，全是些老掉牙的陈芝麻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艺儿，我看你还是早点让别人干吧！”

陈伯达目瞪口呆，一脸痛苦而激愤的神色。过了半晌，他才反应过来：“是毛主席、林副主席让我负责的，这是党的决定！”

电话里传来江青的冷笑声：“那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啦？不过我要提醒你，别抓住鸡毛当令箭，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江青同志，你的话我不懂。”

“你的话我也不懂。我的理论家，你脑袋瓜子里到底装得多少辩证法呀？事情都像你所想的一加一等于二岂不太简单了吗？”

说完，电话“砰”地放下了。

张春桥很明白自己的地位。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现在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毛泽东都把姚文元和他放在了打头炮的先锋地位，足以说明毛泽东对他俩的器重。而他俩，偏偏引起过许多中央文革秀才们的嫉妒，嫉妒最大的是号称党内头号理论家的陈伯达。在他看来，陈伯达大有白衣秀士王伦的架式，一举一动都显得胆量小、私心重，动不动就闹情绪。更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陈伯达与他原来想像的大不一样，越来越懒散，连一些重要的文章都请人代笔了。作为笔杆子出身的人，这种状况是非常危险的，等于文笔生涯的结束或曰死亡。而陈伯达的的确确已沉湎于当官的仕途生活，甚至越来越走向堕落了。

江青对陈伯达也越来越反感，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

陈伯达的嫉妒倒不足太惧，最可怕的是出自另一个人的怀疑和蔑视，他太敏感了，每次和他相遇，那人的眼睛里都对他射出一种戒备和防范的目光。毛泽东越是对他表现出好感，那人越是

脸拉得长，眼睛里的凶焰也变得尤其可怕。

那人，就是当今的副统帅林彪。

他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他和姚文元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破例地亲自到机场迎接他。

一见面就问：“上海炮轰你的大会还开不开？”张春桥说：“通过做工作，不开了。”毛泽东果断地说：“再开就抓人！”

当他把这些情况向林彪汇报时，特意把他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交给林彪审阅是否发表，林彪看也没看便把照片扔到一边，询问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便站起来走了。

张春桥是聪明人，他立即悟到了是什么原因，从此在北京的一言一行格外谨慎，甚至在公开场合连话都不讲，只是暗中加强了他和毛泽东、江青的联系。

那天晚上，他一直闷坐在桌前思考。第二天早晨，姚文元起床一看，发觉张春桥伏案而眠，眼镜都被胳膊肘碾烂了。桌子上堆满了各种书籍，一叠稿纸上写满了龙飞凤舞的大字，中间一行字写得特别大：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豁出去了！

“春桥，你太过虑了，毛主席对你那么信任，难道还有后顾之忧？”

“你太乐观了！”张春桥抬起头来，鼓着那双发红的眼睛说，“我们要是也和谭启龙、韦国清一样倒好了，倒关在保险柜里了，越受主席的表扬，有些人越眼红，像要把你一口吞下去！”

“你指的是谁？”

“毛主席下面的那个人！”

姚文元吓了一跳：“我怎么没发觉？”

张春桥苦笑着说：“你太麻木了，一点都看不到潜在的危險。这下我才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看来，

的确不依我们自己的意志而取舍呀！”

一九六八年三月底，上海再一次爆发了炮打张春桥的高潮，毛泽东闻讯后对江青和谢富治说：“我看这里面有人搞小动作，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掀不起来，可能是军内有人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你们把张春桥调上来，到中央工作。”

由于毛泽东、江青的坚决保护，林彪不得不暂时收敛，但他在公开场合下含沙射影地说：“关于张春桥，我不了解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无所谓支持不支持的。”

张春桥来到北京后，江青有一次对他交了底：“有人对你不放心，害怕有一天你会超过他。你放心吧，主席心中有数，我心中也有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让全党感觉到主席信任你就行了。”

从此，张春桥对林彪更是敬而远之，从来不去主动找他。

去年年初，上海徵询广大群众和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时，一些人强烈要求在总纲部分加上这么一段话：“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姚文元对张春桥说：“写上这条不合适吧，在党的章程中还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张春桥抽着烟卷想了想，摇摇头说：“这个人本来对上海就存有戒心，群众一致要求写上，我们把它去掉不合适，弄得不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何况这也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

我看，还是矛盾上交吧。”

于是，张春桥将修改后的党章草案提交到中央。为此，林彪只是略微含笑而已，他知道这并不是张春桥的功劳。

现在，毛泽东再次点将，让他和姚文元参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他预料肯定会掀起新的风波。不过，毕竟是在政界的圈子里

混了多年，他懂得一个最拿手的策略：不露声色，以退为进。他准备在条件和时间最成熟的时候，再露他一手！

所以，当他接到陈伯达让他到毛家湾讨论起草政治报告的电话后，眼睛转向江青，问：“怎么办？”

江青在他面前照例是至高无上的指挥官，她背着手，鼓着腮帮子踱了几步，大凡政治家都喜欢边走步边思考，江青运用得非常精熟，而且每每恰到好处。

“看来副统帅是想把起草大权抓在他手里，好，你们去吧。”江青故意淡淡地说，然后认真了，“不过你要记住，在他们面前多听少说话，让他们的意见充分表达，然后我们再研究。”

正说着，姚文元也来了。

正是三、四十岁的黄金岁月，姚文元的文章出手快、调子高，而且每每都受到最高领袖的直接指点，加上张春桥为他润色加工，所以他的名声大振，无人不晓。他的父母亲，躲过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批斗的厄运，一直为这个儿子而自豪。虽然他那过早发福的身体显得有些笨拙，但脑瓜子灵活得滴溜溜转，对毛泽东的指示具有举一反三的发挥能力，所以毛泽东几次对人说：“把姚文元培养成无产阶级的权威，成为我们的红秀才。”因此以他的名义连续发表文章，知名度越来越高。不过，这个人不喜欢在众人面前出头露面，不善辞令，不爱过多的交际，该享受时他躲开了，每天只是发奋用功他读书写文章，更使得毛泽东和江青尤其对他重视。

变得文质彬彬的姚文元，和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张春桥相比，前者善文，后者更重于思索。他们的秉性脾气有惊人的相同处。不但如此，对社会、人生和党内各种问题的分析，也大致相同，简直像对一胖一瘦的异母兄弟。正因如此，有人说他俩的文章是：“江青的胆子，张春桥的脑子，姚文元的笔杆子。”

知己面前，江青的话最多：“你们看出来没有，许多人都

想在党的九大上捞一把，看吧，热闹戏还在后头呢。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能在原则上让步。”

张春桥最善于在斗争中表现他的才干和勇气，他说：“请江青同志放心，保证你指到哪里，我们跟到那里，打到哪里。”

“对！不管任何时候我们也要和江青同志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姚文元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失败，也要在一起。”

江青故意含糊地说：“我这个人呀，早就叫人恨得咬牙了，我成了人家的绊脚石，对人家的报告提点意见就恨不得把我置于死地，许多时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不像我们，毕竟在一个战壕里几年了。”

张春桥、姚文元没有答话，可江青看得出来，他俩完全知道她指的是谁，而且早知道了。“你们知道九大政治报告要写什么吗？”

张春桥笑笑：“文元同志回答吧！”

姚文元眨巴眨巴眼睛，略带结巴地说：“我认为毛主席既然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九大政治报告就必须从理论上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和解释，这关系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形成、发展和运用的问题。”

“太好了！”江青情不自禁地鼓了掌，“这可是历次政治报告都没有的东西，应该成为我们的特色。”

张春桥接着说：“报告还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肯定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这关系到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认识问题，是进一步肃清刘少奇余毒和那几个极右人物的影响问题。”

“对！”江青就像裁判一样，对他们的见解不断地大加评论。“九大政治报告要从理论上总结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要从政策上阐述主席的思想，落脚点要回到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新的更大胜利这一点上来。”

“还要分析一下国际形势，使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更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姚文元说。

“向全党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坚持继续革命的思想，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句句都说在了江青的心上。你看，这几个人搭成班子多么得意啊，即使他们一逢不如意时，只要想想背后还有那么一棵参天大树，满天乌云也会转出半个大晴天来！

## 江青重温鲁迅旧作 领袖暗示夫妻情在

李富春自从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受到围攻和批判后，很少出门，政治局常委几次开会他也没有去。

谁料得到那些平素很不错的同志在会上哪来的深仇大恨呀，直楞楞地就向他们扑来了！就连德高望重、走路已经颤巍巍的朱德也不放过，也逼着他“斗私批修”。开小组会讨论时，谢富治指着朱德的鼻子说：“你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你难道不需要检查检查吗？”吴法宪也指着他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

哎哟哟，那都是些什么话呀，指桑骂槐人身攻击的言语一大堆，听几句都嫌毒气冲天令人肉麻哪！他稳坐一旁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那帮楞头货吆风喝雨地把这几名老将老师骂完了，下来又忙着和他们的伙伴们研究如何争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更大的官去了。

他怎么也想像不到，他们私下的一些议论怎么就像长了腿似

的，能够跑到林彪、江青那些人的耳朵里去。

那是去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会开幕会上作了讲话后，李先念和李富春在出门准备上车的路上，李富春叹了口气：“唉！邓小平又升级了，拿起羽毛扇子了，主席说他是刘少奇的军师，错误比以前定得更严重了。我们是不是也检讨一下？”然后，他们两人商定了检查的口径。

第二天轮到他坐稳了沙发斗私批修了，还没开口，谢富治站起来揭发了，一揭惊得他也几乎叫出声。我的天，原来揭的都是他和李先念在车上的全部谈话哇！哎哟哟，打那儿弄来的这些东西啊！亏得他们那天并没有说什么太过格过线的话，如若不然，岂不是大祸临头了吗？想到这，李富春都感到心惊肉跳了。

一下子，他一连病了好多天，这回可是真的病了！

这天刚起床看了一会儿书，值班的秘书就告诉他陈毅来看他了。没来得及整理一下，就听见了元帅那“咚咚”的脚步声。迎出门去，陈毅那长方型的大脸盘亮印堂出现了。他脸色红润，身体极好，尽管肚子里塞满了千般忧愁，万条仇恨，表面上还是满不在乎的神色。当摄影机对准他时，他头扬得老高，使他陈老总的形象添光生色，平常说话就声音琅琅，每次开会一进门，总是先用那么一种傲然自得的目光扫视全场。

他的这一切，恼得中央文革的要员在他背后直骂娘：“一个老右，常败将军，除了写点歪诗，屁本事也没有！”

陈毅骂得更绝：“老子打败仗也是打过，你们这些浑小子当年连烧火棍还没摸过去呢，哪配讲什么打仗！”

本来他们有约定，今后没事尽量少在一起说话，以免被人抓住辫子。那次开会时，他拼命叮咛自己谁也不搭理，想着想着，却管不住双脚，不自觉地来到了李富春面前。这回，陈毅听说李富春生了病，顾不得别人说三道四，坐上车又来了。

“怎么样？九大开过以后，这场马拉松的运动该结束了吧？”

陈毅走到他身旁，握手寒暄几句，坐到客厅的沙发里，开口就在关注的热点上。

“按理来说也该了。不过，你难道没听说么？江青和那个老夫子竟闹得不可开交了。”

陈毅笑了笑，没有开口。

“说话呀！”

陈毅不紧不慢：“不一定用语言表达嘛。”

李富春也幽默地说：“你打算怎么办？”

“还没考虑成熟。”

“听说江青和林彪也斗得非常微妙。你说我们是该静观待变，还是见着老虎烧香，见着兔子就开枪？”

“谁是老虎、谁是兔子？”

李富春那瘦骨嶙峋的身子转了个圈，打着哈哈说：“你是想跟我来个‘弯弯绕’是不？你放心吧，我这屋子里没有窃听器，他们谁也抓住你的把柄儿。”

陈毅叹了口气，他是一个不怕压不怕逼的硬汉子，战场上嚼钢咽铁比谁不强？可在这三年文化大革命里就像害了一场病，浑身抖不起精神，连饭都不想吃，若不是自己的乐观主义支持着，说不定早去见马克思了。想到这，他撇了撇嘴：“管他们是人咬狗还是狗咬人，谁胜了也没咱们的好，还不是照样当咱的右派代表吗？咱只能代表右派喽。”

一听这话，李富春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还是在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委员们讨论召开九大的代表选举办法时，陈毅苦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根据这个标准，我是不够格了。”

毛泽东说：“你够格，当个右派代表完全够格，到时候我投你一票！”

果然，到了十月十一日全会闭幕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发表讲

话，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的讨论、检讨，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覆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他转身对陈毅说，“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分，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少奇还有点区别，是不是？”

陈毅想起这些，忍不住浑身又颤栗了一下，他问李富春：“你的九大代表资格填写了吗？”

“填了。”李富春有气无力地说。

陈毅说：“昨天，上海市革委会给我发来封公函，里面有封信，上面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全体共产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急速退回。’你看张春桥这家伙欺负人到了什么地步！我的秘书小杜气得两眼冒火，让我给他们退回去，不理睬他们。我反覆想了许久，觉得我们在这种时刻还是委屈求全，忍辱负重吧。”

李富春沉闷地点点头：“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长远的革命利益，我们就忍耐着吧。”

“我有满肚子话要对毛主席倾吐，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陈毅愤愤然地说：“我给好多人都讲过。一九三二年我在担任江西军区司令时，硬被他们怀疑成改组派 AB 团，差点被抓起来枪毙掉。那时，党内有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不久，我们将抓住一个 AB 团的大头头，到那时，我就能得到一支上好的驳壳枪。’当时武器缺乏，驳壳枪一个团也只有五、六支，要说上好的，就是指我陈毅嘛。结果历史作了最好的证明，我陈毅根本不是改组派，也不是 AB 团，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富春也忍不住笑了一下，这位豪放、直爽的陈毅原来还有这么大的感染力，本来是件非常沉闷、痛苦的事，让他说得反而开心大笑了。

“你看着吧，现在拼命整我们的这些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将来历史总会证明，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右派，反共派！”

说着说着，陈毅的高音喇叭又震荡开了。

毛泽东听完江青的汇报后，笑着把身旁的一本《鲁迅全集》递给她：“我劝你读点鲁迅的东西，这老先生若在世，我们是会谈得很好的。他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你看，对一些文人的心态，刻划得是不是入木三分啊？”

江青拿过来看了看，笑着说：“是的，我有同感。”

毛泽东忍不住打量起江青来，已将近五十多岁的人，依然乌黑发亮的头发，漂亮而又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哀伤。她在他面前只穿着那件合体的军装，领章依然鲜红，泛着亮光。只是她的脸庞明显地衰老了，眼角旁也有了皱纹。毕竟是三十年的夫妻了，他不禁又疼又怜地帮她理了一下头发，妻子的真诚的焦灼深深打动了他。他忽然想起来：“剩下来的专案都搞完了吗？”

“差不多了。每天我都要看几万字的专案材料，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觉时间。这么多问题，真正操心的人并不多。林彪同志只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实际上并不管事。这两年要是没有春桥、文元，我还不累死了。”

“春桥是个人才！我希望他多接触一些实际工作，不要像我的那几位秀才如田家英、胡乔木，包括陈伯达，都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没有实践经验。”毛泽东说，“我对中国现状的研究，还是得力于当年的调查研究。春桥听话，我让他下去就下去了，一头扎到上海几年，搞得蛮不错嘛！”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上，他的想法和你的观点完全一样，我看他主持起草会更好一些。”江青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替张春桥说好话。“现在陈伯达动不动就想压他，甚至抬出林彪同志来压他。”

“压压好！人不逼不革命，毛驴没人骑不行。”毛泽东笑着说，“我就不相信他陈伯达能把春桥压垮！林彪也不行。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闻。我也是秀才哩。别看我没有和他谈，他的情况我大体上都了解。”

“是的，主席高瞻远瞩，认人认得很准。”江青说，“但有人反对春桥同志，而且反得既恶毒又无道理。”

“林彪去年四月送给我两份春桥的材料，其中一件事是说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春桥以狄克的名义在《大晚报》上向鲁迅放了一炮，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于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

予以痛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毛泽东指着《鲁迅全集》第六卷说，“当年春桥还是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发表一篇评论根本谈不上攻击鲁迅，鲁迅写的《三月的租界》也谈不上痛斥。你可以再看一看。”

江青打开那本书颓然坐在毛泽东的对面，脸上显出焦愁问：“你怎么又想起那件事来了？”

“又有人给我送来了春桥的材料，老话重提，所以我就得重新请教老先生呵，我劝你也看一看为好！”

江青只得仔细地读起这篇因张春桥而出了名的《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九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地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地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里面有些还不

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江青看到这里，抬起头说：“充其量也不过是春桥同志对田军的作品发表几句评论，怎么谈得上是攻击鲁迅呢？倒是鲁迅爱田军过甚，说得话也太激烈了。”

毛泽东正闭着眼睛抽着烟卷想心事，他仰着脖子，将头靠在沙发的后垫上，问：“你都看完了？”

“还没看完，还有一段。”

“你读出来，我再品味品味。”

于是，江青将鲁迅文章的后半截抑扬顿挫地念出了声：

这样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

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毛泽东听到这里，高兴得双掌合一，哈哈大笑：“老先生这段文字写得妙！妙极了！到底是大文豪！遗憾的是，大文豪的矛头对准了一个小青年，倒也有点意思。读下去！读下去！”

江青继续往下读：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即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江青念完以后，合上那本《鲁迅全集》，说：“就这样一篇短短的文学评论，三十多年后竟成为一些人用来整人、将一个好人打倒的炮弹。这可能是鲁迅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毛泽东直起腰，继而站起来，将那本《鲁迅全集》放回书架上，似乎自语又似乎是在对江青说：“一切居心不良的人，将从

害人的目的开始，到害己的结果告终。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态度中感觉到什么，我看你也是表面上硬，心里软，又最重感情，说不定将来还得演一回《辕门斩子》的戏。”

江青从这句话里得到某种暗示，悬在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毛泽东又说：“江青，你要体谅我，处在我这样的地位，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真正作到亲者严，疏者宽，你应该理解我的用意。谁叫你是毛泽东的老婆来？我看这样严格对待你也有好处，可以看出你周围的人哪些是真心跟着走，哪些是假心假意，哪些只是为了利用你。还是我那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要时刻多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

这样，江青才从长沙那里得到了最大的温暖和满足。“总还是夫妻的情分亲嘛！”她的神经逐渐兴奋起来，“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住老娘，谁要敢碰我，那就试一试吧，看究竟谁能碰过谁！”

## 伯达起草九大报告 江青暗查老底生疑

林彪面色冷漠，身板挺直坐在会客厅的棉套木椅上。叶群戴顶军帽，翘着二郎腿，手端笔记本放在旁边的写字桌上，认真地作着记录，林彪的右侧，是陈伯达，透过那副圆圆的眼镜，可以隐约看到他那两颗凸出而混沌的眼睛，圆形的鼻梁上挂着几滴汗珠。他和林彪那瘦削但线条分明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看出，林彪的面孔充满着生气和毅力，有着冷硬坚实而熠熠发亮的金属感。

对面，坐着张春桥。他不卑不亢，沉着稳健，不住地微微点头，发出“哼哼”的应答声，只是从不发表什么议论。

紧挨张春桥的是姚文元，他多少显得局促不安。他一边掏出手巾擦汗，一边眨巴着眼打量着屋内的陈设。

这是一幢经过几次改造的老式结构房子，陈旧而豪华，大方而又显得九曲肠回，令人难以捉摸。它那乱七八糟但很有秩序的风格跟主人的身分极不协调，好像繁华的闹市中央摆放着一座谁也叫不上名来的建筑。

“今天召集你们几位笔杆子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政治报告的

事，主席决定让我来作这个报告，我觉得自己难以胜任，但坚决听从我们最高统帅的安排。”林彪讲得很慢，似乎在字斟句酌。要掂掂每个字的分量似的。但谁也不曾对他的发言持异议，他不时深深地吸着气，振振有词地讲起来。

“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都眼睁睁地盯着我们的九大，看我们这次大会会有哪些出台的新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对待。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还突出表现在它必然要引起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的大跃进，文化是打先锋的，同时必然带来政治、经济上的革命和变革。所以，九大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注意抓生产，抓经济工作。伯达同志提出把政治报告的题目定为‘全党团结起来，为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我非常赞赏。”

四双眼睛现在都盯在他的身上，姚文元那坐立不定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但他敏锐地觉察到，分歧就在前面，很可能会有浓烈的火药味，甚至带有一种血腥的味道。说心里话，不管对而这位副统帅和经常口称“小小老百姓”的理论家怎样看不起自己，但自己丝毫不敢有向他们宣战的想法，半点也没有。但想到今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争论，他便不得不痛苦地低下头。

林彪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并继续说：“我看报告就以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扩展开来，由你们这几位大秀才补充些材料，加上些理论色彩，然后送主席和政治局讨论。”

张春桥心里暗暗发笑，以你的讲话为纲领而扩张开来，这能叫政治报告？哄鬼去吧，连最少见识的人，听了也要掩嘴笑！空空洞洞喊了些口号，凑了几条从教科书里抄来的原理，就想以马列主义的权威自居，真不嫌丢人！要不是因为你是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那篇讲话白送给我也不要！

“林副主席讲得很好，很精辟，给我们起草政治报告指明了方向。”陈伯达打着手势，加重语气表态，“我认为林副主席在全

会上的讲话已经很好了，当然作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还要加很多的内容，但基本框框是不会改变的。”

“那好，这些内容就由你来加喽！”林彪笑着打趣，“谁不知道你是天才理论家呢，我只承认一个笔杆子，那就是你。其余的都不行，什么胡乔木、田家英统统不行！”

汗水唰唰地从姚文元苍白了的脸颊淌下来，这话说得再露骨也没有了，这意味着政治报告的完成全由陈伯达来搞，他俩也和其他人一样，只有讨论提意见的份了。他不住地摸了摸沉甸甸的公文包，灰溜溜地低下头。

张春桥坐在那里也不好受，他的脸不住地痉挛着，手指也哆嗦开了，但他毕竟能沉住气，硬着头皮听他俩互相吹捧。他发了狠：看谁能拿出好的初稿来。人要脸树要皮，就是这次报告写好不用，将来也要以自己的文章发出去！

陈伯达觉得林彪当着这两人的面连续称赞自己，多够义气哇！自己在钓鱼台蹲了三年多，没受到江青的嘉奖，在这里却被当作座上宾，多年的窝囊气今天痛快地吐了几口。根据他的政治经验，新生力量将是不可阻挡的。林彪的势力正是这样一种蓬勃直上的新生力量，依附他们，他的胆气壮多了，足以使他敢与一切阻挠他的人们“周旋周旋”了！

林彪说了半天，最后作了结论：“我看这样吧，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就由陈伯达同志先动吧，等他先拿出初稿来再说。”

最初的一刹那，张春桥好像呆了一下。是的，是呆了一下吧？他没想到毛泽东交给他们三个人的事轻而易举地由副统帅改变成一个人，他本想听到“你们三个人讨论一下”这样的话，但是，没有了，他期待的一个字、半个字也没有。这几天漂浮在眼前的锦绣宏图，虽然也是五彩缤纷的，是光明的，但不是现实，不是可以摸着抓住的东西，而是海市蜃楼！

他的腿软了一下，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拼着最后那点气力挺住了。僵硬的脸上强挤出笑容，似乎无所谓地打了个手势，轻松地对林彪和陈伯达说：“那好，伯达同志是大手笔，就由他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我们保证召之即来！”

那种表情自然极了，丝毫没露出不满情绪来。连老奸巨滑的林彪都惊奇了，不由得自己问自己：怎么啦，莫非是我的招数不灵？

江青从毛泽东处回来后，又得意了。

她把康生、谢富治，还有两位大秀才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如此这般地传达了一番。这件事，对于她，犹如吃饭穿衣似的习惯成了自然，当然其他人只是连连点头，顺着她所传达的指示思路往下套，然后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江青突然从沙发里一跃而起：“这个陈伯达越来越不像话了，自己搬出钓鱼台后连面也不见，研究什么事情他也不来，是想搞分裂还是怎么的！毛主席明明把起草九大报告的任务交给他们三人，凭什么他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背着我们搞起来了？你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我说他想搞分裂没冤枉他吧？”

此时的康生，已经完全听命于江青了。他已看出这个女人始终想把自己扮作毛泽东的化身，而且她的心思远远不在政治局常委的目标上。他唯一猜不透不敢打保票的是毛泽东是不是就想把重权往她身上转移，这个问号盘旋很久了，他始终下不了定论。但有一条他看准了，那就是江青出手打牌，肯定体现着毛泽东的意图。原先他还敢顶撞这个女人几下，自从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突然遭逮捕等一连串事件后，他对她彻底服了。就像押骰子儿赌博，这小小的骨骰子儿，真像涂上了魔粉魔药，明明你想的是红的，看的也是红的，亮出来的偏偏是黑的。政治骨牌，他长年累月捧着它，日日夜夜想着它，

为它费尽了心机，但他觉得自己远远比不上她。不管那小小的政治骰子多么变化无穷，赢的总是她！

人只要失去了尊严，也就失去了一切。

康生说：“江青同志有预感，我也有感觉。伯达同志受了江青同志几次批评后，不是想法改正，而是产生了不满情绪，把江青同志的一番好意当作恶意，当作驴肝肺，这将是很危险的。我很为他担心，他会走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去呢？所以，我劝同志们多批评他，多警告他，不要让他走得太远。”

谢富治连连点头：“是的，他那种动不动就撂挑子、怠工的态度尤其恶劣。他患得患失，在路线斗争中总是摇摆不定，甚至又想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制造事端，或者说是想投机。”

“过去他总是在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窜来窜去，现在又换对象了。”江青拖着腔调说。

“这个人总是这样，没人狠狠推他，他就不肯向前走，总是要有人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才行。”康生说，“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江青同志的帮助，说不定早就堕入修正主义的边缘去了，唉，我们这些人，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晚节，像文元、春桥同志，还有个早节问题，唉，不容易哪！”

康生的主意多，词儿也真多，这几年不但思想在每日更新，神态动作也变了样，连说话也是“江青”长、“江青”短的不离口了。

当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陈伯达时，张春桥、姚文元却一言不发。他俩默默地在想心事。看来，钓鱼台和毛家湾之间将会爆发一场很难预料的硬仗，这可怕的“弹雨”，使他们无法躲、无法藏，即使失败了，他们抱头鼠窜，跪地告饶，也无法躲过那场劫难。哦，政治斗争果然残酷，果然无情啊！

忽然，张春桥发现谢富治不住地在看表，在拍打他那个黑色的皮包。他立刻意识到谢富治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汇报。

他知道这位公安部长近来一直在从事着秘密的侦察活动，在公安部那幢外表看来并不起眼的建筑里，他掌握着一个绝密的审干小组，除了毛泽东外，只有江青、康生可以向他发号施令，安排这些秘密特工人员进行某些调查活动。当然，偶尔地，他也会组织公安人员逮捕一些危及这几个主要人员政治名誉和权力上升的危险分子，因为这样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使他们得以更顺利地实行他们的计划。

张春桥、姚文元知趣地告辞了。无论从资格和管辖范围，都还没使他们到了倾听最高机密的地步。

“富治同志，有重要情况报告吗？”

“是的，江青同志。”

“康老在座没关系，他可以帮我分析、参谋一些问题。”江青说，“哪一方面的情况？”

“有关伯达历史问题的情况。”

“噢？”康生立刻放下手中的报纸，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江青也支楞起耳朵。过去关于陈伯达的传闻听到一些，但她不熟悉，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进过耳朵孔，不过有一点她是知道的：这个人历史比较复杂，神出鬼没，很不安分，哪一边都想插一脚，属于多重性格的人物。

“我最近收到几份材料，是从福建省来的。”谢富治很谨慎地说，“材料揭发陈伯达于一九二五年由黄振家介绍，参加了国民党，而且积极反共，思想十分反动，还策划和组织过许多人围攻我党干部……”

按理说，江青对陈伯达的历史是比较清楚的，但此刻却不再表示什么，她静静地听着谢富治的汇报，盘鼻着下一步如何对付这个她当年的战友。

陈伯达生于一九〇四年十月，父亲是个落魄的穷秀才，但祖上曾经很有权势，他本人也曾自我吹嘘他是“四代的书香门第”，

其实也并不过分。他的曾祖父陈金城，是清朝比较有名的孝廉，他的重要著作《怡怡堂文集》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痕迹。鸦片战争时期，直隶总督琦善诬陷林则徐，力主求和时，陈金城曾和陈庆镛一起上书，弹劾琦善。这是陈伯达几十年来讲了又讲的故事，也算他的家族里最为光辉的一页了吧。

但陈伯达的父亲陈其潜，连个举人也未中，只当过十几年私塾先生。陈伯达的本名叫陈声训，后来上私塾，按照族谱他属“建”字辈，先生给他改名为陈建相，字尚友。以后他写文章，就署陈尚友或尚友。到一九三四年以后，他才改名为陈伯达。

陈伯达从小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八岁那年父亲去世后到了福建省惠安县的梅山小学去上学。十五岁那年，他去考中学，又报考泉州师范，因数学不及格而名落孙山。后来他又去投考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终因“国文尚可”而勉强入学。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十七岁的陈伯达毕业后重回故乡惠安，当了小学教员。

一九二二年四月出版的第九卷第四期《学生》杂志上，他发表了《兵？匪？》一文，当时十八岁的陈伯达从此便与文坛结下了深缘。紧接着，他在厦门频繁与知识界的人士交往，不断投稿写文章，又创办了《厦门通俗教育半月刊》，在国共两党之间游来摆去，经常观风辨向，进行比较选择。一九二三年，他从厦门到了上海，他便正式卷入了政治风浪的漩涡之中。

一九二五年春，陈伯达在厦门，经黄振家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很快，他又同黄振家、梁龙光等人组织了右翼团体“孙文主义学会”。陈伯达亲笔起草宣言，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击左派学生，成为著名的右倾分子之一。第二年，陈伯达担任了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的职务，连续发表《当前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等文章，鼓吹一种右翼观点。但是，当大革命的浪潮滚滚而来时，他茫然了，低沉了，对人生感

到无聊失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沧海流水何时竭，  
人生悲哀何时灭？  
回答这一短问，  
且等着地球飞裂。

这，正是他当时的“极感卷怠”心态的真实写照。

当大革命高潮来到时，陈伯达投靠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先当他的秘书，后来又当何应钦兼任校长的国民党军事干部学校的政治教官，授少校军衔，月薪白洋一百六十元。

随着北伐军的捷报频传，共产党的影响和势力日益发展高涨之际，陈伯达又与共产党人开始密切交往，当他被国民党列入“赤色分子”名单准备在大屠杀中镇压时，他得到密报逃离福州，躲避一段时间后去了上海。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陈伯达经张觉觉、陈少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武汉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到了下半年，他按组织分派，在上海登上远洋海轮，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陈伯达是个不甘寂寞而又热衷于追赶时髦的人。在苏联学习期间，他从阅读托洛茨基派别的宣传品到同情托派的活动，直至参加他们的组织。当斯大林发动大规模的清查托派斗争时，他还给托派捐款以示慰问，因而在党内受到警告处分。

一九三〇年底，二十六岁的陈伯达回到国内，先后在厦门、上海、天津党组织内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陈伯达和顺直省委的大多数干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天津英租界被捕，坐牢不到一年，他托人捎信给他当年的国民党朋友，请人把他保释出狱。

从此，他便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宣传工作，主编《华北烽火》，参与领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北平学生运动。在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他担任宣传部长，和彭真、林枫等人同在

一起工作。一九三七年，他被任命为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北平市委的工作。日军占领北平后，他从青岛改道西安，前往延安。初在陕北公学当教员，继而到康生当校长的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马列学院成立后，他又调到那里当教员，但没有受到重用。原因很清楚：他在苏联的活动已引起延安一些领导人的议论，对他怀有戒意。在一种怀才不遇的情绪下，他写了《三民主义概论》，歌颂蒋介石，抬高国民党。书成后，他托王明拿到重庆出版。

是毛泽东发现了，发现了他的才学。于是，毛泽东多次和他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使他的才华得以发挥。一九三九年他调到毛泽东身旁，担任了中央军委办公室副秘书长职务，他开始写出彪炳史册的震撼文章了。《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天下知，他成为毛泽东手下著名的笔杆子，为他号称“天才理论家”奠定了基础。

建国后，陈伯达直接在毛泽东手下替中央起草各种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主持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

江青听到这里，连连摆手：“富治同志，你不要往下说了，不要往下说了，后来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不过，我觉得，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很可疑！他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有一番精彩的表演。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主张，对陈伯达继续观察，再看看，同时，建议富治同志抽时间把这些情况向主席报告一次。”

康生补充说：“向主席报告不要提江青同志和我的名字，只以你或群众的名义报告，材料不宜多，点到即可，只提他的历史可疑就行了。”

“康老的建议很有策略性。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对陈伯达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江青这样嘱咐谢富

治。

谢富治一切都明白了。他提供的这些东西已经完全起到了预定的目的，江青的确把自己当作心腹了。这使他兴奋不已，当即表示：“不管今后有什么风浪，我谢富治，包括我的妻子刘湘屏，还有孩子们，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同志，保证你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

“不能这么说，我们都忠于毛主席。至于我，该批就批，该斗的时候嘛，还得斗呢！”

话是这么说，但谢富治看得出来，江青此刻是最高兴的时候。

## 翻旧帐早年曾反毛 受指责朱德作检讨

陈伯达躺在轿车的后座里，随手打开收音机，一位播音员正用那种特有的高亢有力的嗓音播送着《人民日报》的社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它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广大人民群众最能理解党的政策，最能执行党的政策……

面色冷漠的陈伯达锁紧眉头，关上收音机。

这时，钓鱼台的最后一缕阳光正在慢慢地消失，轿车内和外面的空气相差得可怕。车内的空调器使温度如春风扑面，和融宜人，陈伯达一下车却冻得直缩脖子。赶紧往八号楼上走。

钓鱼台里杂乱的行人极少，冷冷清清。过去这一地区是国宾馆，只有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了才在这里下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反常规，中央文革小组在这里扎下大本营。然而，这并不能给这里带来繁华，因为被称为群众的老百姓绝对进不了它的大门。

“你好久不回钓鱼台了，这次真是稀罕。”

陈伯达友好地回答：“离开这里，也是为了更好地思考一些问题，便于写作嘛。”

“找我有何事？”

“和你商量一下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事。”

“和我商量？”涩巴巴的老脸笑了笑，“毛主席把起草九大报告的任务交给你和春轿，文元来写，你不找他们商量和我商量什么？”

陈伯达被顶得张口结舌，坐在沙发上好半天说不出话。从来对他很客气，见面总要亲亲热热地打招呼的康生，今天怎么这么横，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他不知所以地苦笑说：“你在党内的资格很老，各种政治经验比我丰富，向你讨教总可以吧？”

这话说得并不错。康生不仅比陈伯达入党早、资格老，而且年龄也比他大六岁。早在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到上海大学学习时，康生也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系读书，只不过当时叫张叔平，陈伯达叫陈建相罢了。后来他们提及此事，康生连连拍着他的肩膀说：“想不到我们还是老同学，这个友谊可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今后要好好相互提携，不能断了线。”

陈伯达忘不了这一点，无论在各种场合总是开口必称“康老”。尽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名字排列在康生之前，可每次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或者中央文革出现在群众面前时，他总要居在康生之后，以示对他的尊重。过去，他总要以礼回报，今天却第一次表现得如此冷淡，岂但冷淡，简直是有点居高临下，盛气逼人了！

“伯达同志，记得在延安审干整风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你，不要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投机取巧、左右摇摆的毛病，你总也改不了。这样下去，总要吃亏的。记得你说过这么一句话：

‘一个政治家要想有作为，得具备两条，一要跟准人，二要有自己的一批人’对不对？我看你呀，一条也没做到。”

“康老，能不能把话说具体点。”

“我这千方百计就够具体的了，你还要我把那张纸捅破吗？”

陈伯达很快清醒了，清醒之后言语却含糊。他不能再往下问，只得叹了口气，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康老，我也是没办法，看来我不适应在政治高层工作，还是当老百姓好，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回去当小学教员好。”

“别胡说八道，污蔑我们的党！”康生一下子没了好声气，“你纯粹是说假话，根本不是你的心里话！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怎么样？我这样坦率地批评你，正说明我没有把你当外人，我奉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再别沿着黑路往下滑了！”

陈伯达刹那间感到一阵震惊，人怎么变得这么快？前年二月，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度想着要自杀时，康生闻讯拍着桌子对关锋和王力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批判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真不像话！”他亲自跑到陈伯达的住地安慰他：“伯达同志，你要振作起来，不要怕，该斗就和她斗，共产党又不是她一个人的，而她也代表不了毛主席嘛！”

那时他对康生是多么感激呢！现在，他咬着牙撑起来的时候，康生却缩回脖子给他变了脸儿了。

这可真像一只钓钩吞在肚子里，天下还有比这更难受的滋味吗？陈伯达愤怒而又痛苦了。

朱德叫秘书替他填好九大代表履历表后，拿在手上看了看，轻轻叹口气说：“就这样罢，为了我们这个党的团结，个人再大的委屈也应该忍耐，要顾全大局嘛。”

朱德比毛泽东大七岁，已经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了，说话经常气喘，连走路都得人扶。但在去年十月十七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的

小组会上，他刚坐到沙发上，身子还没坐稳，一个细长高嗓音便响在他的耳际：“朱老总，你在历史上犯了那么多错误，怎么也不检查检查？你还想不想当九大代表？”

朱德抬头一看，这人似在哪里见过，但叫不出名来，对了，他常在中南海和养蜂夹道的俱乐部里晃悠，是个舞迷。没听人叫过他的名字，却有外号，而且是奇特的三个字：“紫筋子”。是的，这外号只要你听过一次，或者和他跳过一次舞，就忘不了：人在激动得厉害时脸会红，而他却发紫，岂但发紫，连双手都在打颤，原先好像在哪个部当过办公室主任，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没容他细想，黄永胜也沉下脸，很严肃地说：“是啊，朱老总，你是该检查检查了，挖挖根子嘛。你这个人历史上一贯右倾，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有野心，想当领袖，你如果不检查，也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哪！”

可气呀可气，朱德浑身气得直打哆嗦，没想到当年在他面前唯唯诺诺，他说一不敢说二的这些败将油子一旦得势，竟是这样翻脸无情。娘的，现在投靠了别人，就连老祖宗都不要了，岂但不要，还把老子往死里踩，怎么不叫人懊恼气愤！愈想愈恨，愈恨就愈不想罢休。他正要发作，看见了一双温和透亮，充满深情的眼睛，那双眼睛正望着他，给他传送着一种感觉：忍耐忍耐，就作个检查吧！

他信任周恩来，佩服周恩来，特别敬重他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那种机智稳健、遇事不乱、沉着应付的胸怀大度。不论哪一次重大斗争，他都能把握住潮流跃动的脉搏，从而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永握斗争的胜券。

朱德心胸开阔了，他颤微微地站起来：“同志们，我向大家作个检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犯过错误，没有很好地紧跟毛主席，学好毛主席著作。今后我要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

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后半生更好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

“算了算了，别作什么检查了，检查什么呀，过去的事情都说不清了嘛！”

众人一回头，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朱德激动地望着毛泽东，热泪盈眶，嘴唇哆嗦着，好久说不出话来。生活的风帆有时候很难预料，特别是顶着逆风行驶时，每走一步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或需要惊人的勇气。

朱德是四川仪陇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一九一七年在四川参加反对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在旧军队里他一直靠勇敢和智慧熬到了师长的高位，本来他可以在那漂漂亮亮的楼阁里享受官僚们的高级生活，但他却十分厌恶往沙发上一躺，仆人站在旁边搨扇，耳边听着留声机，咿呀喂呀，软绵绵的歌曲充斥整个人生的岁月；硬是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到处寻找中国共产党，当陈独秀拒绝了他的人党要求，他便毅然决然辞去所有官职，前往德国留学。终于，他在马克思的故乡，由周恩来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到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夏天回国，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紧接着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在一九二八年初，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举行湘南起义，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四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

这是朱德第一次同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共同合作，指挥作战。说老实话，朱德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决策的英明，他长期在旧军队里生活熏陶早已习惯了正规军的打法，对毛泽东的

游击战术很不适应，很不理解。于是，他和陈毅、彭德怀等人一起，同毛泽东展开过许多次的激烈争论。

一九二九年六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的分歧彻底公开化、表面化了。毛泽东拍着桌子说：“你们这种单纯军事观点，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认军队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的主张完全错误，依了你们，我们的红军就和旧军队没啥子两样了！”

陈毅也跳起来：“你这个党代表有啥子了不起？离了你井冈山照样打胜仗！我就是要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这样才便于打仗！”

彭德怀拍着胸膛说：“老毛不同意这样干也好，请他走。”

当毛泽东那双锐利的眼睛转向朱德时，朱德却把身子转过去了，他冷冷地说：“看来只有请毛泽东同志离开四军了。”

“你们有什么权利赶我走？”毛泽东火了，双手叉腰大声说：“我是六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你们脱离党的指示一意蛮干，只会断送红军的前程。那时党中央的领导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当时时髦的口号是“攻打大城市，只要有几个中心城市被占领，革命就成功了一半”。在这种口号的指引下，“打阵地战”、“打正规战”的战略战术被认为是最正确的原则。陈毅当时嘲笑道：“老毛呀，你那个‘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过时了，是狭隘经验主义，是流寇运动，该收场了。”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我倒要看看你们那个最正确原则怎样打胜仗，不过我是担心会付出血的代价！”

从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这次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整整开了八天。毛泽东被迫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被撤销了红四军中的领导职务，到闽西特委去工作。

果然，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接二连三在闽中地区打了败仗。陈毅去中央向李立三汇报工作，提到这件事时，李立三

连连摇头：“把毛泽东赶出四军的决定很不妥当，很不妥当。毛泽东毕竟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多年，他的许多经验和办法还是切实可行的，你们还是把他请回来吧。”

当红四军连打败仗的时刻，担任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嚷起来了：“这种没有目标、乱打仗的作法是不行的，我们强烈要求毛泽东回四军来重新领导军队！”林彪的主张，得到了中、下级军官们的热烈响应。在上杭，红四军紧接着又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朱德怒斥林彪：“一个小孩子家懂什么军事，你只服从命令就得了。再胡嚷叫我撤你的职！”彭德怀说得更干脆：“我就不相信没有毛泽东打不了胜仗！我非要赌这口气不可。”

于是，朱德、彭德怀又作出了挺进闽中东江和攻打梅县决定。并亲自上前线指挥，英勇地冲锋在最前列。但是，敌强我弱，密集的子弹打得红军战士血肉横飞，年轻的战士们一批又一批倒下去，国民党军队乘胜出击，使红四军的伤亡达到了成立以来最高峰。

无情的现实使朱德清醒了，他把彭德怀扯到一旁，低声说：“看来没有毛泽东不行，他那套战略战术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把他请回来吧。”这时，陈毅也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他很诚恳地说：“事实证明咱们错了咱们就改，反正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前途嘛！这回请毛泽东，我亲自去！”

林彪当时很聪明，在毛泽东住在闽西一个山上的旧庙里养病时，派了一个营驻在那里，保卫着他。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在附近搞调查研究，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听到陈毅来请他出山时，他故意绷着脸问：“你们那套不是最正确嘛，还请我干什么？”

“老毛，算你最正确还不行吗？红军底子薄，像这样硬拼下去，就算有十万人能熬得几日的牺牲呵！这回我可是诚心诚意服

你了。”

陈毅恭恭敬敬鞠了个躬，拉着他的手说，“争吵算什么？军人们在一起哪天不撞碰几次，你再不去，那些牺牲了的将士们可要到阎罗王面前告状喊冤啦！”

“我回去可以！”毛泽东挺认真地说，“不过要分清是非，得开一次党代会，认真总结经验，作出几条决定才行。”

“行！行！只要你回去，朱德同志说了，让他负荆请罪他都干！”陈毅痛快地说。

这样，毛泽东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旬又回到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会上，朱德当着毛泽东的面作了自我批评，拉着他的手说：“老弟，以后我听你的。”陈毅也笑着说：“现在我们错了我们服从你，将来你错了再来听我们的。咱们谁错了谁检讨怎么样？”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大量涌入党内，红四军成为农民占主要成分的军队。由于红四军在进入闽西以后，又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处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许多人把反映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意识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残余思想带到红四军党内来，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侵袭着红四军的党。但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军队和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危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对这番精辟的分析和论断，朱德佩服极了，他当即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讲话，带头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使红四军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了一九三〇年六月，以红四军为基础，红三军、红十军与

他们合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以后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事委员会主席。他和毛泽东密切配合。齐心协力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后，无论是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还是遵义会议上及抗日战争的八年苦斗中，他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来没有半点动摇。他，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他始终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起，出任委员长职务至今。

没想到辛辛苦苦革命几十年，竟落到了这种地步！

他从心底恨透了林彪、陈伯达、康生这帮人！对江青，他只是叹了口气：“唉，你穷咋呼什么，中国这盘江山你能领导得了，真不知天高地厚！”碍于毛泽东的情面，他没有在任何场合下散布对江青的不满。

朱德刚让秘书把九大履历表送走，叶剑英来到府上看望他。如今权落清闲，到他这里的人逐渐减少，偌大的院子冷冷清清，叶剑英的到来似乎给这里增添了一点生气。

“千奇百怪，竟在党章上写什么接班人的名字，从来没见过！”朱德在熟人面前忍不住又要发牢骚，“我几次想在主席面前提意见，话到嘴边又咽回来了。唉，咱们这些人不顶用了，不顶用了！”

“我看这是暂时的。”叶剑英悄声说，“据说林彪和江青这个了。”他用拳头对拳头，相碰了一下。

“他们肯定要斗！我看林彪不会服了江青这班文人。林彪这个人我太熟悉了，别看平时不言语，最爱心里作事，鬼心眼特别多。他要当真接了班，你看吧，中国没个好！”

“九大他们一上台，那就糟了。”

“斗争是长期的。我现在可是真心实意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万寿无疆！”

叶剑英看出，朱德那双混浊的老眼里，涌出几滴亮晶晶的东西。唉，到了这个份上，谁能不动情呢？叶剑英拍了一下大腿，也唉了一声，哭了……

## 张姚伯达针锋相对 分头起草政治报告

“也许这一次，还不能把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们打下去，再过几年又得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吴法宪仍是这种口气，这样的眼神，甚至连姿势也没改动一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就是这样地对着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的面，一手支着下巴，眼睛既不敢完全正视他们，也不斜看窗口的那些布幔，像是讲给别人听那样地大骂那几个所谓的老右。

黄永胜低声地说：“我真弄不明白，群众打倒二月逆流的呼声如此高潮了，为什么毛主席还要作这样的批示来保那些黑干将，这里面有没有深刻的含义呢？”

他指的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叶剑英信上的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黄永胜说：“能搞好吗？我们和他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还有什么团结可言？我看对他们怜悯，就是对我们的残忍。”他觉得喉头堵上了一团又酸又涩的东西，那多时不曾有过

的酸痛感觉，涨满了他的心胸。他知道，一旦那些老将帅这回再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就给他们自己在今后留下了很深的隐患，他们随时都有被弄下台的危险。“历来农民起义的不彻底，都给他们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唉，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斗争成果可不能在九大上丢掉啊！”

“也可能在九大以后，毛主席就想结束文化大革命吧？”吴法宪说。

“结束了也好，省得那些文人们经常在这上面作文章。”黄永胜把印有毛泽东批示的那份文件收起来，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

正在这时，军委办事组办公室的小赵匆匆忙忙跟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主任来了！”

哎，对了，昨天毛家湾不是明明对自己说过，今天叶群要来看望军委办事组的几位成员么？叶群此番来当然是代表林彪，这是毫无疑问的。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她，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和林彪相连着。他们几次向林彪汇报或请示问题，都要先经过这位徐娘半老的婆娘。黄永胜捶了捶脑瓜，再次暗骂了一下自己的记性。

叶群和江青相比，前者远远没有后者的学识和文采。江青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字，还能作文章，对文化艺术十分精通，更重要的是她不像叶群那么贪财和喜欢别人送东西，江青从来不接受礼品。所以那些溜须拍马的人除了在政治上投其所好外，在经济上想讨好她只会适得其反。正因如此，黄永胜深感对付江青真是太难了。

叶群这两年来，一举一动都喜欢学着江青。江青爱穿军装，叶群也不得不脱下她的那些好衣服，把那身特制的军装成天套在身上。她平时很少到军委办公地来，这次却穿了身大衣，连秘书也不带，迳直朝小会议室走来。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像四大金刚似的，在她

到来时齐刷刷地站起来，喜得叶群合不拢嘴。这点，她就不如江青，江青早已习惯了发号施令发布指示，她在下属或除毛泽东之外的一切人面前表现得既有权威又不失分寸，既随合又得体。而叶群就不行了，总给人作做和虚伪的色彩。

“你们在议论什么？”她问。

黄永胜把毛泽东的批示给她看了以后，叶群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得非常勉强：“既然说到这份上，我也就敲锣亮鼓，告诉你们，我是不投他们的票的。许多人一见主席的批示就吓得了不得，恨不得马上就办。我是要正确理解主席的精神实质的。主席保那几个老右，目的是为了保留几个反面教员嘛。我们同他们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毛主席轻而易举一个批示把他们保下来能行吗？所以，我这次来办事组就是给你们吹风，这次所有的九大代表，我们都要能控制得住。永胜同志，你晓得，我这人一根肠子没半点弯头，说话从来直来直去，特别是在你们面前，还不是想着你们一向都爱护我，也从来看得起首长嘛。说句亮底话，同志们，这次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我们千万不可松懈自己的斗志，也不要太仁慈，拿了鸡毛当令箭，只晓得尊重别人，说一听一。”

讲到这里，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全都明白了她指的是什么了。

“该选上的，只要是我們自己人，一定得选上。记住，中央委员的作用大着哩，选举政治局委员可是一票之权。凡是对手，一定得选，这个心眼是要斗的，而且要斗的得体。从现在起，就要给代表们吹风。好了，我是什么底子也给你们抖了，什么话都倒给你们听了，下去要靠你们做工作了。”

无独有偶。此刻江青在钓鱼台也在密召张春桥和姚文元，她很会抓大事，她不忙着布置选票一类的小动作，她抓的是纲领性的东西。她说：“我看你们不用等老夫子写了，你们赶快写九大

政治报告的草稿吧，将来肯定是用我们的。我看，关于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一节尤其要写好，写好了就载入了史册和文献。即使将来人事变迁，九大政治报告毕竟是我们写的。”

张春桥对江青的话，从来是紧跟照办的。当天晚饭后，他就和姚文元到了十六号楼的小会议室，商量如何动笔写初稿。

神秘的使命是保密的，对文字的要求更是含而不露，要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张春桥、姚文元是以笔作为武器的，这样的武器杀人不见血，更具有杀伤力。

张春桥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这一节里，我认为首先写段我们的目的，这个问题挑明了，其斗争中的每一个过程也就容易理解了。”

姚文元点点头：“是的，要写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反修、防修这个目标。”

“那样说太笼统，应该有我们自己明确的表述。”张春桥微笑着摇了摇头，最后站起来对姚文元说，“来，我说，你记，写出来再修改。”于是，他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振振有词地大声说道：“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姚文元“索索”地在稿纸上记下来以后，放下钢笔拍案叫绝：“讲得好极了！这段话，既准确地表达了毛主席的含义，又充满着战斗的激情，是像那么回事。”

“不是很像，而是就是那么回事。”

姚文元含笑不语了。

“怎么在报告里体现一下江青同志和我们批判《海瑞罢官》的功绩呢？”张春桥问。

姚文元想了想说：“我看咱们把事情点到，不要提我们的名字，最好也不提江青同志的名字，来个此地无名胜有名。”

这对张春桥来说，根本费不了多少功夫，他略微思考了一会，便组合好一段绝妙的话：“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用‘毛主席又发动了’表示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我们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来历的。这样的暗示，太好了。”姚文元连声喝采。

姚文元非常精于此道。当初他奉命写这类文章时，还不是完全自愿。甚至认为有损于他个性风格的发挥。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十分适合这个职业，比于其他任何事情都干得更好。

整整一夜，素来不能熬夜的姚文元今天破了例。他俩一边琢磨一边动笔，写完了他们认为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节。写到这里，他们才领会到让林彪做这个报告比任何人都强，让他出头露面去说他们自己要讲的话，这不是一种政治机谋吗？对了，向目标靠近，再靠近，造成一种假象，一种令许多人都不能搞清楚的假象，让尊神再言不由衷地说一回吧。

又是一个星期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的会议室里，两名工作人员匆匆忙忙地把一袋又一袋的档案材料取出来，并在各自的座

位上坐了下来。藉助会议桌上白色弧光的台灯，他俩小心地挑选着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在登记卡上签了他们的名字。

不大一会儿，江青和康生板着面孔走进来，那两人慌忙站起来，把用文件夹装订好的材料递到康生手里。

“都在里面吗？”康生冷冷地问。

“按照你的吩咐，所要的材料都包括了。”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工作人员说。

江青脸上堆出怒容：“今天我们在主席那里交不了帐，唯你们是问。康老，我们走！”

说罢，两人将档案装进黑色提包里，急急火火地下了楼，分别钻进两辆灰色的小轿车，向长安街方向疾驶而去。

中南海游泳池里，正午的阳光照耀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院落，正厅门口两旁的花丛蓓蕾正在长满嫩芽的枝头上含苞待放。当江青和康生穿过警卫把守的大门进来，走向大理石的台阶时，发现林彪和周恩来也在客厅里，正和毛泽东说话。

江青对康生说：“看来是常委会！”

康生没有答话，整了整衣领，迈着大步走进去，江青也紧随而至，满面笑容地和大家打着招呼。

毛泽东见他们坐下后，才说：“召开党的九大，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十一名常委中，究竟有几位不能出席会议，今天我们议一下，然后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

江青瞅了康生一眼，康生立刻会意，首先表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不能再作为代表出席九大。他们罪行严重，民愤很大。”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说：“刘少奇已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永远开除出党，当然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我们只研究他们三个人中能不能再选出个把人物来。”

“陶铸不行！”江青吼起来，“一贯两面三刀，态度极端恶

劣。”

“小平怎么样？”毛泽东笑咪咪地问周恩来，“这个人你了解，也没发现什么大的历史问题，能不能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分化一下，打开一个缺口嘛！”

江青料定毛泽东会来这么一下，提前就给林彪、康生、陈伯达打了招呼。遗憾的是，陈伯达临碰头前夕让秘书给他们都打了招呼，说他正在发高烧不能来了。对江青来讲，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她毫不怀疑，她在九大上一定会跃上政治局常委，甚至副主席的台阶。她势必继续领导与其他机构都水火不容的中央文革小组，展开新的斗争，她坚信她能够胜利。

现在，她自信地感到，树立自己领导权威的关键时刻正在到来，她已经将陈伯达的气焰压了下去，奠定了一个强大的文革势力基础，依靠他们，她能够在党代会上呼百应，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她决不允许已经被她打倒的人物再卷土重来。

“我建议康老公布一下邓小平的档案材料，再讨论主席提出的问题。”江青说。

林彪和康生马上点头，几乎同时脱口而出：“主席，这样最好。”

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后，康生打开文件包，来了个照本宣科。说邓小平于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县协兴乡一个姓邓的恶霸地主家庭，其父邓文明信奉“五子教”，曾任国民党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团参事等。邓小平从小娶过一个姓蒲的老婆，也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前妻张茜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冰的老婆张晓梅的姐姐。后来邓小平又娶了一个叫阿金的女人，于一九三三年被李维汉夺走。邓小平现在的老婆卓琳，原名叫蒲琼英，也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的千金。邓小平的哥哥邓肯，又名邓先修，解放前在广安女子中学教书，后任《民报》记者，解放后

任重庆市副市长，在一九六六年四月的四清中发现有严重问题，但在邓小平的包庇下，调任武汉市副市长……

毛泽东显得很不耐烦：“讲这些干什么？即使邓小平的亲属都是反革命，和他本人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强调重在自己的政治表现，不搞封建社会株连九族那一套。如果要唯成分论，我们在座的剩不下几个，可能都得滚蛋。”

林彪接上茬说：“是啊，政治斗争要严肃，要科学，要斗争出水平来，不要念那么多外调材料了。”他转身对毛泽东说，“不过，主席，我看邓小平不能分化出来，他和刘少奇建国以来紧紧地连在一起，实际上是反革命同盟的关系。正像主席所讲的，他在资产阶级司令部里起着摇羽毛扇子角色的作用，这很严重。他那个人善于观望，不利时躺下，时机成熟再跳出来。一九三一年一月，我红七军在乐昌强渡北上，被敌军拦截，仗打得很惨很苦。我军一部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从仁化、南雄退到江西崇义。几天之后，上饶之敌又攻向崇义我军。这时，曾经左得要命的邓小平立刻变得右的出奇，在敌人的包围面前吓得魂不附体，藉口向中央汇报工作，逃到上海去躲避风头。临逃时他连与部队其他负责人招呼也不打，只留下一封极短的、敷衍了事的信便作了逃兵。”

毛泽东笑了：“开小差了，算不算？”

“当然算！”康生说，“林副主席揭发的这个情况，已被许多的证明材料所证实。他去了上海后，整天和徐冰花天酒地混在一起，我都看不下去了。后来他的老婆张茜元由于难产而亡，他又张罗后事，花了组织上的不少钱。在那个时期他的表现不好。中央举行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被派到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心县委书记，统辖会昌、寻邬、安源三县的斗争，在此期间他又和阿金结了婚。”

毛泽东问：“一九三三年在江西反王明路线时，左倾机会主

义者把他和毛泽潭，我的那位兄弟，还有古柏同志打成错误路线代表，受罪不小哟，你们查清楚了吗？”

康生微笑道：“江西确有一个反邓、毛、古的事件，邓小平一直以此为资本。说他是什么反对王明、李立三路线的英雄。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当时主持江西工作的李维汉曾受过立三路线的打击，他认为邓小平当时是参与打击他的活动的，所以强烈的宗派情绪再加上会昌、寻邬、安源中心县地区正处于红色根据地和白区的交界处，比较复杂，李立三就乘机大反邓小平，把和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潭、古柏同志搞到一起来了。”

“是吗？是这样的情况吗？”毛泽东有些吃惊地说，“我们可要对历史负责啊！”

江青冷笑道：“你放心吧，这场文化大革命把什么问题、不管隐藏多么深的东西都能揭发出来。光邓小平的材料在我那里就有这么厚的东西。”她两手比划了一下，大声说：“我们和他没仇没冤，绝对冤枉不了他。”

林彪说：“邓小平的确忠实地执行过王明、立三路线。他多次率领红七军北上攻打大城市，使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大，由一万多人减少到二千多人，右江根据地遭到敌人的很大摧残。因此，邓小平和李维汉的斗争，是狗咬狗。李维汉领导会、导、安中心县反王明路线中把他撤了职，甚至连老婆也抢走，只是一场小小的闹剧。”

“好，好，看来你们是多数，我是少数，我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喽。”毛泽东抽出一支中华烟，在自己左大拇指指甲上顿了顿，刚夹在嘴唇上又取下来，“小平的事就算了，先挂起来，以观后效。大家再议一下陈云同志的问题吧。”

周恩来开了口：“陈云同志主管经济财贸工作以来，虽然有错误，但性质不一样。刘少奇多次讲过，他对陈云的信任太过分

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把他和刘少奇分开。他在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清白的。”

“一九五三年他讲过‘财权高于一切’。一九五七年又伙同刘少奇反冒进、大反合作风。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三自一包’，在六二年的西楼会议上同刘、邓、彭真伪造巨额预算赤字，攻击毛主席，主张‘彻底分田到户’，完全否定三面红旗。”康生翻阅着材料说，“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毛泽东说：“陈云的问题说到底，不过是右了点，他不属于搞阴谋一伙的，我看应该让他站出来，参加九大，我还要投他一票作中央委员呢。”

“主席啊，我这里的红卫兵小将写的一篇文章，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写的，我给大家念一段。”江青说完，也不经毛泽东点头，就有声有色地宣读起来：“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及邓小平被揪了出来，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中央常委内却有一个所谓‘神秘人物’依然逍遥法外，幕后跳梁，这就是反党老手陈云。这是一个埋在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的吱吱冒烟的定时炸弹。《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六七年元旦社论中指出：‘正当亿万群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起来闹革命的时候，有两个或几个在中央作工作的负责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几个负责人’中就包括反党老手陈云。陈伯达同志前几天曾说过：‘起码还有个把人物未被揪出！’这‘个把人物’就是反党老手陈云。”

“别念啦！别念啦！”毛泽东摇着手说，“再念只能证明小将们的火全是你们点起来的。他陈伯达说还有个把人物没揪出，为什么他自己不揪？好，你们谁愿意揪就揪，反正我保陈云同志。”

周恩来笑了：“我们都听主席的话，都保陈云同志！”

江青嚷起来：“我只是念红卫兵的传单，并没有说是我的意见啊！”

“你最善于用别人有利于你的话来宣传你的主张，你承认么？”毛泽东伸手点着江青说，“是优点也是缺点，你要胸中有数。”

“好，我也保留自己的意见。”江青拖着长长的音调结束了自己的表演。

陈伯达有病是藉口，真正的出发点是对江青和康生的抗议。

在家里，他把自己早年写的一系列文章都翻腾出来，准备整理自己的著作，瞅准时机出版自己的选集。他对自己的秘书说：“唉，干脆，写个申请到僻静的乡村隐居算了，如今这乱哄哄的局势，叫我再当政治局常委也没劲。我看，九大上我的常委是保不住了，顶多能保留个政治局委员。我的身于骨还好，我还可以搞研究、写著作。我看多留点著作在世，真如蛟龙入海，捧上了真正的珍宝，以后还被世人记着，你说是不是呢？”

其实，这不过是文官落魄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是陈伯达的本意。

就在养病时刻他也忙得要命，接连好多天，连住宅的门也没跨出过一步。实际上，这幢座落在米粮库胡同里的大院成了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大本营。在这帐外表看来破烂不起眼的灰墙里，隐蔽着一座花草茂密、舒适宽畅、古今中外书籍俱全的安乐窝。陈伯达在这里每天都和毛家湾通电话。当然，他偶尔地接见一批文革中暴发起来的新贵，向他们透露点消息，其中包括和上海反张春桥、姚文元势力的秘密联系。他时刻准备着这样一个时机，一旦副统帅接班，他即刻重整旗鼓，有声有色地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他翻阅着一九三九年八月解放社出版的那本《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小册子，饶有兴趣地琢磨着他当年的那段话：

“现代中国人的新人生观，应该是以‘治国’、‘平天下’为‘修身、齐家’出发点。中国旧时有一种哲学，以‘修身、齐家’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认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修身乃是‘九经’之首。”

又翻开《解放》一九三九年第六十九期有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孔子的哲学思想》。其中也有段话：“孔子所建立的概念世界，概括来说，就是封建社会中‘忠’与‘孝’的两个概念。这也就是：在家尽‘孝’，在朝尽‘忠’。人们要把忠、孝变成自觉的和合理的新美德，必须把‘忠’‘孝’从这种封建的服役和盲从于个人的狭隘性方面解放出来，而忠孝首先就是应当从属和服役于人民及民族的，才最具有积极的意义。”

秘书把饭端来后，他指着桌子上的这堆书籍和自己当年的文章说：“我的这些观点永远也不会过时，看来搞理论也得有些永恒的观点才行。应景的文章，我是不愿意再写下去了。”

秘书从他的话语里，感觉到了牢骚和不满。这一段来，陈伯达的情绪也传到了他的身上，使他对张春桥、姚文元乃至江青产生了深深的恶感。他试探着问：“九大开过以后，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陈伯达说：“九大以后，党内生活就会走向正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解散了。这样，我看江青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专横。唉，毛主席是个天才，是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我从心里佩服。只可惜娶了这么一个老婆，整天叽叽喳喳给他帮倒忙。我看，她迟早会坏事的。毛主席百年后，她能像克鲁普斯卡娅就不错了。”

“列宁的夫人也像江青这样吗？”

“反正她和斯大林弄得不和谐。列宁弥留之际，是打算把斯

大林调离总书记岗位的，只是由于斯大林采取了灵活的政治措施，没有使列宁的遗嘱实现。”陈伯达小声地说，“我看以后林副主席接班以后，也得采取斯大林的措施。林彪同志是军事家出身，很会果断地采取决策，只是由于主席健在，他的才能还没有得到发挥。”

“看来张春桥、姚文元对你的意见也很大，到底原因何在呢？”

陈伯达苦笑一声：“当初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江青提议姚文元进来，我不同意，投了反对票，这事肯定传到姚文元的耳朵里去了。谁透的风，不用听别的，一看他们那个样子，我就啥也明白了。张、姚可是消息灵通人士，政治局常委要议的事，连我都不知道，他们都能知道，你说党的生活正常吗？”

“那毛主席的态度呢？”

陈伯达正想接着往下说，忽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自己作与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怎么能和身边人员讲这些话呢？这都是党内的最高机密啊，他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拍拍自己的脑袋说：“今天我的安眠药又吃多了，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不要往心里记，忘掉算了！”

其实，陈伯达这种顾虑是多余的。自从他把老婆刘淑曼贬到山东以后，秘书和他朝夕相伴，直至给他作饭、打扫，对他关心到了极点。秘书虽然没有参与他的活动，但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既不赞成江青的飞扬跋扈，也对陈伯达的唯唯诺诺的既狂又怪的作风不满，他们很希望他们的首长能像其他老师老将那样，敢于在各种场合下直抒自己的意见，甚至吵红了面皮也在所不惜，只要做到谁对就听谁的就行了，像五十年代那种思想状况、工作方法和一套完整的“机构体系”那样。

他们，毕竟思想太单纯了！

陈伯达思索了一会，仿佛下了决心，对秘书说：“我一定要

完成好这个任务，给他们看一看到底谁行！”

“什么任务？”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呀？”陈伯达这时又来了精神，“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但林副主席不信任他俩，要交我来完成。哼，这是林副主席的决定，她三点水也无可奈何。”

“什么时候你才动笔呀。”

“不忙，不忙。”陈伯达指了指桌子上那堆书籍和他的著作说，“我翻阅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先来点灵感。政治报告要体现我一贯的写作风格，对中国的现状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作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还要明确地提出今后的战斗任务，这就是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今后要走向正规了，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了。”

“向主席汇报你的想法了吗？”

“和林副主席议了议，基本上搭成了一个框架。”陈伯达转身对其他几个工作人员说，“对了，你们都过来，分头给我找一些材料。”他掏出公文包里的笔记本，翻到某一页说，“你们给我搜集一下北京市清理阶级队伍以来的文件，还有文化大革命三年来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数字。小王同志，你和中央研究室的同志帮我查一下马列经典著作，摘录一些有关阶级斗争推动生产力的论述，还有……”

陈伯达经过再三的分析，决定立即动手起草报告，这是自己迈向新台阶的关键一步。